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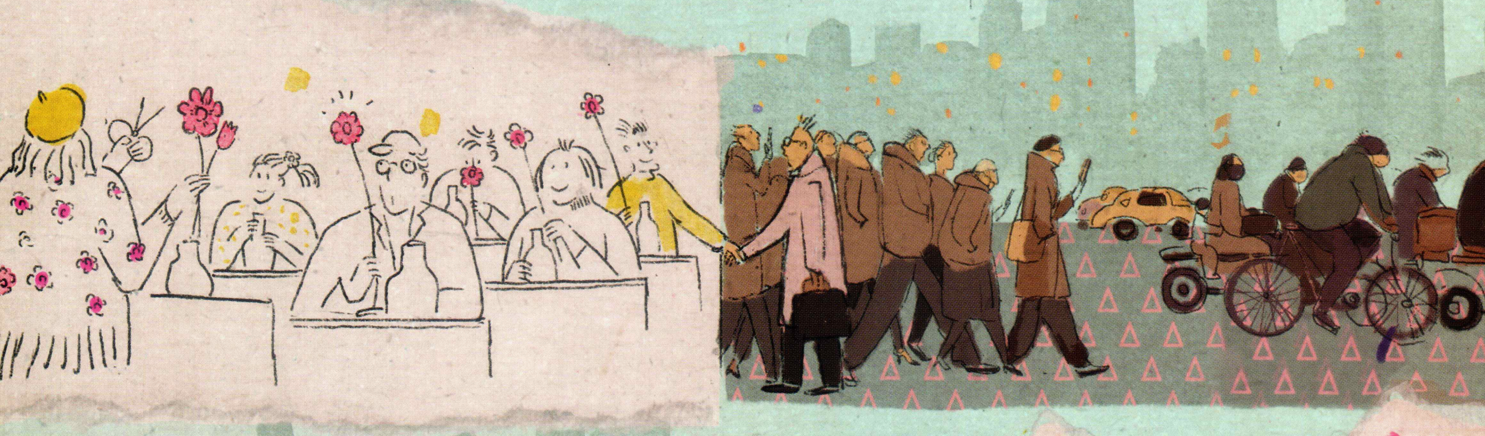
2023.12.25
2023年第52期，总第1270期
www.lifeweek.com.cn

2023年度生活方式

即时生活

特种兵式旅行
演唱会飞人
成人小饭桌
身份出租
上夜校







9 771005 360239 52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巴伦周刊》2023.12.11

高利率

最近几个月，美国通货膨胀减缓，经济前景向好。但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未来10年的利率仍将远远高于过去15年的水平。在一个利率较高的世界，债务成本随之增加，可用于其他投资的资金就会减少。美国联邦预算委员会表示，从2020年到2023年，利息成本几乎翻了一番，是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未来10年，美国在利息成本上的支出将超过13万亿美元，这将阻碍美国的科技创新投入，进而影响生产率。



1 《新科学人》2023.12.9

电子烟

在英国，向18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售电子烟是违法的，但在过去一年中，英国11～17岁的少年儿童吸电子烟的比例增长了50%。在其他国家，电子烟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电子烟通常含有尼古丁和调味剂。尼古丁会让人上瘾，并过度刺激交感神经系统，使得心率、血压升高，还可能进一步诱发心力衰竭。与此同时，包括蔗糖和葡萄糖在内的甜味剂在加热后会转化为一种叫作活性醛的化合物，会提高患心脏病和肺病的概率。

2 《货币周刊》2023.12.8

金价创新高

今年12月4日，黄金价格创下每盎司2152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使得黄金有望迎来自2020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利率是影响金价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多的市场共识认为，各国央行的利率或很快触顶，预计明年利率将继续下跌，到2024年底，金价可能达到每盎司2200美元。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央行将囤积贵金属作为一种保险形式。2022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购买了1100吨黄金，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1/3以上。

3 《卫报周刊》2023.12.8

迪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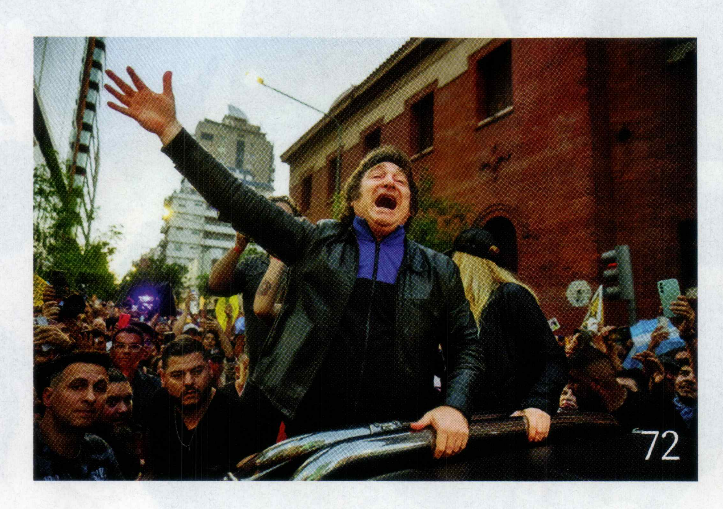
联合国COP28气候大会的主办地是阿联酋城市迪拜，而不是首都阿布扎比，对此，阿联酋问题专家马修·赫奇斯表示，迪拜此举“完全是为了打造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国际品牌”。在阿联酋内部，迪拜已成为软实力中心，阿布扎比则完全是硬实力中心。据报道，迪拜南部的太阳能电池板提供了阿联酋15%的能源需求，但石油和天然气仍是该国能源和商业的基石。

4 《经济学人》2023.12.16

媒体和政治

信息的发现和传播对政治很重要。《经济学人》对美国的6000多篇书面和电视新闻所作的分析表明，美国主流媒体的语言倾向于民主党喜欢的术语和话题。与此同时，智能手机颠覆了媒体结构，造成了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既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也创造了新的意见领袖，这也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原因。明年，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可能会通过伪造信息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人们应时刻保持警惕。







封面绘图：范薇

2023年第52期，总第1270期，2023年12月25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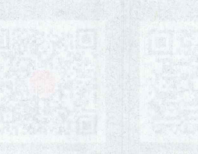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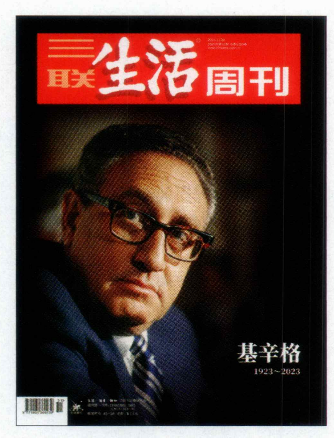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2023年第51期，总第1269期

基辛格

当小球转动了大球，当两只手跨越大洋相握，基辛格见证了时代的序幕拉开，也终究随着时代的逝去落下帷幕……也许不会再有基辛格式的人物，毕竟，两个国家的关系终不能靠一个人来维持。（@李佳糠）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中老年人也有搭子

都说“搭子”是指年轻人中盛行的一种社交方式，对于这种释义，我有些异议。

搭子何止流行于年轻人，它根本就不是新生事物。棋友、牌友、跳广场舞的舞伴……浅于朋友重于同事，主打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这些不都是搭子吗？只不过老同志们不善于发明创造，没弄出这么个新名词。

我结识严格意义上的搭子（非同事、同学），是在20年前。那时我刚开始养狗，每天傍晚会去附近小广场遛狗。时间久了认识了许多狗友，我们以狗名加辈分互称，比如“托尼爸爸”“巴赫姐姐”……我被称为“狗剩他爹”。

那时大家都没有私家车，觉得自家狗狗困于闹市之中，挺憋屈的。于是大家一商量，定期包车带它们出去郊游。通常七八条狗加它们的主人，一起坐一辆中型面包车，费用每个狗主均摊。

这样的活动经常进行，“狗搭子”们互相越来越熟，但大家都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再往前迈一步。除了个别人自报家门，几年下来，我们还是不知彼此的姓名，更别说互相托关系办事、借钱了。

后来我搬了家，结识了一些新狗友，彼此的关系依然仅限于一起约时间遛狗，搭伙以批发价买狗粮。“狗搭子”们一度商量买一台给宠物洗澡用的吹风设备，一千多元，由各家平摊费用，轮流使用。但有人提出万一在哪家用坏了，维修费用怎么算？恐怕会影响“团结”，于是作罢。

“狗搭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不远不近，靠着保持安全距离才能维持长久。如今回想当年具体有哪些人？都想不全。倒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两个“看电影搭子”，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念中专的最后两年，每天下午都没课。于是我和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观影团，每月一起看大约20场电影，有些电影“二刷”甚至“三刷”。

当年国产电影三四毛钱一张票，进口电影最贵也就七毛。我们每月有助学金，每学期去工厂实习，还能得40元补助金，所以消费得起。那时的下午场电影，偌大的放映厅里往往不到10名观众，没人结伴，会觉得凉飕飕的。

那个女同学是班花，我们这个观影三人组因此常被同学们私下议论。他们说我在和班花谈恋爱，为了规避不许早恋的校规，拉上那个男同学作掩护。其实我真想过追班花，甚至觉得自己大概率能追上。但我心里有数，知道双方家境悬殊，以后她会被分配进一家好单位，我估计不行，我们谈恋爱不会有好结局，于是发乎情，止乎礼，藏于心，只看电影，不谈风月。

去年同学聚会，我们三个观影搭子又见面了。忆往昔，感慨万千……人生路上，有搭子挺好，彼此没有太多的想法，回忆便会是暖色调的。

（阿紫）

本期截稿时间：12月18日19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TOPPAN Leefung Printing (Beijing) Co., Ltd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城市	经销商
上　海	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　京	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　阳	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	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 (0451) 8838290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055155
长　春	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　昌	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　州	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　津	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022) 87080096
河　北	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311) 83035788
新　疆	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82055352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三联数字刊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三联中读　手机百度　百家号　今日头条

三联生活周刊官网：www.lifeweek.com.cn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英国 | **男孩主教**

12月10日，13岁的哈利·米尔斯（Harry Mills）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被任命为主教。图为他在执事的陪同下带领唱诗班为会众做祈祷。男孩主教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担任主教期间，他有权任命神职人员并管理教会资金。



法国 | **年终庆祝表演**

（右图）12 月 16 日，凡尔赛宫举行年终庆祝活动。图为巴黎皇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们身着古装进行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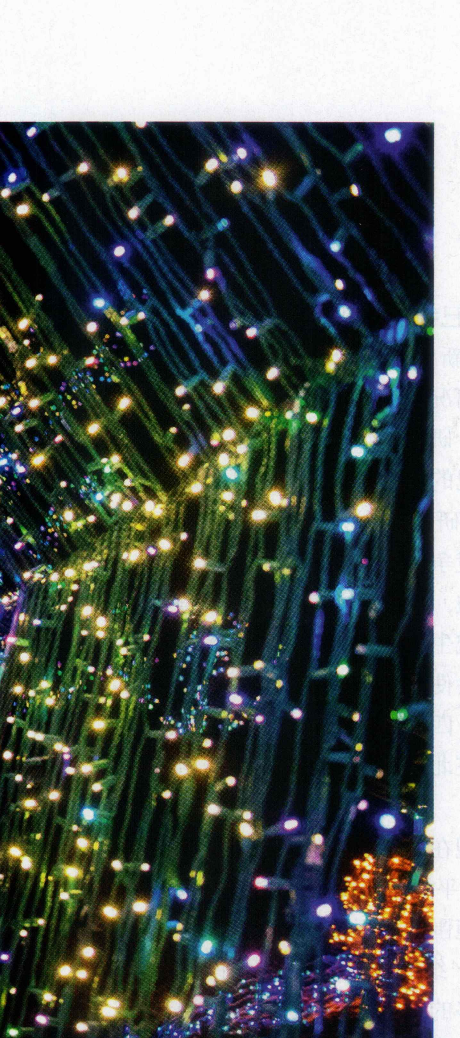
荷兰 | **展览**

（左页上图）12 月 13 日，伦勃朗两幅最小尺寸的肖像画作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展出。画中人物是他的一对年长而尊贵的亲戚。

日本 | **清洁仪式**

（左页下图）12 月 13 日，千叶县成田山新胜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年终清洁仪式。图为僧侣正在大殿檐下清扫佛龛和地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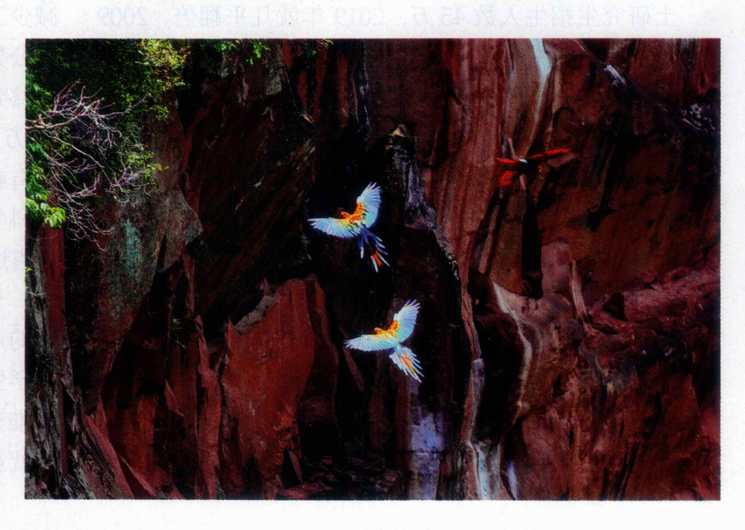


美国 | **灯光秀**

（左图）12月15日，马萨诸塞州瑙姆基格公园举办了34届的“圣诞节斯托克布里奇大街”灯光秀吸引了游园人。

巴西 | **金刚鹦鹉**

（下图）雅尔丁市的布拉科达斯阿拉拉斯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天坑之一，深约100米，周长500米。这里有非常独特的动植物群及其生态系统，可以欣赏到大约120种鸟类，图为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红金刚鹦鹉。



专硕与学硕

文 · 邢海洋

复旦大学，专硕不再能住校了，但学校会帮助解决社会化住宿；南京大学，全日制专硕不安排校内住宿，但会给予适当的交通补贴；北京大学，专硕不安排住校；南开大学，面向非应届生招生的专硕一律不提供住宿。近几年，许多学校不再为专硕提供宿舍，专硕本来学费就贵，如今还得负担更高的住宿费用了。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81.1 万人，专硕招生规模达 47.4 万人，占比为 58.5%。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 124.25 万人，硕士研究生 110.35 万，其中专硕 70 万，已经占到了 63%。

学硕和专硕的分化，其实是挺晚的事。我国于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最初主要是学术型硕士，后来才出现了诸如 MBA、软件工程等职业培训型、专业型硕士。专硕正式进入学历教育是 2009 年，开始规模很小，招生指标以每年 5% 的速度逐年递增，到了 2015 年，专硕居然在数量上追上了学硕。学硕三年，专硕学制短，两年到两年半；学硕考试门槛高，专硕门槛低。毕业难度上，专硕对发表论文的要求也低。因以就业为导向，考试、就学皆容易，专硕吸引了大量人员报名，有些情况下，专硕考研比学硕竞争还激烈。但因为学制的设计、学科内容的区别，大学似乎对专硕另眼相看，这次的宿舍安排就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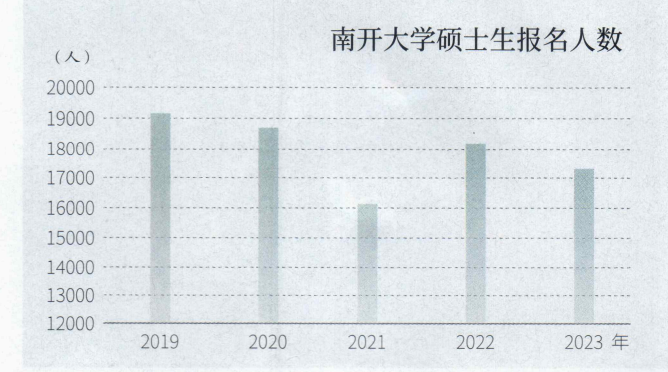
伴随着大学扩招，宿舍紧张早有苗头。200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 45 万，2019 年就几乎翻倍。2009 年在校研究生人数 140 万，其中硕士生 116 万，到了 2022 年，在校研究生 365 万，其中硕士研究生 310 万，十余年间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经是当初的2.6倍。而这2.6倍的在校生中有一大半是新出现的专硕。

长安居大不易，更何况是没收入却要在闹市里求学的莘莘学子。有人说，研究生至少本科毕业了，是成年人了，就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与深造负责任，这话是有部分道理的，尤其若研究生是以职业培训为目的，读书是为了增加职场的竞争力，毕业后就能把这部分投资赚回来。投入与收益，考研之前就应该通盘考虑了。但问题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本来有提供住宿的传统，突然就变了，一定会使惯性思维下的学生们措手不及。如果学校处于三、四线城市还好，关键是不提供宿舍的学校，基本处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房租费用畸高。

以前能提供住宿，现在却不能，难道不是扩招惹的祸？其实学校完全可以平衡自身资源和在校生人数，把在校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而不是一味扩招，把住宿困难留给新生。如今一纸通告专硕就没了住宿权，本质上还是学校招了过多的学生，赚取更多的学费和教育补贴，却不愿意承担照顾学生的责任。

好在连年扩招后硕士学位升值的速度赶不上就业形势的突变，职场上，硕士生和本科生一样难找工作，报考者也更加理性了。根据教育部披露的数据，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 438 万，同比减少了 36 万人，出现了 7.6% 的下降；同一时期，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却在显著增长，2024 年国考最终过审人数达到了 303.3 万人，相比 2023 年多了 43 万人。年轻人急于上岸，上的却是一步到位式的终身有就业保障的公务员的岸。而研究生因为面临着和本科生同样的就业难题，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职业规划首选了。

一众学校把专硕划入另册的做法最终也会损害专硕的声誉，如果大家都不再报考，或者只有能力不足的学生报考，专硕这一教育部门大力发展的学历教育，将难有成长空间。而专硕，作为就业蓄水池承担着缓解就业压力的功能，却因为成本过高，失能了。





栏目插图·范薇

5 万家咖啡店

据 World Coffee Portal 的报告，过去 12 个月，中国品牌咖啡门店的数量增长了 58%，达到创纪录的 49691 家，比美国的 40062 家多 9000 多家。仅瑞幸和库迪一年中便分别新开了 5059 家和 6004 家门店。瑞幸已在中国拥有了多达 13273 家门店。在 World Coffee Portal 之前 20 年的调查中，美国一直是咖啡门店最多的国家。

缩量挺价

通缩背景下，坚挺的白酒面临保价难。有机构透露，泸州老窖原提货价 980 元的国窖 1573 将按 930 元 / 瓶执行。虽公司澄清，但近年来老窖一直通过控货推动价格上行，以致库存高企。五粮液经销商则称明年普五合同缩量 20%，以缩量来挺价。五粮液内部则称缩量的原因为八代普五比较稀缺。无论如何，酒企要么限量，要么降价，业绩提升越来越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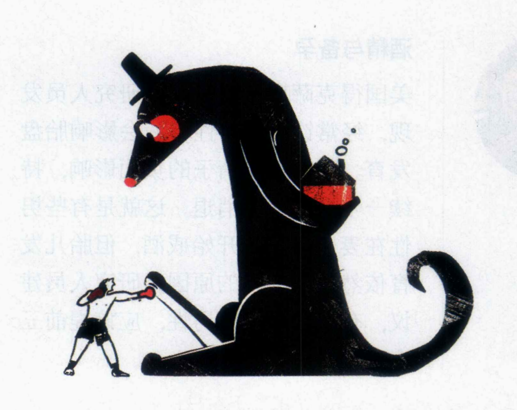
美联储大转向

美联储如市场所料连续三次会议未加息。12 月声明又增鸽派内容，承认过去一年通胀已放缓，还暗示通胀好转速度比预期快，为明年降息敞开大门。议息委员会票委们还预计在 2024 年至少降息三次，每次降息 25 个基点。美联储的鸽派表态触发市场看涨浪潮，道琼斯指数涨上 37000 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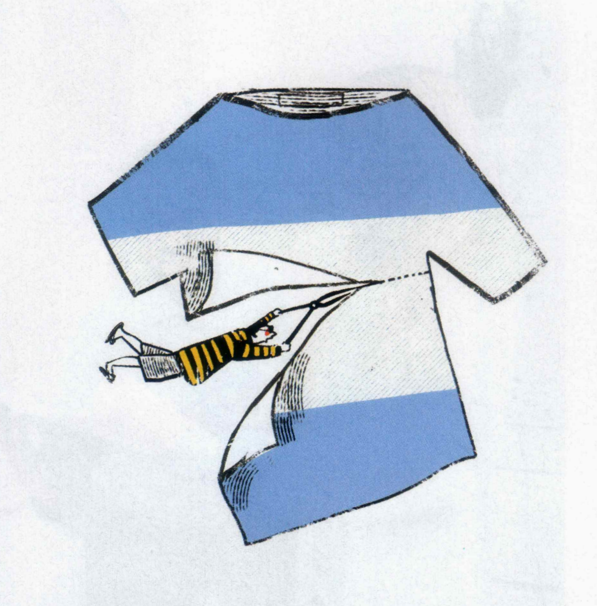
抱团取暖

碧桂园公告称，拟以约30.69亿元出售万达商管1.79%的股权，接盘方为万达系公司。对于身处流动性危机的碧桂园，虽有所损失，退出万达商管仍是一个好时机。12月12日，万达商管上市对赌危机刚刚解除，王健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算在一众投资人施与援手下，闯过生死关。曾经的中国首富级人物，如今携手降债纾困，颇有抱团取暖的味道。



超级组合拳

北京挺房地产又放大招，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三成，二套房城六区首付比例为50%、非城六区为40%。这比此前低了很多，非普通住宅首付比例曾高达80%。贷款年限也增加了，从最长年限25年恢复到30年。贷款利率也降低了约50个基点。而普宅的标准却提高了，超七成的房子可被归入普宅。这显然是一套超级组合拳。



“腰斩比索”

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宣誓就职后兑现了竞选承诺，政府部门裁撤合并，由原来的18个直接削减一半。作为“休克疗法”的一部分，比索更是下调至1美元兑800比索，瞬间贬值54%。米莱政府还发出了另一条信息：请求中方扩大两国货币互换。希望“全盘美元化”的米莱政府，受限于外汇储量、债务规模和信用问题，暂时无法获得大量美元。

“小作文风波”

东方甄选“吉林行”活动，董宇辉在直播中的文案获得网友称赞。“小编”邀功称“小作文”是团队所为，该回应引发危机，东方甄选CEO与董宇辉的矛盾表面化。“小作文风波”持续发酵，东方甄选抖音号3天掉粉近26万，公司股价累计下跌19.2%。风波不只是饭圈文化的缩影，还暴露出MCN机构和超级网红的共事难题。



为什么有些男性得了不孕症?

不孕不育影响着全球近 1/6 的夫妇，其中一半问题出在男性身上，他们中约有 10% 的男性存在精子数量少，或者没有精子的问题。最近美国斯托尔斯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联合研究发现，人类需要构建一种类似于格状桥的关键蛋白质结构，来产生精子和卵细胞。实验人员在雄性小白鼠身上发现，如果改变这个蛋白上一个非常特定的点，会导致其不能产生精子。而小鼠一直被用作人类疾病的模型。从使用人类蛋白质序列的建模实验来看，导致小鼠不孕的蛋白点，可能在人类中发挥同样的作用。这一发现或将解释男性不孕的根本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好消息



南瓜籽油对抗脱发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约 70% 的男性和 40% 的女性都会受到脱发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用南瓜籽油按摩头皮，是防止脱发的良药。这种天然富含 Omega-3 等脂肪酸、维生素 E、维生素 B 以及锌、镁和硒的营养物，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和修复,并缓解头皮炎症。



无针疫苗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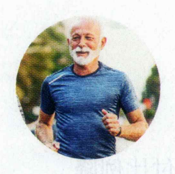
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员开发出了一种易于使用的无针疫苗贴片，通过数千个微小的凸起，将疫苗输送到皮肤表面下的免疫细胞。这无疑是晕针人士的福音。除此之外，它还能在 40 摄氏度以下长期保存，大大提升了疫苗在冷藏困难的低收入国家中的覆盖范围。

坏消息



酒精与备孕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饮酒的男性精液会影响胎盘发育。而酒精对精子的负面影响，持续一个多月才会消退。这就是有些男性在妻子怀孕前开始戒酒，但胎儿发育依然受到影响的原因。研究人员建议，有饮酒习惯的男性，应该提前三个月戒酒备孕。



运动过量与衰老

芬兰韦斯屈莱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2 万多人的运动情况，分为久坐、中等运动、活跃、高度运动。研究发现，久坐、高度运动的人生物衰老更快。高度运动的人其生物学年龄比中等运动的人衰老 1.3 年，比活跃的人衰老 1.8 年。当运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最低量时，死亡风险降低 7%，而更多的运动量没有额外益处，甚至会加速衰老。

自尊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而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

——英国作家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们利用所处的空间来展示自己的爱好，炫耀奖项和荣誉，表达出人意料的创意或古怪的幽默感。这样的展示有时可能是为了告诉别人我们是谁，或者想成为谁，但通常是为了更亲密的观众：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意识不是稳定的或坚实的，放在身边的物品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相对坚定的自我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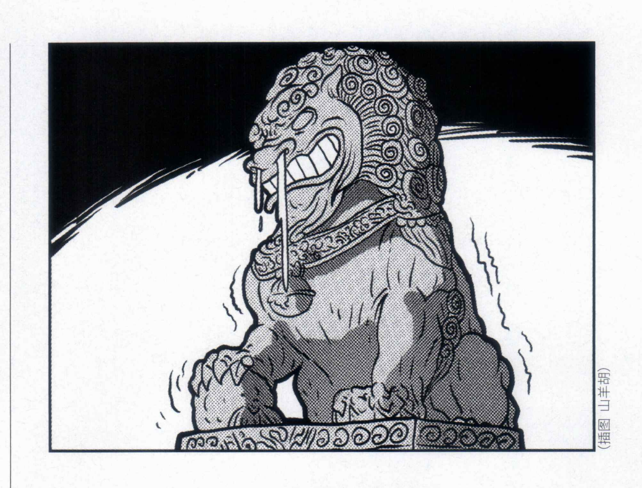
——美国科普作家安妮·墨菲·保罗，《思考如何超越思考》

当人们一无所有、别无所求时，他们便会变得勇敢、高尚；当他们鄙视奢靡艺术，而被其他国家视为野蛮人时，他们会势不可挡、开拓疆土。但当他们对风雅变得敏感，更快速地追求享乐时，金色的权杖便立即从他们曾握武器的手中掉落。

——英国学者约翰·罗斯金，《记忆之灯》

绮丽的风格有两种：一种是和内容相称的，写得情景相生；一种是华丽的辞藻淹没了内容的思想感情，或者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空虚的内容。前一种是好的，后一种是要不得的……杜甫《曲江二首》之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些描写景物的句子，不用典故辞藻，像口语一样明白晓畅。

——周振甫，《诗词例话》



（插图 山丰胡）

在音乐的世界里，也有等级制，贝司手一般是最先追到女孩的，因为他们稳重又冷酷，手指动作温柔却有力，不过麦卡特尼是例外；其次是鼓手，他们爆发力十足，有毅力且性格坚强；接下来是吉他手，因为他们会各种花哨的独奏；再往下才轮到主唱，因为尽管他站在最前面，但他必须把脑袋向后仰、露出臼齿才能飙上高音，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性感。

——加拿大演员马修·派瑞，《马修·派瑞回忆录》

+/−
数字

7 次

据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统计，今年地球已发生了7次大地磁暴级别的地磁活动。其中，发生于3月23日至24日间的特大地磁暴，是近6年来的最大地磁暴。地磁暴从低到高共分为G1到G5五个等级，而这次达到了G4级，导致极光"南下"。

20 次

12月9日，"朱雀二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朱雀二号"是我国首款以液氧甲烷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火箭，其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达1.5吨。预计2025年首飞的"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可重复使用20次，低轨运载能力可达21.3吨。

120 万人

首尔周边的京畿道等中小城市表示愿意加入"超级首尔"计划。据韩媒统计，每天有超120万人从京畿道前往首尔，行政区划不同给居民的通勤带来烦恼。

悲伤几何学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魏晋名士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任凭巨大的悲痛伤人性命可取吗？《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多起恸绝（昏倒）的场景，如阮籍葬母时，一声号叫，随即口吐鲜血，昏厥了很长时间。

《花生》漫画中，查理 · 布朗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只会说一句“Good Grief”（可以理解为“天哪”“真是的”“真要命”“怎么会这样”），它的字面意思是“有益的悲痛”。

去年，85 岁的美国作家约瑟夫 · 爱泼斯坦撰文说，年过五十的人都经历过悲痛，“悲痛的主要原因是亲人的离世，父母、丈夫或妻子，兄弟姐妹、好友，其中最让人伤心的是丧子。悲痛能够避免吗？应该被避免吗？是否存在查理 · 布朗所说的有益的悲痛？”

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麦可 · 法瑞姆在《悲伤几何学》中说，悲伤跟伤心有质的差别，你本来计划要去公园里散步，但下大雨了，你会伤心、失望，但你可以改天再去散步，虽然你看到的是不同的花、不同的树叶和飞鸟，你会有一种失落感，但这不是一扇门被关上了，只是感知的微小变化，而亲人的去世造成的伤心是惊人的，十年后仍让人心痛。“约翰 · 阿切在《悲伤的本质》中说，悲伤是因为我们需要亲密关系，破碎的依恋可能会造成生存危机……时间会折叠起来。那么多鬼魂挤在我脑海里——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好友、学生。”

爱泼斯坦重读莎士比亚戏剧后觉得，“人们敬佩他的广度而非深度。他能写喜剧和悲剧、魔幻和现实，能写聪明的傻瓜和愚蠢的国王、女巫和泼妇。但他总是从 3 万英尺的上空俯视他的角色的生活。”但至少有一个例外，莎士比亚不是在远观。1596 年，莎士比亚 11 岁的儿子去世，他在《约翰王》中写了一个母亲失去儿子后的哀痛，“哀伤在我屋里填补了我失去的孩子的地位。它总让我想起他身上各个秀美的部位”。

《莎士比亚笔下的 N 种死亡方式》一书中说：“悲伤、压力或悔恨可能让人长时间陷入极度痛苦，甚至疯癫和死亡，这种想法也许深深印在了莎士比亚心中。”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好几个角色死于过度悲伤：《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说他妻子因为悲伤小儿的放逐而去世，《奥赛罗》里勃拉班修被悲伤摧折了他衰老的生命。过分的哀戚真的会摧残人的生命吗？因为惊闻丧亲的噩耗可能会导致心碎综合征，那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来有应激性心肌病，所以出现了节哀治疗。伊夫林 · 沃的小说《至爱》中描写了悲伤怎样变得矫揉造作，把送别弄得豪华繁琐。

爱泼斯坦的小儿子在 28 岁时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刚听到消息他并没有立刻陷入悲伤，但他的悲伤日益加深，他把儿子的名字嵌入了各种电脑密码。一位朋友安慰他说，儿子去世能带给他的唯一安慰是，以后再也不会遇到比这更让人难过的事情了。

爱丁堡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 · 乔尔比在《悲伤》一书中说，我们有义务悲伤，适量的悲伤表明一个人在乎他人。悲伤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一种紊乱，它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更得体（smart）地悲伤，但我们不可能智胜（outsmart）悲伤。我们也不想那样做”。

作家的曲库

文 · 一朵云里　图 · 谢驭飞



我常去的咖啡馆升级成了早C晚A（早咖啡晚酒类）经营模式，播放的音乐中有一首萨克斯与钢琴协奏的爵士曲《纽约的秋天》。悠扬绵长的曲调，像一双温柔的玉手，褪下客人们白日担在肩头沉甸甸的包袱，如雨点般打在节拍上的钢琴键，又在松弛与轻快间适逢其会。

连续听了几首音乐，发觉张弛有度的节奏感与小酒馆的氛围感百分百契合；原来老板作为村上春树的粉丝，也将偶像作家的曲库“搬”到了夜晚的自家店铺里。痴迷于爵士乐的村上曾经说：“爵士乐是在安静的酒吧，装有坚果的罐子，低沉的声音播放着M.J.Q的VENDOME，然后双份的威士忌加冰，酒精浓香与美妙爵士融合，这世上最好的时光莫过如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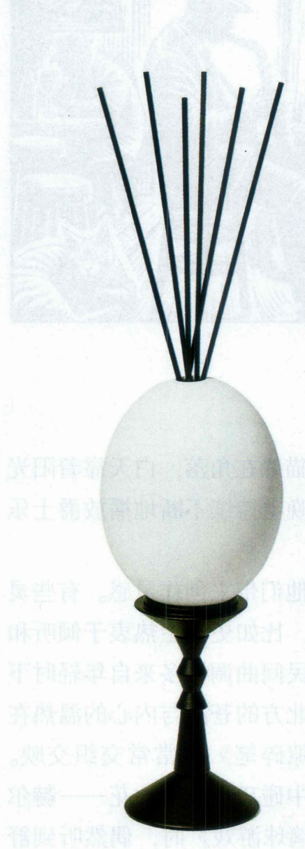
作家对自己喜爱的曲库几乎从不遮遮掩掩，许多文豪很乐意把音乐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之中。普鲁斯特把弗朗索瓦丝的对话比拟成“巴赫的赋格曲”，又将德·夏吕斯先生投向裁缝絮比安的目光形容成“贝多芬戛然而止的乐句”。他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毫不吝啬地提及了音乐家瓦格纳35次、贝多芬25次、德彪西13次，实属文学音乐曲库之典范。

村上的知名作品《挪威的森林》出自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同名歌曲，《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蕴含了李斯特的钢琴组曲《巡礼之年》，当然，他的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爵士乐。除了以曲命名，他还写过一本随笔《爵士乐群英谱》，甚至曾经开过一家爵士酒吧“Peter-Cat”：像一只慵懒的猫躲在角落，白天靠着阳光温暖的窗户煮咖啡，晚上持续不断地播放爵士乐喝美酒，快意美哉！

作家的曲库能为他们带来创作灵感。有些灵感来自于长久的热爱，比如史铁生热衷于倾听和收集陕北民歌，这些民间曲调许多来自年轻时下乡插队的耳濡目染，北方的苍凉与内心的温热在《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中常常交织交映。而另一些则来自生活中碰巧出现的火花——赫尔曼·黑塞在创作《玻璃球游戏》时，偶然听到舒伯特的春天颂歌《菩提花喷吐芳香》，此时适逢花园中接骨木砍枝嫁接，音乐错落有致的旋律与嫩芽苦中回甘的芬芳，让他文思如泉涌，写道：“从那一时刻开始，早春－接骨木香气－舒伯特和音，对我而言，已互相关联，不仅固定，且绝对协调。”

作家喜欢的音乐似乎也会影响其作品的文风。张爱玲喜欢古早的巴哈钢琴乐朴实庄重的老派韵律，她将她喜欢的音乐比成小木屋里嘀嗒摇摆的老钟，绿草原上没有思想的白云彩，以及《第一炉香》葛薇龙穿着的丝绒与柔滑的软缎。余华33岁时用家中旧的卡座CD机与音响组装了一套音乐设备，从此走进巴赫音乐的深处，从那里开始自己的文学freestyle——“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文艺复兴灵感

L' OEuf 系列扩香器外形圆润，造型结合了无釉陶瓷的柔和基调和缎黑色木架的力量感，内置香氛充满木质、强劲的朗姆酒和烟草香味，可使用 3 ～ 4 个月。

万物之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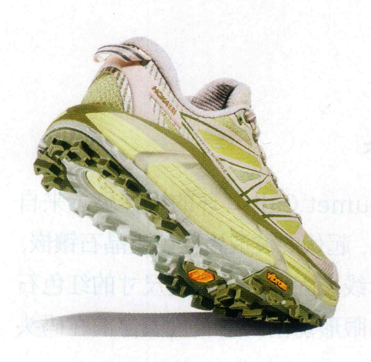
伯爵 Foliatura 绿意光华高级珠宝系列耳环由华丽的绿玉髓叶片和钻石交织而成，宫廷式图腾装饰与 2 颗梨形切割哥伦比亚祖母绿相互映衬，可拆卸式铰链满足多种佩戴方式。



圆桌骑士

罗杰杜彼还原了圣杯征途的故事，环圈采用穆拉诺透明冰蓝色玻璃制作而成，上面覆盖由白色利摩日素瓷制成的大块冰体，呈现对比鲜明的亚光效果，姿态各异的微雕骑士以 18K 玫瑰金浇铸。





户外机能风

MAFATE SPEED 2的鞋面采用蛋酒色与浅绿色的拼接设计，功能上延用了双密度缓冲回弹中底，搭载VIBRAM@超强抓地外底，提供舒适的缓震回弹脚感和强大的防滑性能。



云锦玻璃

S18 Pro机身的“浮光雕花”工艺通过1300万道切线，参考光照投射的明暗规律，刻画出花瓣立体、舒展的动态，400万颗微米级方形钻体模拟出金丝银线织出的云锦般的质感。





便携式全息显示屏

Looking Glass Go可以在不戴VR头显的情况下看到3D图像，提供像素密度更高和多角度的全息图像，内置Wi-Fi和蓝牙甚至还能与ChatGPT驱动的全息AI角色进行互动。



防护性能

Method头盔专为亚洲头型设计，重量仅有400克，采用的航天级材料Koroyd® 蜂巢式能量吸收层，透气性好，严重撞击下也不会变形，MIPS® 大脑保护系统可减少头部遭受有角度的冲击时产生的旋转力。



海港码头

Chaumet Call 耳环的设计灵感来自海港码头，起伏的波浪用蓝色尖晶石镶嵌，钻石海岸线上固定 3 颗渐变尺寸的红色石榴石，马眼形切割的钻石代表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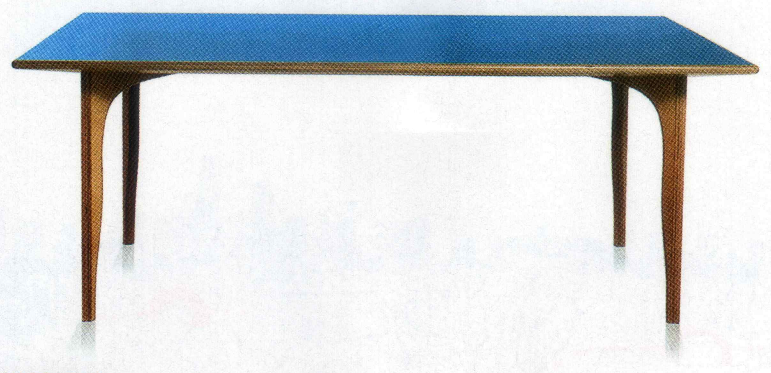
双色花瓶

Ichendorf Revolve 玻璃花瓶遵循双色调设计原则，上下两个分层是它的几何构造基础，以不同色彩捕捉和折射光线。

陶瓷花瓣

Dior Grand Bal 腕表用白色珍珠母贝表盘搭配白金刻面指针，表盘雕刻旭日纹图案，半透明的陶瓷花瓣呈现渐变蓝色的扎染效果。





塔希提蓝

Made by Choice Kolho 餐桌别出心裁地选择特殊色彩的桌面，原木色胶合板表面覆盖亮丽的塔希提蓝色层压板，锥形桌腿切割出略微不规则的弧形线条。



鲸菜板

木头、碎片等回收材料制作的 KnIndustrie Fish 菜板，轮廓是一头张开嘴巴的鲸，磁铁固定的钢碗充当它的大眼睛。



结晶釉面

Flos Céramique 台灯结合传统工艺和 LED 照明技术，灯体使用手工制作的釉面陶瓷，表面涂抹带光泽的结晶漆，角度向下的灯罩便于引导光线。



（插图：范薇）

2023年度生活方式

即时生活

特种兵式旅行，演唱会飞人，成人小饭桌，身份出租，上夜校

记者・卡生

2023年，你应该听过或者有过这样的体验：屏蔽手机信息，找一个酒店“原地度假”，享受一个人追剧、泡澡、无人打扰的时光；买一张单程机票去别的城市，看一场想看却一直没有看的演唱会；逛到家附近的公园，想到风靡一时的“抱树疗法”，不顾身边人奇怪的眼神去抱抱身边那棵树……过上一种当下的、喜欢的、高效的、行动的生活，成为如今许多人的精神状态。

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生活后，尽管我们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但一切似乎又与之前有所不同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好像在身体里生根发芽，对应的是网络中“短暂逃离”的热度。人们所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显现，在年轻人中却出现了一种反向消费的风潮，不是不消费，而是消费方式更强调刚需和实用，把钱用于缓解焦虑或者满足“此时此刻此地”的兴趣。

在采访中我和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聊到这种变化，他说：“当前生活方式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心理状态的巨大转变。疫情对此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身处的‘变局时代’，它让我们生活的传统框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父辈的生活轨迹像是一条预设的铁路，那么‘80后’‘90后’的生活方式更像是一条自己可以选择道路的公路，而现在更年轻的数字一代，他们却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漂流，没有确定的路线，面对的是无尽的不确定性。”

这个观点与波兰社会学家扎伊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写的《流动的现代性》类似。在这本书中，鲍曼提出了“流动现代性”这一概念，指代一种与“固态现代性”或传统工业社会有明显区别的社会状态，他将这个社会结构总结为“液态社会”，它是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的，让世界成为瞬息万变的“流沙”世界。液态社会的出现，是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它释放出了一种活泼、有生机的元素，另一方面流动性也意味着边缘化和安全感的丧失。因为流动，人们经常改变职业、位置、伴侣和价值观念。稳定性是人们生活中出于本能的标准模式，但这种需求在现今社会中却呈现出难以维系和实现的状态。因此，“即时生活”态度反而成为一种灵活且多样性需求的表达。

我们由此观察出发，为2023年度生活方式的封面故事选择了今年社交平台上的几个高频热词，通过对它们的流行以及背后那些生活故事的记录，我们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看即将告别的2023。



抛开生活的复杂与流变，我们的“即时生活”可以提供多样性的视角，晦涩难懂的人生意义没准就散落在其中

City Walk

City Walk又被称为“城市漫游”，深入一座城市，在行走中感受不经意的美好，也被网友调侃为“街溜子”行为。

City Walk的“先驱”是一名叫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的美国自由制片人、导演，他在2020～2023年期间，拍摄了一系列“漫游纽约”的纪录片《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一经上线，就获得了豆瓣9.5、IMDb8.7的评分，《纽约时报》评价这部纪录片是“滑稽搞笑的人类学研究”。纪录片有三季，每一季6集，每集讲一个人们忽视的日常行为指南。以“你好，纽约”开场，威尔逊扛着摄像机在纽约漫游，观察着这座城市里的人和建筑，捕捉到了大家忽略的来自公共场合的快乐和痛苦。在他看似荒诞、随意的镜头中，提供了很多奇异的、让人笑完之后还能思考的话题，“如何在纽约市中心找到公厕”“如何和陌生人攀谈”“如何看待城市中的脚手架”“如何和朋友一起吃饭不吃亏”“如何找到一个停车位”。在威尔逊的漫游里，他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有说城市越是危险越是美丽的钓鱼佬，有用木偶和自己对话的孤独腹语者，有生产汽车形状棺材的厂家，有坚信存在平行世界的曼德拉效应捍卫者……透过一座城市，威尔逊的镜头抵达了当下的生活和人群，它透着荒诞、脆弱，也有温暖和爱，这是City Walk给人带来的观察日常生活但缺失的视角。

特种兵式旅行

“特种兵式旅行”是今年国内出现的一种旅游现象，人们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出发，在最短的时间，或者最少的预算里，以高强度的方式游览尽可能多的景点，主打的是一种高效率的出行方式，“三天两座城，不浪费一秒钟”。在过去的时代中，这种出行方式会被打上“走马观花”的负面评价，但现在，“特种兵式旅行”却有了新的意义，它代表的是年轻人对探求世界的迫切渴望，也是一种对于“不确定”的回应：“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我的同事张星云跟着一位因此走红网络的“特种兵”张楠去上海“特种兵式旅行”了两天，从徐家汇走到外滩，日行五万步。这是张楠今年第25次周末出行，五一期间他曾完成了五天爬完五岳的壮举，是为“特种兵式旅行”的极致。打卡的过程不再是对城市景

观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行走唤起了一种虚拟和现实交织的感官体验。

还有一种特殊的“特种兵”，他们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让自己变成“空中飞人”。孙雅兰采访了一位三个月看了11场演唱会的“空中特种兵”，看着一两千块的演唱会，却住着几十块钱的青旅。“哄自己开心”是他们的座右铭。

上夜校

“Gap Year”（间隔年）在西方最早是指年轻人毕业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暂停休息一年的生活方式。今年在“Gap Year”的基础上发展出了“Gap Day”“Gap Night”“Gap Second”的用法，一年的时间被浓缩成更短暂的一天、一晚，甚至是一个瞬间。在忙碌的生活中，短暂的逃离是人们成本最小的对于原本生活轨迹的叛逃。

这让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罗比逊（Robert Robinson）和约翰·戈比（John Cobb）在70年代提出了“时间深耕”这一概念，即我们的内在时间感被重塑了，这个过程中也创造出了一种紧迫感以及危机感。经历了时间饥荒之后，人们选择让生活充满更加密集的日程安排。正如魏倩所写的上夜校的年轻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花500块钱去学12节课的技能。这已经不是一种向外迎合某种标准的途径，而是通过学习技能获取成就感和幸福感，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Gap Night”。

成人小饭桌

今年的又一个热词“搭子”活跃于社交网络，这符合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提出的“弱联系”，一种既算不上朋友，但又不完全陌生的关系。与亲密关系相比，搭子承载着另一种陪伴功能，既可以填补一部分生活的空白,还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肖楚舟去采访的“成人小饭桌”就是一种新型的找搭子拼桌吃饭的形式。

最开始，“成人小饭桌”是指一批上班族开始在社区小饭桌跟小学生拼桌吃饭，这种滑稽又无奈的现象背后，是年轻人对“好好吃饭”的渴求。跟那些自制外卖盒饭的“小饭桌”不一样，故事中的主人——是把陌生人请到自家餐厅吃一顿亲手烹饪的家常菜，就像组建一桌临时家人。比起吃到什么，小饭桌的客人更在意遇到什么人，聊了什么心事。小饭桌把吃饭这件事情绪化了，它不再只关于食欲，而是一个情感化的社交场所，用一顿饭的亲密来填补胃与心的空虚。

身份出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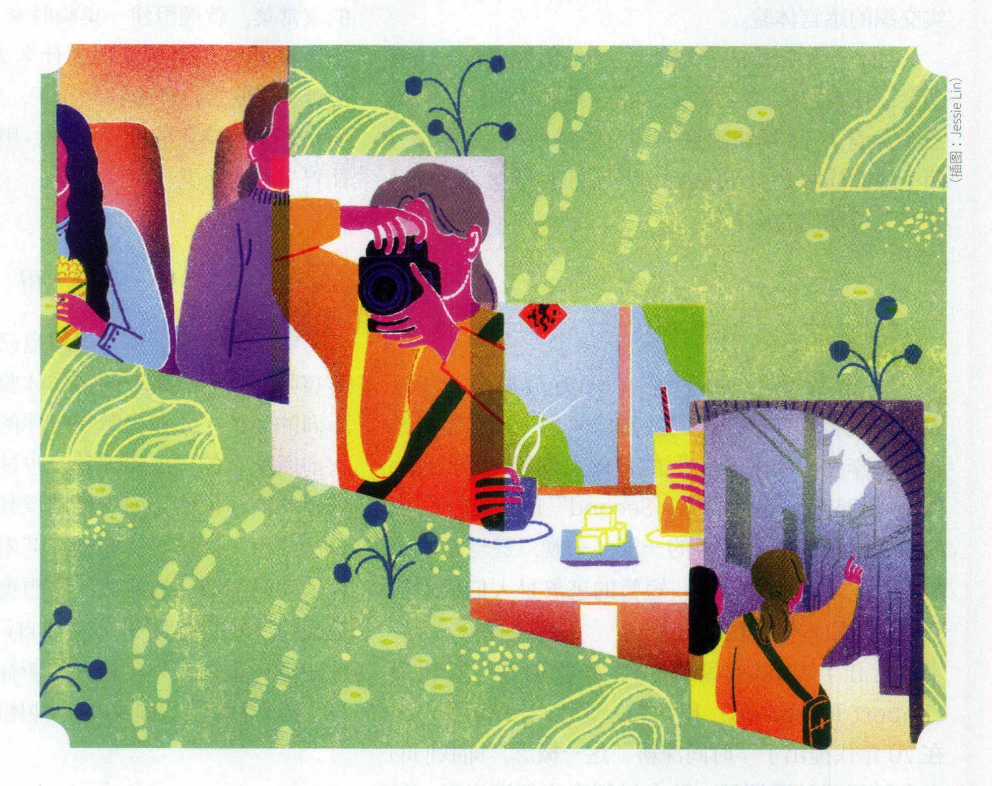
我采访了一名将“出租自己”变为职业的年轻男孩阿楠。通过新奇的工作体验，他接触了上百位不同的委托人，在倾听与陪伴的过程中，体会着他人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孤独，也试图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情绪价值。同事杨聃反其道而行，采访了给自己“租一位妈妈”的网红艺术家邹雅琦，通过这样“即时回馈”的方式，她想重新找到原生家庭中缺失的“爱的能力”，也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流动性的身份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标签，也成为个体适应“流动社会”的能力的一种体现。

◆

“我们过去追求的确定性太多，需要通过减慢节奏来创造不确定性。但现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要寻找小的、即刻的、可以掌握的确定性来抵御焦虑。现在的‘活在当下’代表了另一种加速——在缺乏长远视角时仍然继续行动的积极态度。它代表了一种适应快速变化时代的心态，一种集体性、合作性的行动的方式。如果说，过去的长远目标是A到B，那么此刻，我们需要把人生的旅程切成多个阶段，以‘活在当下’的方式经历它。”李松蔚这样说到他对即时生活和活在当下的理解。

我想起《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的各种行动指南，在一座熟悉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闲聊上几句，在街角的咖啡馆喝一杯，没准几年后它就消失了。威尔逊如此贪婪地用镜头记录着纽约这座城市时说：“纽约是我镜头下的主角，它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再生和失去自己，我很担心一切都会消失。”或许，抛开生活的复杂与流变，我们的“即时生活”可以提供多样性的视角，晦涩难懂的人生的意义没准就散落在其中。

“出租自己”的男孩



（插图：Jessie Lin）

记者·卡生

阿楠是一个将自己租出去的人，工作以小时或天为单位来计价。他说，相比结果而言，此刻的体验感，才是自己生活最好的样子。而在和一个个委托方短暂相处的过程中，他也看见了他人真切的生活故事。

“租”一个采访对象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坐标在景德镇、“出租自己”的男孩阿楠。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出租自己，可以帮助任何事，包括但不限于不想自己一个人搬家收拾打包，出去玩想有人拍照，陪你看星星和日落，想找个人类倾听自己”。给他留言的人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调侃，询问是否能租来做男友，租来带娃，租来拉坯，租来替自己上班……我脑洞大开，不如租他来采访，听听他见到的人间百态。

其实，“出租自己”这个概念在网络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2018年，Twitter上就有一名叫森本祥司的日本男孩，通过把自己租出去，记录下了那些委托人的生活故事，关于他们的爱、烦恼、孤独、好奇以及希望。后来，还有了一部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视剧《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于2020年播出。经历了多年痛苦的上班生活，森本祥司决定活在当下，什么都不做却有稳定的收入是他人生中最快乐满足的事情，“如果需要一个仅仅是用来凑数的人，请利用这项服务”是他发于网络平台上的广告语。经过互联网传播，森本祥司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电视剧中森山将太的原型便是取自于他。全剧12集，每一集都是一

个“委托人”和出租先生相处的故事。森山将太进入到了委托人的人生中，他们中有从东京辞职准备回老家的出版社编辑，有单身solo的年轻女性需要约会指导，有没朋友一起过生日的女大学生找人庆祝生日，还有害怕独自去法院提交离婚协议的职业女性，需要人一起去预约葬礼的孤寡老人……出租先生在短暂的陪伴中，见到普通人脆弱与彷徨的时刻，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难以向身边人吐露的心事。“展开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吧”，阿楠后来向我提到森本祥司时说，是他给了自己试着将自己“租出去”的灵感。

加上了阿楠的微信之后，他发来了第一句话：“请问你有雇用人类的需求吗？”2000年出生的阿楠，“画风”很活泼，无怪乎发在网络平台的广告上他写着自己的人格类型是ESFJ，在十六型人格中，这是最典型的“入世”的性格，友好、富有同情心与责任感，有一种强烈满足他人需求的冲动和热心肠的特质，适合做社会服务性质一类的工作。他的收费方式是4小时内300元，包天500元。和森本祥司不同的是，阿楠并不是出租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相反，他在出租自己时罗列了自己擅长的各项技能，比如会开车、会拍照、会家庭小炒（辣椒炒肉、番茄炖牛腩）、会健身。如果说日本的出租先生是在践行一种“无为而治”的人生态度的话，阿楠出租自己的行为更像是提供一种精准的情绪服务。

由于“出租自己”的业务十分繁忙，租阿楠需要提前三天预约，并支付200元的定金。在我抵达景德镇的第二天，阿楠按照预约时间来酒店接我。他骑着一辆自己改装的二手复古摩托车，穿着时髦，黑色毛衣搭配山本耀司款阔腿裤，外面套着一件今年最流行的美拉德长衫，烫着羊毛小卷，像是一个有些暗黑系的动漫少年。在12月的景德镇，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风很大。如果委托人没有特殊的要求，每次他都会用这辆小摩托去接人。阿楠驾轻就熟，带我去了一家可以买到复古家具的咖啡馆，这是他常常和朋友来的地方。

景德镇城市虽然不大，却驻留着许多外地的年轻人。每一年，景德镇会迎来3万左右的外来人口，他们被称为“景漂”。“漂”这个称号通常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可见景德镇的特别之处。阿楠出生在江西省井冈山，那里离景德镇只有500公里，但他第一次来景德镇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没有一线城市的物价，却能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这也为他开展“出租自己”这项业务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无论是常驻的还是来旅游的，对他有些异想天开的职业都有很大的接纳度。

阿楠今年大学毕业，学的是视觉传达，在6月份交完毕业设计之后，他开始全职出租自己，每个月有20多天的营业日，按照客单价算，他每个月的收入在8000～10000元不等，相比朝九晚五，这份工作看起来自由且有趣。我问他：“出租自己是你的一个生活实验，还是说你认为的确是一个职业？”阿楠说，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4月份的时候他在景德镇做的还是陶瓷电商直播的工作，每天扯着嗓门直播10个小时，回到家累得不成人形。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人生短暂为什么不能选择有趣的工作呢？阿楠的社会经验相较同龄人丰富得多，每年大学寒暑假他都会找一些兼职，他在武汉做过销售，在深圳进过打螺丝的工厂流水线，在庐山的旅游景点当过保安，还在南昌的一家剧本杀公司当过DM主持人。如此丰富的与人打交道的经历背后，是他对人的好奇。他最终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出租自己，让自己成为别人故事的倾听者。

阿楠的出租笔记在小红书上发布后，第二天就涌入了99+的委托人，以他之后的观察看来，其中60%的委托人需求比较普通，委托他带自己“逛吃景德镇”的居多，但也会有一些别样的需求，比如网络上那种“租男友”的单身女孩，租他作为一起看电影的搭子，租他帮忙摆摊卖货，也有独居女孩租他帮忙搬家的。更奇特的当属一个女导播租他一天扮演新郎的，以及租他去河里捞水草与河泥的神秘“北欧女巫”，等等。阿楠说：“你没法想象，人类的需求有着怎样的多样性。”



阿楠已经把“出租自己”作为了一份职业，在这份工作中他见到了人间百态

委托人的孤独

阿楠把自己的客户称为委托人。委托者中女性居多，男性委托者他只遇到过两个。委托人和他之间通常是通过网络平台加上微信，阿楠向委托人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具体的陪伴需求、时间，以及是否有特别注意的事项等。大多数都是在公共场合可以完成的任务，这样对于双方都有相对的安全保障。阿楠不会在见面之前向委托人过多打听对方的信息，比如年龄、职业之类的问题。“你如何确信一个人在你的眼前不是伪装的呢？”他曾见过一身蒸汽朋克少女打扮的大学教授，也见过浑身上下打钉的人其实是一个爱心爆棚的爱宠人士，“我们很容易给予他人定义。”在他这里，委托人需要的情绪价值往往是打破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不是我主宰生活，而是它主宰着我。”阿楠和我聊着天，这突然的诗意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阿楠和我分析什么样的人会来租赁自己：一些有好奇心且想体验生活的女孩，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从事和文艺相关的工作；厌倦了大城市内卷打工生活的年轻人，裸辞之后独自来景德镇旅行或是学习做陶，这时候是人最迷茫的“GAP YEAR”阶段，对于陪伴的需求也变得异常旺盛。除去找他做导游的普通委托之外，其他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帮助，另一种是情绪陪伴，但无论是怎样的需求，阿楠都会留意委托人自身的状态，根据委托人的需求，他提供的服务有时候是倾听，有时候是讲述。

阿楠的第一个委托人是一个在日本做房屋买卖的东北女孩，回国之后，举目无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跟人说过话。她想在景德镇附近的古村落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房子留下。她租了阿楠一天时间。一路上，女孩讲了很多在日本独自生活的孤独，住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寓里，每天早出晚归，生活中没有朋友，工作伙伴之间保持着礼貌与体面的距离，原本是开朗的性格，渐渐也变得闭塞。她的语气中透露着对自己的失望和遗憾。

那是阿楠第一次出租自己，他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女孩用不大的声音这样讲着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那一天，阳光很好。女孩最后并没有在景德镇的村里找到合适的院子，但阿楠察觉她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像一个树洞，用倾听安抚了一个女孩。

“孤独”是阿楠在委托人身上看到过的最多的印象。他接待过的人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女孩，只有十六七岁，发来信息想找他陪着一起看夜场，一部追凶电影。女孩是本地人，应该有许多朋友才对，电影开场前，阿楠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租一个人一起看电影呢？”女孩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电影，是不是有时间，都不会让我觉得有负担。”阿楠有些惊讶于女孩的成熟，他觉得在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孩身上看到了一种自愿的

孤独，也是日本所说的“无缘社会”。这可能也是今年“搭子文化”如此盛行的原因。

电影散场之后，女孩聊到自己已经不再上学，父母也不在身边。阿楠想开口说些什么，为什么不读书呢？为什么一个人住呢？最终，他还是没有问出口，这是他给这个职业的限制，不去评判和干涉委托人的生活。

帮一个女孩一起搬家是阿楠的另一次委托。一个内向的独居女孩，家门口的地上写着“生人勿近”“快递放在这里”。女孩毕业于某所美术学院，租住在两室一厅的出租屋里，地上摆了收拾了一半的三个箱子和一个蛇皮袋。没有太多寒暄，阿楠着手帮她一起收拾起了行李。女孩说起她的很多同学已经在艺术道路上小有成就，她自己曾在画廊工作过，但创作上却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一个人来景德镇，也是为了在这里认真创作。两人一起上了货拉拉，到新家后，阿楠主动帮女孩打扫了一个小时的屋子。这个新家虽然是在一个老小区里，墙上还有很老土的荷花和鱼的贴纸，但不知道为什么，阿楠觉得，阳光洒在地板上暖洋洋的，很温馨。他对女孩说：“你的新生活开始了。”

相比本地的线下出租，线上业务阿楠接得很少，偶尔也会出现异地的委托人。一个大一的女孩让他印象深刻，用不多的生活费租了他3个小时，只为找他倾诉。女孩从小是一名学霸，上了大学之后产生了落差感，一方面是离家的恐惧，另一方面是优秀的人太多。她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5点就要起床，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学生会活动，晚上到健身房健身，抽空去敬老院做义工。在和阿楠的电话中，女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过于追求完美，只要中间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影响了下一个，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最终就会崩溃。阿楠比她大几岁，他插空聊上几句自己大学时期的迷茫。他不是心理医生，不是老师，这让女孩可以对他袒露无遗——出租自己也是一种消费，有偿服务反而会让人们更加心安理得。说到底，他是收了3小时钱的陌生的倾听者，电话一旦挂了，这个故事就“阅后即焚”。阿楠和这个委托女孩对此都有一种共识，他们此刻的关系是安全且遥远的，“虽然陪伴是短暂且即时的，但是很有效，明天一睁眼，她知道还得是自己去面对一切”。

阿楠坐在我的对面，我们已经喝下了两杯咖啡，这些故事在阿楠的生活里忽远忽近。他换了一种“中途休息”的口吻说：“我们要不聊一些比较开心的出租自己的经历吧？现在已经是午餐时间了。”

“很多故事治愈过我”

共进午餐的地方是一家受欢迎的本地网红餐厅，我和阿楠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职业可以存下钱来，因为在委托服务中产生的一切消费都是对方负责。

午餐时间，我们聊的都是比较奇葩的有趣的故事。“有趣”其实是阿楠对于出租自己这件事最多的描述词，也是他这个年纪的男孩非常更乐于分享的。他被人租做“男友”去“结婚”，被人租做“恋爱军师”，这些故事很像是冯小刚多年前拍的《甲方乙方》中的桥段。关于被租做新郎的故事，缘起是某个地方要拍宣传片，原本预定了10对新人录制一场真人秀集体婚礼，但其中一对不知何故无法参加，说好了“十全十美”，这可吓坏了女导播，四处托人找一对扮演“假结婚”的夫妻，却怎么都找不到人，毕竟要录影成像，广为传播。有人推荐了阿楠的出租项目给女导播，女导播当天亲自下场，和阿楠演了一对夫妻，混迹在九对真结婚的人里头。他们编造了假的名字，说了一段从网上抄下来的誓言，阿楠真切地体验了一把结婚的“真流程”。“怎么说呢？我有一瞬间都觉得我们才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真夫妻结婚都无话可说，就我和女导播有说有笑聊了一路。”阿楠说。

“恋爱军师”的故事同样有着COSPLAY的气质。有一天晚上，阿楠收到一条微信：“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打羽毛球？”阿楠留意了一下，委托人的头像一般都是软萌妹子，这一次是一个留着寸头、很壮的韩国男星马东锡的头像，可对方明明是一个女孩，这让阿楠对这位委托人充满了好奇。第二天阿楠如约而至。他在楼下等来了一

个骑着复古三轮摩托车的骑手，停车时，三轮摩托来了一个漂亮的甩尾，女孩摘下头盔示意他上车，阿楠一时间有些发懵，“上车”，女孩以命令的口吻再次发号施令。阿楠坐进了车斗，女孩一踩油门，车一路飞奔，阿楠觉得自己从未这么“娇小”过。后来一聊才得知，女孩曾是一名女兵，性格雷厉风行，十分男孩子气。女孩的真实诉求也并不是要打羽毛球，而是要他帮忙分析一段“无处安放”的情感，并扮演一天的男朋友，让她可以把他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劝退一个追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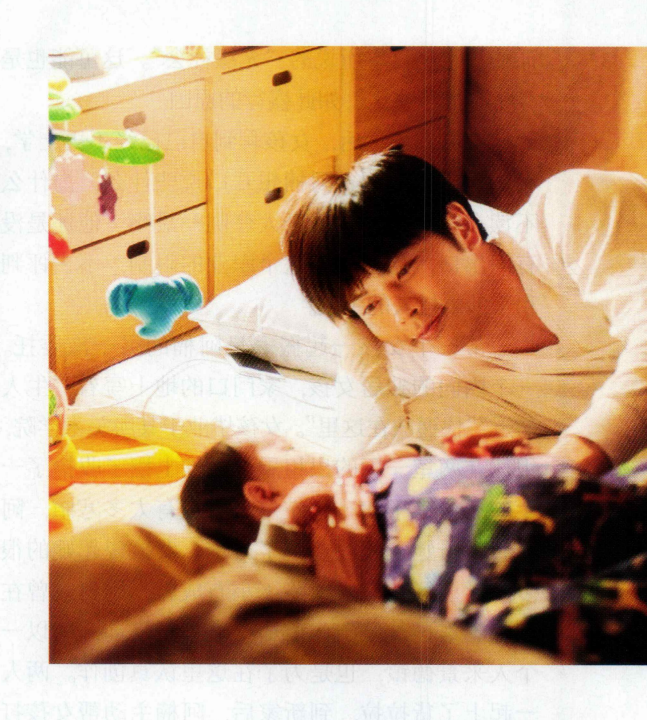
她掏出了一张照片，里面的男孩文质彬彬，显得青涩，比女孩小几岁，是她青梅竹马玩到大的弟弟。“他最近跟我表白了，可我不打算接受，但又怕伤害了他。”飒爽女兵对于男女相处的尺度和边界不太拎得清楚，她给阿楠看一些聊天记录，或许是一些原本插科打诨的话让弟弟感受到了爱意？尽管阿楠也没有阅尽情感，但在他看来，女孩的言辞之间的确有些越界却不自知的部分。按照女孩的要求，他陪伴着打羽毛球的照片被女孩放进了朋友圈里的九宫格。

至于后续是怎样的，阿楠说，当他提供的服务结束，他不会再过多地去询问，因为在委托人和他之间，这种关系是有着时效性的，除非委托人下一次再找来，那或许又是另外的故事。当然，很多时候也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有些当地的委托人后来和阿楠成为朋友，他就不再好意思收费，这曾一度让阿楠十分苦恼。

还有一次，一个女孩找到他，要求一起做饭，一起游戏，一起看电影，一起看落日。他在把自己租出去之时，似乎也假戏真做，对女孩产生了别样的情感，但“出租自己”这个底线让他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情感，最后他拒绝了女孩。他的拒绝更多是出于一种职业考虑，尽管后来他的女朋友也曾是他的委托人，但阿楠反复强调这两者的区别，前者是想从委托关系变成情侣，后者是结束了委托关系后，两人慢慢发展了更长远的关系。

“出租自己的过程应该永远是中立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我正在慢慢建立这种边界。”阿楠说。

我问阿楠：“这份职业给你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阿楠说：“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看上去是别人花钱满足自己即刻的需求，比如他们需要一段陪伴，需要一个树洞，而我在他们身上又获得了什么？”他停下想了想，“我在这一段段的关系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一些人生方向，很多故事治愈过我。”

有一个委托，是让他每天带着委托人捡回来的流浪猫去医院打针。委托人是一名看上去不好惹的文身师，她偶然在家里小区看到一只生病的三花小猫被冻得奄奄一息，心软了，最后决定带回家救助。小猫在医院里查出来患上了很难治疗的猫鼻支，每天需要到医院输液，不光花费很高，救过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情况特殊，阿楠只收了女孩一次15元的费用，一次性预约了一周的服务。那段时间，阿楠起得很早，早上把小猫送去医院，晚上接回来。头四天一切安然无恙，看着小猫一天天好起来，阿楠也觉得这次救助是有希望的。第五天早晨，委托人说，你不用来了，小猫已经走了。阿楠很难过，尽管只是一只小猫，但一种失去感触动了他，原本有些计较的东西在生死面前好像无足轻重，当下才是重要的，这让他的内心很久无法平静下来。





左、右图：以日本森本祥司出租自己故事改编的日剧《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剧照

还有一位男性委托人的故事，让阿楠印象深刻。委托人离开景德镇出去读了大学，他在异地给爷爷奶奶网购了一台电视机，他的委托是请阿楠去家里看看，假装是他的朋友来帮忙安装电视。阿楠一进门，习惯性地打量了一下，那是一个充满了“老人气”的房子，阳台上堆着各种各样捡来的纸盒子，家中稍微贵重一些的电器都被老人盖上了碎花的小布。听说孙子的朋友来帮忙，爷爷十分高兴。阿楠折腾了半小时，电视机终于在晚饭前发出了声响，最终无法推脱两位老人的心意，在委托人家里吃了顿饺子。他有一些局促，他心里明白，自己要伪装成孙子的热心朋友，但竟然也真实地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感受。

阿楠和我聊起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在井冈山老家，父母早年就去广州打工，爸爸做工程，妈妈当家庭妇女，后来还生了一个比阿楠小十几岁的弟弟。阿楠是爷爷奶奶养大的孩子，属于留守儿童，从小来自父母的关照就很少，高中之前，自卑的他甚至不敢跟人说话。他找到了照片让我看，模糊的照片中，和现在的他判若两人。还要去追溯原生家庭的不安全感吗？阿楠说：“那个追溯不安全的来源的过程就像是你非要揪出一个导致你生活失败的元凶，但对于此刻，它毫无用处。”

“出租自己”这么奇特的工作是否告诉过家里人？阿楠说暂时没有，因为他无法向传统的父母解释这份工作。阿楠的父母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希望他有安稳的生活，最好是能读研考公，找一个有编制的工作。

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楠在一个男性委托人身上似乎找到了答案。委托人是一个40岁不到的大学建筑系教授，一个人来景德镇旅行，他对阿楠的故事充满了好奇，更像是花钱来听阿楠故事的人。阿楠和这位教授聊着自己的困惑、彷徨。他无法认清人生未来的方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呢？教授没有像长辈一样告诉他答案，只是和他讲了一些自己20多岁时的事，“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没钱，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选择背着包去旅行，总有一个念想，就是要去多看一点世界，才能知道自己的意义”。阿楠说，教授现在在寒暑假依然用双脚和眼睛丈量世界，他养了两条罗威纳，虽然也交过女朋友，但后来发现一个人生活也很好。这让23岁的阿楠羡慕不已，这是他最渴望的人到中年的样子，松弛、笃定，且依然保持旺盛的好奇心。

租妈妈，一场艺术实验的自我治愈


（李英武/摄）

“重金求母”项目中，邹雅琦留存了和每一位妈妈的共同记忆

记者：杨翀

日薪3000元能买来母爱吗？无论结果如何，邹雅琦都决定通过“重金求母”重养自己7次。每“解锁”一位新妈妈，就伴随着“解锁”一种没有体验过的母爱。

应聘“当妈”

“如果满分是10分，你现在的紧张程度是几分？”

“7分。”我说。

“我有10分。”邹雅琦说。

随即，我和她面面相觑。眼前这位化着精致妆容的女孩是一位签约艺术家。两年前，邹雅琦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以“不花钱，在北京体面生活21天”为题的毕业设计，让她从“艺术家预备役”成了“网红艺术家”。这项生存挑战被冠以“假扮名媛，蹭高奢生活”之名，在网络上疯狂传播，有人钦佩她的勇气和执行力，更多人则是满足于片面地看到一个社会奇观。

今年邹雅琦又一次“出圈”了，年初发起的艺术项目“重金求母”再次让大家好奇，这个姑娘在干什么？日薪3000元租来的妈妈，能给她想要的母爱吗？

带着同样的问题，还有采访任务，我来“强行”应聘了。

说是“强行”一点不过分。依照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聘要求，“24～72小时内，我们竭尽全力地扮演母女，唯一的要求是生育过的女性，没有年龄限制”，我连她唯一的要求都没达到。目前为止，邹雅琦计划的7个母亲名额已经用掉了4个。不算我这个“番外版”的存在，她从后台涌入的上万条留言中，选中过一位19岁的妈妈，一位情感浓度极高的于女士，一位“富婆”妈妈和一位摩梭人妈妈。视频内容也已经“上架”，处于接受网友“检阅”的状态。

“应聘”的地点在邹雅琦的工作室。一进门，我就开始极力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试图融入。高高的举架被她将一侧隔为上下两层，另一侧空旷的空间被落地窗照亮，一览无遗。工作室的调性跟邹雅琦在网络上的风格很契合——暗黑系二次元美学。巨大的水晶吊灯没有挂在它原本该出现的高棚顶，而是从隔断的二层围栏上半垂下来，旁边矗立着一架扎眼的桃红色升降机，用以联通上下。它每次升起都伴随轰鸣声，仪式感十足。除了持续两个来小时的来回踱步，无处安坐，我还算淡定。之前那位 19 岁的妈妈比我紧张多了，用邹雅琦的描述，简直是“手足无措”。这也难怪，毕竟是应聘“妈妈”，一个人人都熟悉却没有鲜明“行业标准”的“职业”。

邹雅琦的 MBTI 是“凡·高同款”INFP，据说这是最容易出艺术家的类型之一——另一个类型是我刚好属于的 ISFP。两个“i 人”的相互熟悉阶段免不了大段大段的空气凝滞。她的话不多，总把“没关系”挂在嘴边。在“重金求母”的最初构想中，邹雅琦计划按照剧本来——大家熟悉一天，彩排一天，正式演绎一天。然而，经历过第一任妈妈的短暂执行过程后，剧本就被丢弃了。我被邹雅琦定位成一位“客体”妈妈，只需尽量对她的行为做出反馈。她是正确的，缺少身为人母的本能，我基本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能力。就连听到“女儿”说，“下午 3 点多才吃当天第一顿饭”，我这个“当妈”的，都没有第一时间心疼地埋怨，“饮食怎么这么不规律”，反而好奇，她上一顿凌晨的“大餐”吃了什么，那么饱。

情绪酝酿结束，我们一起站上桃红色升降机，从公共区域来到她的“私人领地”。这也标志着我开始以“妈妈”的身份“试营业”了，升降机的轰鸣声像是在为“晋升仪式”奏乐。

二层的化妆台和衣帽间见证过此前两位妈妈的“妆造”。在邹雅琦的最初构想中，7 位妈妈说话的语气、形象，乃至身上的气味，都要和她心目中“完美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们会喷上同一种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 vintage 香水，穿上同一件衣服。“我希望 7 个妈妈逐渐完美——越来越像我想要的妈妈的样子。”邹雅琦承认这是自己的“偏执表达”，一方面，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那样一组图像在展厅里呈现，会很有形式感。另一方面，7 位不同背景的妈妈，为了满足她的规训，抹掉自己的痕迹，“这和我们在满足社会的规矩是类似的”。细思之下，她觉得自己不只想要一个“完美的母亲”，“我是贪心的，我在贪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甚至有一点违背伦理”。

邹雅琦相信很多关注她作品的人都出于猎奇心态。但“重金求母”不是一次突发奇想。

缺母爱，补母爱

邹雅琦曾将自己的原生家庭描述为“一个典型东亚社会的四口之家”——父亲是权力中心，母亲是父亲的依附者，弟弟被视为家里的“香火”，拥有继承权而被偏爱，她则是“不被在意”的存在。在邹雅琦的记忆中，身为幼儿园老师的母亲对其他小朋友都是温柔关切的，唯独留给她的爱显得有些表面。当弟弟降生之后，她感受到的母爱就更加是冷漠的。

邹雅琦这种源自原生家庭的困扰，在网络的争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曾经有个豆瓣小组叫“父母皆祸害”，不少人自发聚集在里面讨论和父母的关系。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邹雅琦虽然不是豆瓣受众，但也多少受到那一代网络余波的影响，“父母那辈奉行的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而我们这一代在谈及原生家庭的时候，认为它是有讨论空间的。这是一个代际的改变”。

去年，邹雅琦 24 岁，跟母亲生下她的时候一样大。她早就计划在这个“象征性”的年龄上做些事，算是“自我拯救”好了。一天晚上，邹雅琦像是被点拨了一个“潜伏了很久的思考”：如果雇用一位妈妈就能得到母爱，是不是能让生活拥有更多可能性？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很多人晚上会有灵感大爆发的错觉……薛定谔的创作方案，明天醒来才知道是天才还是狗屎。

第二天，在签约画廊的支持下，“重金求母”开始筹备。

多亏了“假扮名媛”积攒下的人气，招聘信息公开之后，粉丝和路人纷纷发来私信。令人意

外的是，涌向后台的评论很少有人质疑“重金求母”的设置，反而是一片能跟她产生共鸣的声音。一部分母女关系极佳的粉丝，想跟邹雅琦分享她们的妈妈；一部分觉得自己妈妈太强悍的粉丝，想让邹雅琦帮忙“改造”她们；还有一部分极为特殊的存在——那些报名者还未成年，她们各自有其特殊的经历，无论是从性教育的角度，还是从小女孩要面临的社会问题角度，都让邹雅琦觉得有必要正视一下。就这样，“19岁的妈妈”第一个当选了。

19岁妈妈“完成”了邹雅琦的所有初始构想。首先是接受改造：做发型，用粉底遮盖文身，换装。镜头里，19岁妈妈穿的小黑裙，是邹雅琦仿照戴安娜王妃的复仇者套装DIY的，因为她的亲生母亲很喜欢戴妃。喷上vintage香水，犹如在修图步骤中最后加一层滤镜，帮她们“伪造”出90年代末的氛围感。邹雅琦喜欢那味道中透出的温柔，感觉“就像一串被成熟女性贴身戴过的白珍珠，因年代感而微微泛黄，却不失温润”，可惜，浓重的化妆品和发胶味盖过了香水，一切都在提醒她这是假的。

她们按照剧本极力扮演，可哪怕经历过反复彩排，口中蹦出的台词依旧难掩生硬，那些自由发挥的地方就更糟糕了。邹雅琦越是表现得渴望得到母爱，19岁妈妈越是无力回应。“她也还是个孩子，她身上没有爱，因为没有人爱过她”，乃至于在后半段，邹雅琦出于怜悯，开始反向讨好，“就像曾经讨好我亲妈一样”。

第一段不太成功的“初体验”帮邹雅琦厘清了思路，她明确知道下一个“妈妈”的完美人选是怎样的：一位有包容力的传统母亲，最重要的是能提供百分之百的爱。精通国画、情感细腻、古典美，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感受让邹雅琦选中了于女士。果然，艺术的语言是相通的，她们之间全然不存在“沟通成本”，这让邹雅琦坦然地随心所欲，比如展露性感，比如主动暴露矛盾，或是发起控诉。

纪伯伦展示人性虚伪的《梦游者》被选中为台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母女困境的极端写照。“够了，够了，我的冤孽，是你耗尽了我的青春，是你吸走了岁月的精华，只剩下人生的残渣，我恨不得杀了你”，当于女士在演绎这段对白时，假装沉睡的邹雅琦按捺着内心的波澜，她仿佛终于听到自己亲妈说出心底话了。然后，于女士佯装睡去，邹雅琦起身回击，“你以为你的青春都给我了吗？你的残生绑架着我的余生，你才应该去死”。万籁俱寂，黎明破晓，清醒了的“母女”又扮回了白天的亲昵。这段即兴话剧让邹雅琦狠狠过了一把瘾，“其实我跟我亲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我们是表面的和平”。

于女士带来的安全感，让邹雅琦把很想却又不敢对自己亲妈的表达，一股脑都倾泻出来。她将于女士带在额前的Go Pro当作来自亲妈的凝视，对着它肆无忌惮地展示着自己裸露的身体：“这是我第一次在你面前，给你看我的样子，你不再熟悉的女儿的身体。我的基因来源于你，但我不属于你……我恨你，妈妈，但是我也很爱你。”于女士心痛地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抱住了她，“宝贝，从此以后你就解脱了”。这份意外来临的道歉和拥抱，让邹雅琦感到极大的治愈。

在此之前，邹雅琦并没有对“重金求母”报以太大期望，她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悲惨的飞蛾扑火”，自己根本得不到爱。即便如此，她仍要一试，因为“它是我渴望的东西，我的职业也允许我去做”。

重养自己好几次

放弃“偏执表达”，不再追求7位母亲以统一的形象剧本扮演，给“重金求母”和邹雅琦自己都开了一扇窗。她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情感需求租妈妈了。

有一位“人生导师”般的妈妈，感觉是怎样的？就这样，第三位“富婆”妈妈当选了。即便没有于女士那么高的情感浓度，“富婆”妈妈带来的相处模式同样令人自在。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平等交流。邹雅琦跟她分享学生时期遭遇校园霸凌的小秘密，“富婆”妈妈就用自己在职场中被同事排挤的经历，教授“女儿”如何运用生活的智慧来调节矛盾。她们一起逛街、做运动、讨论时尚穿搭。以“我本自具足”为人生箴言的“富婆”


（李英武 摄）

发起“重金求母”的邹雅琦

妈妈，让邹雅琦明白了先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其他人。

每“解锁”一位新妈妈，就伴随着“解锁”一种没有体验过的母爱。在选择第四位妈妈时，邹雅琦决定让自己暂时逃离父权社会的“审判”，让自己在母系氏族里“重养”一次。这也是她把自己重养得最彻底的一次。

由于航班临时取消，辗转的邹雅琦到达泸沽湖的阿妈家已经天黑了。这里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夜不闭户”。来之前，邹雅琦就已经做过功课，相比于商业化的云南景点，泸沽湖还保留着难得的古朴。第二天，见过阿妈之后，这次是邹雅琦自己要接受“变装”：盘起长发，戴上头饰，换上摩梭人传统的金边上衣和百褶裙，她甚至有了一个新名字：卓玛拉姆。

卓玛拉姆一边适应着自己的新名字，一边观察着新的居住环境。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泸沽湖也是全国唯一还保留着母系氏族聚居的地方。家家户户的当家人被称为老祖母，所以家里最重要的屋子叫“祖母屋”。在她看来，摩梭人的房子有点像四合院。祖母屋设在一层，旁边是两层的或者是更高的经楼，再旁边的花房，就是家里小一辈的卧室。

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卓玛拉姆自然也有自己的花房。阿妈对卓玛拉姆说，在这里，13岁的女孩就有“成丁礼”了，那就意味着她说的话在家庭中就是有分量的。而这对于汉族女儿邹雅琦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感受。在邹雅琦的原生家庭里，父亲从不把她当作一个可以参与家庭事务的人选，“哪怕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胜任”。

在泸沽湖，卓玛拉姆发现大家每天都很悠闲地欣赏四时芳物，湖水晨曦时如碧玉，夕阳时平

静如镜，夜晚星光与波光交映。没人在意你是否事业成功，年薪多少。看着湖水里的倒影，明亮的衣服，鲜红的唇妆，自诩“忧郁青年艺术家”的邹雅琦好像真正变成了“向日葵”卓玛拉姆，“我感觉自己做了20多年暗黑系美少女，从未有过那么大的生命活力”。

阿妈喜欢带卓玛拉姆出门体验。在去参加篝火晚会的路上，卓玛拉姆发现，一路上的人大家互相认识，同一个话题，哪怕老远走来的人也能接上。在城市里的“i人”邹雅琦是社恐的，但是在泸沽湖的卓玛拉姆就很乐于融入。篝火晚会上，卓玛拉姆牵着姐姐、哥哥们的手，跳得稀烂，还差点打乱了大家的阵法，但她仍然乐此不疲，参与其中。

卓玛拉姆问阿妈，摩梭人对孩子的期待是怎样的。阿妈回答：健康平安，无论何时都可以放心地回家。这种不被“审判”的感受，对邹雅琦来说也是陌生的。她发现，这里真的没有人会被指责。有一天，姐姐做饭咸了些，大家只是笑着说“好咸”，然后开开心心把它全部吃光了。在邹雅琦的记忆里，小时候母亲做饭咸了，父亲就会指责，很可能就会导致吵架。在这里，每个人都很尊重姐姐的劳动。邹雅琦心想：“我被当成受尊重的个体来看待了，这也是我渴望的事情。”

3天时间转眼即逝，在离开泸沽湖的飞机上，邹雅琦泣不成声，空姐怕她身体不舒服过来询问，她抽泣着回复说：“没事，就是有点想家了。”而她也知道自己口中的那个家，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乌托邦”。

在第四位妈妈之后，邹雅琦很久没有再开启“重金求母”的项目。一方面，她一定要找内心很渴望来当她母亲的人，另一方面，就像她说的，有点“虚无”了，肯定还有她想体验的母爱，但邹雅琦自己也不确定那是什么样的。这才给我的“强行”应聘，留有了缝隙。

有行动力的自我疗愈

跟前几位母亲不同，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我的“试营业”任务是陪伴邹雅琦入睡。穿过二层的“妆造”空间，径直走，来到卧室。光线是昏暗的，氛围是惬意的，床是松软的。我们并肩平躺着，中间隔了四五十厘米。事实证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叫自己妈妈，也不会觉得很离奇。只不过那声“妈妈”，对我来说，更像一声指令。

“妈妈，我最近花掉了很多钱”，睡前的温馨对话开启了。我侧身面向她，也多谢昏暗的光模糊了彼此的尴尬。蓬松的被子把她整个裹住，将将露出脸。在富于童话色彩的红丝绒窗帘和黑色洛可可吊灯的烘托下，那声音多了一层天真的底色。我略微出神地听着她滔滔不绝的分享，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当我意识到，这大段大段的信息是一个长长的抛向我的问题时，为时已晚。

“妈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什么？这个问题从何而来？”我内心发出的问号比她还多，但也只能故作镇定地赶紧从我能记起来的地方捡起话头，用模棱两可的语焉不详来和稀泥。

“我说的不是这个。”她打断了我的话。就像一个偷懒被抓包的采访对象，我重新明确问题，谨慎作答。之后的对话中，我再也没敢溜过神，极力解析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对于我的建议或回答，她都以“好，我觉得可以”，或者“好，原来妈妈是这样想的”来终结话题。那话音里洋溢的心满意足让我不自禁反思，刚才的回复是不是太仓促了，下一个回答是不是应该再全面一些。

话匣子逐渐打开，我们从死亡、珍爱之物的逝去聊到了恐惧。当说到面对成长的困惑，期待得到女性长辈的指导，但身边求助无门时，彼此的眼眶都湿润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关注“重金求母”，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邹雅琦与其原生家庭之间的问题，也是自己未曾走出的困境，人人都有各自或大或小的伤痛。

好在，一个小时的密集对话不全是沉重的，在“她向往热带，我习惯寒冷”的分歧中，她假装睡去。正当我犹豫要不要伸出手，像妈妈一样帮她整理被子时，一个清醒而干脆的声音穿透被子问道，“你觉得可以了吗？”——“试营业”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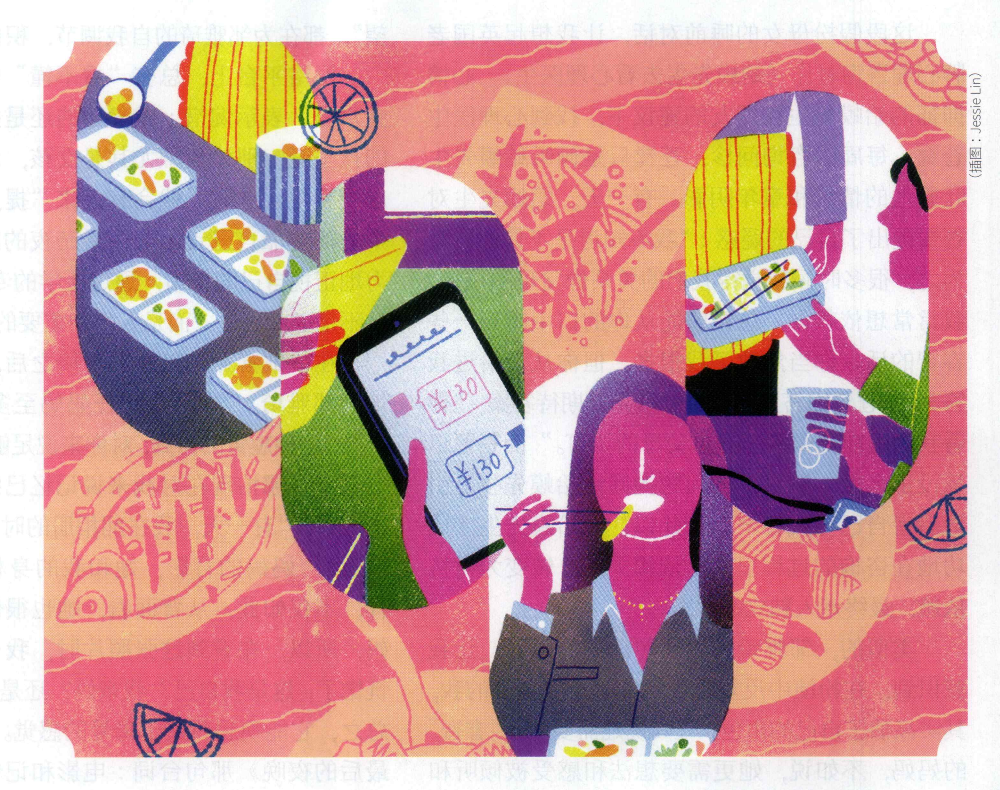
这段假扮母女的睡前对话，让我想起英国老牌心理咨询著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心情抑郁的蛤蟆先生在朋友的建议下，找到心理医生苍鹭。每周的咨询问诊，苍鹭只是倾听蛤蟆先生吐露他的情绪和童年阴影。有一天，蛤蟆先生对苍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为之，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像父母和孩子，我常常想依赖你，总希望能从你的口中听到一些睿智的话。你当然教了我很多，但你从没给过我答案。”苍鹭回答，他知道蛤蟆先生期待答案，“你看我的眼神就像孩子寻求父母的认可。”而苍鹭尽量没那么做，他总是把问题抛回给蛤蟆先生，引导后者自己寻找答案。长此以往，蛤蟆先生才成功地在咨询的过程里，从依赖关系，转变为对抗依赖，最终走入独立的状态。

类似的，邹雅琦最后那句清醒的声音，让我意识到，在扮演中反复思量答案够不够全面的我，其实高估了自己的角色。与其说她需要一个“睿智”的妈妈，不如说，她更需要想法和感受被倾听和被关注。对于前几任妈妈来说，亦是如此，无论能否给她带来爱的感受，她们陪她重走的那些“回望”，都在为邹雅琦的自我调节，积蓄能量。

网络平台上，总有“看不懂”的人，对“重金求母”表示惋惜：做父母的还是好好疼爱自己的孩子吧，别让孩子尤其是女孩，以这样的方式虚度人生。这时，就会有人来“提点”他们：每个人都要靠自己走出人生最暗夜的时期，她很努力地正视自己的伤口，通过所学的专业自我疗愈，这不是虚度人生，而是人生中重要的课题。

在“试营业”以失败告终之后，我毫无负担地问邹雅琦：“你跟每一任妈妈至多不过相处72小时，这种短暂的得到，对你来说足够了吗？”“完全够了，哪怕现在对我来说记忆已经在覆盖了。”她回答，“有一天，我在翻相册的时候，翻到一张‘富婆’妈妈的背影，她和我的身材维度几乎一样，不仅如此，从背面看，她也很像我的亲生妈妈，所以，在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一开始都有点恍惚了，这是我自己？我亲妈？还是第三位妈妈？总之，它能唤起我关于母爱的感觉。”就像《地球最后的夜晚》那句台词：电影和记忆最大的区别是，电影肯定是假的，是由一个又一个镜头组成的，而记忆分不出真假，它随时浮现在眼前。

成人小饭桌，一顿饭时间的亲密



(插图：Jessie Lin)

记者 · 肖楚舟

“成人小饭桌”不是个新鲜的概念，把家常菜做成外卖的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回家吃饭”App。但一一的小饭桌和他们不同，她亲手在家做饭，请陌生人到自己家餐厅坐下吃。一一觉得，小饭桌能提供的不只是稀缺的烟火气、盲盒社交的新鲜感，还有好好生活的珍重态度。

给陌生人做饭

我们是在午饭前到达一一家的。这是一栋北京常见的老式板楼，位于年轻人活动集中的三里屯附近。一字形的狭长户型经过改造变得敞亮，客厅与阳台连成一体，厨房与次卧的隔墙取消，即使在初雪后的阴天，光线也能均匀地洒进屋内，照顾到角落里的绿植。

进门，左转是厨房，右转是餐厅。尽管我们声称不饿，一一还是去厨房倒了两杯热度刚好的温水，端出来一小碟怪味花生。厨房不到两米宽，三四米长，用半堵矮柜和旁边的书房隔开，柜子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锅碗，多站一个人就会有些拥挤。餐厅里一张餐桌靠墙放着，四把椅子两两相对。仔细看会发现，四张餐椅色调一致，但造型不同。

今年7月到12月，一一在自己家里办了50多次“成人小饭桌”，平均一周三次，每次招待三四个人，已经有150多个陌生人走进她家的餐厅。

“成人小饭桌”不是个新鲜的概念。今年4月，一则上班族报名社区小饭桌，和小学生拼桌吃饭的新闻上了热搜。社交平台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在家自制家常菜、给上班族送餐上门的“小饭桌”账号。其实类似的业态早在2014年就火过一次，当时主打家常菜外卖的“回家吃饭”App被称为“餐饮界滴滴”，后来很快因为品控、安全争议偃旗息

鼓，在2020年黯然下线。时过境迁，成人小饭桌怎么又火了？请人来家吃饭，和外卖家常菜有什么区别？大家在陌生人的餐厅里，找到了什么样的满足感？

一一告诉我，她在家做饭给陌生人吃的念头始于失业。被裁员前，她是互联网大厂的交互设计师，负责改进软件的用户界面。行业大环境不好，一时没找到新工作，一一忽然觉得这是个逼自己换种方式生活的好机会，“转念一想，从2015年毕业到现在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休息过”，做饭成了她的第一选择。

爷爷和爸爸都是厨师，一一爱做饭是有家学渊源的。但家里就她和丈夫小陈两个人，白天小陈上班，她一个人在家，做好的饭常常吃不完，她产生了分享给更多人吃的念头。起初她也学着网上的模式打包外送。试运营的一个星期里问题频出：夏天的北京高温难耐，每次送餐都是体力考验；上班族的时间很珍贵，需要规划好送餐路线；送餐途中饭菜冷了，饭盒串味，分量多少不好把握，味道也不能保证。她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大对味，“本来初衷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好吃的，结果这样一来我成了个骑手。既不能靠这个负担生活，还把自己弄得很累”。

送餐试营业的最后一天，北京下了雷暴雨，提前预约的送餐取消了，只剩下一位自提的客人，一一干脆邀请她到家里坐下吃饭。她发现把客人请到家里后，不用考虑打包和送餐时间，厨房里做好的菜能按照次序，热乎乎地一道道上桌，她找回了在家做饭的节奏和快乐。第二天，她写下“小饭桌”试营业总结，把营业目标从“让大家吃饱一顿饭”改成了“和朋友分享食物”。

把陌生人请到家里吃饭是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小陈起初是有点担心的，但看到这件事给一一带来的转变，也开始支持她。有一次客人离开后，一一拉着他说，“这是完美的一天”。“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感动，有种被激励的感觉。”小陈特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备忘录里。

对大城市里的独居人群来说，做饭和吃饭都是难事，这一点并未随着外卖发展和预制菜出现而缓解。去年有部日剧《爱做饭的女人和爱吃饭的女人》，讲的是两个东京独居女子的吃饭故事。女主角小野是在东京打拼的上班族，爱做超大份料理，却总是苦恼于一个人吃不完。春日是她的邻居，她的苦恼是饭量太大。一天下班，小野在公寓门口碰见独自手提四份外卖的邻居春日，两人一拍即合。

想认真做饭的人和想认真吃饭的人，都很难在原子化的生活里找到同频的人。剧中小野下定决心让春日来家里吃饭的契机，是因为男同事夸她做饭贤惠，让她很不舒服，一气之下买了超大份猪肉，煮了超大份咖喱，实在消化不掉，才鼓起勇气敲了春日的门。春日愿意去小野家吃饭，是因为无论是一个人外出就餐还是和同事聚餐，总是不好意思吃饱，实在饿得难受。面对大快朵颐的春日，小野想起了自己做饭的初衷，“我并不是为了当什么好妻子还有好妈妈，我只是想要做很多很多美食，让某个人吃了以后说一句好吃”。

一一就像一个慷慨版的小野，通过社交网络将自家餐桌分享给更多陌生人。大家的热情出乎她的预料，加入预定群的人数很快达到500人，有时得提前一个月预约。后来她不得不开了两个群，合起来能有800多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来小饭桌吃饭？一一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小饭桌给人一种真实生活的烟火气。每顿饭都由她一个人操持，菜品不一定有多丰盛，上菜节奏不算紧凑，服务也说不上多周全，但期待和温暖正是在这种非标准化的场景下酝酿出来的。有个女孩告诉她，自己很喜欢坐在餐桌前听着一一在厨房里烹饪下一道菜，能听见锅碗瓢盆碰撞、油花滋啦的声音，“就像坐在自己家，妈妈在厨房忙活的感觉”。

跟传统餐厅不同，成人小饭桌没有固定的经营模式，订餐规则、用餐环境和菜品配置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在家常厨房里单枪匹马地做出一桌子菜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为了准备一顿饭，一一早晨骑车去三源里菜市场挑选上好的食材。下午开始备菜，腌制肉类，一直忙活到7点左右开餐，客人动筷子了，她还在做下一道菜，最后一个坐上餐桌，一般忙活到10点才散场。

小陈不参与烹饪，“她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流程，

我插不上手”。但他也是交互设计师，会从平时做用户体验的思路出发提出一些小建议，比如如何接受预约，如何在预约前与客人联系，说明到达方式，设计菜单，一起试菜，尽量让客人觉得方便、舒适，像去一个朋友的家中拜访。

开始接待客人后，他们调整了房间里的灯光，因为要减少陌生人初次见面的尴尬感，就“不用看得太清楚”。原本门口和客厅的电灯开关是联动的，小陈把它们改成了门厅亮而客厅不亮，避免客人一进门就处于过度自我暴露的不安中。开饭的时候，餐桌上方的吊灯不开，光源来自每个人面前的小蜡烛。“不用把脸上的表情看得那么清楚。大家都不认识，光线暗一点，更有安全感。”一一说。

我发现一一家的餐桌前只有四把椅子。做完饭，她会拉把椅子坐在桌子一头，五个人就是小餐桌的极限了。作为“i人”，一一对社交舒适度非常敏感，“超过五个人就太多了，内向的人容易边缘化。两个人有点尴尬，容易冷场。四个人刚好足够我照顾到每个人，又不至于太有社交压力”。一张饭桌，四面落座，每个人都和注意力中心保持恰当的距离。

出于简单卫生的考虑，小饭桌起步阶段做过套餐。后来一一发现大家来家里更想找到那种在家吃饭的感觉，套餐还是各吃各的，失去了坐在一张饭桌上的意义。她决定还是像自家人吃饭一样，做一桌菜让大家分吃。起初酒水是另点的，后来她把白葡萄酒加入了固定菜单，“大家喝了酒，聊天的状态就更放松”。

小饭桌的菜式有家的味道，具体来说就是既有固定搭配，也会推陈出新，物尽其用，随着季节变换。一一的招牌菜是富有四川特色的芋儿鸡和粉蒸排骨，排骨用的米粉都是老家寄来的，许多客人会点名要吃这两道。清炖牛肉她也常做，适合有减脂需求的女生，炖牛肉的汤汁可以拿来下一锅河粉。11月天气冷了，她连做了一个月椰子鸡火锅，也颇受欢迎。

定价是个难处理的问题。一一用最好的材料招待客人，去精品菜场三源里买菜，加上提供酒水，一桌饭菜的成本在500元左右。起初她不好意思，定价每位几十元，后来渐渐提高到三位数，“价格的作用不在于盈利，而在于筛选客人”。一一发现价格至少能过滤掉一些纯粹想占便宜、不讲礼貌的客人，也能让前来用餐的客人更加珍惜食物。

就像电视剧里面一样，客人与主人逐渐达成“同人志”一样的默契。春日每天吃着小野做的超大份肉丸意面、超大蛋包饭，过意不去，提出要交伙食费。小野这样解释，你就当我们是在做同人志吧，“同人志就是一群就算自掏腰包也想出书的人们做出的东西。我就是那种自掏腰包也想做料理的人”。春日坚持要付费，“我觉得为劳动付费，是明确价值时最简单的方法”。两个人最终都接受了对方的想法，小野决定用这笔钱做更多好吃的，春日也吃得更安心了。

今天的城市生活，可供选择的社交方式很多。在一个陌生人家里的餐厅，和一群完全未知的陌生人吃饭，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是认真生活的仪式感。木恩这个月初刚在一一家吃过饭，特地挑了“小雪”的那天。她虽然是北京人，但几年前从父母家搬出来一个人住，做饭也是糊弄。坐在一一家的餐桌前，还没开饭，她就被器具的用心打动了，蘸料放在专用的小碟子里面，不同的菜色搭配不同形状的碗碟，每个细节都显得隆重。“感觉自己被重视了。”木恩说。

和木恩同一天参加小饭桌的波杰早就加入了群聊，因为价格超出心理预期，犹豫了一阵子才下单。到了一一家，那种“不值”的怀疑就消失了，她记得那顿饭吃的是椰子鸡，波杰从前也买过椰子鸡预制菜，下锅加热就好。但一一会仔细介绍食材、配菜是哪里来的，包括去菜场路上去了什么咖啡馆，遇见什么事情都讲出来。生活不再是结果而是有了过程。“愿意付出这个价钱的人，重点不是吃饭，而是想要一种新的社交体验。”波杰说。

波杰说的那种特殊体验，主要是一份信任感，包括被主人信任的感觉，和客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在公共空间里，每个人都保持着一个相对礼貌的距离，但当主人邀请你进入她的家，就像事先暴露了自己最柔软脆弱的部分，在关系中预先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才会做的事情，这种姿态会更容易让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黄宇摄）

一一在自家厨房为客人做饭

盲盒社交，“共餐”的情感价值

午饭时间近了，一一系上围裙开始给我们“简单做点吃的”。多线程作业是一位家庭厨师必备的技能。第一道是酒酿鸡蛋，酒酿是从她四川老家寄来的，不是超市里罐装的雪白米酒，煮出来有点儿发黄，鸡蛋打成柔嫩的蛋花，甜味适中。我们喝酒酿的间隙，厨房里传来滋啦滋啦的煎炸声。一一一手端着木砧板，一手往平底锅里放培根。煎培根的间隙，她不紧不慢地在砧板上切着紫苏叶。保鲜盒装着的葱花放在旁边备用。另一个灶头上，小火小锅烧着水，准备做裙带菜蛋花汤。

做完饭，一一也端着碗坐过来，说这道培根紫苏饭是她刚发明的新菜式，还没有给别人尝过。我忽然感觉这碗清淡的拌饭珍贵起来，不由得放慢了咀嚼速度。

一一不是个健谈的女主人，“刚开始做的三天，我说的话能抵上过去三年的量”。后来她发现，大多数客人都是“i人”，在社交网络上处于小透明状态，“很多人的id是随机生成的乱码用户名，或者是momo大军里的一员”。她记得有一个女孩在深秋来她家吃饭，穿着一件过度单薄的外套，瑟瑟发抖，她告诉一一自己太久没有出门，忘记了外面应该是什么天气。“现在人和人太缺乏真实的连接了，那可能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和陌生人接触。”一一感慨。

来小饭桌吃饭的多半是城市里独自生活的女孩。一一起初招待过男生，也接待过情侣，后来觉得氛围不大理想。情侣的问题是排他性，“如果有两个人的关系过于亲密，很容易让其他人觉得被排除在外”。而男生在场，女生很难在短短一顿饭的时间里敞开心扉，话题范围也一下子缩小了。



左、右图：小饭桌成为认识陌生人的好去处

反过来说，这对男客人的要求也很高。“除非是那种特别有同理心，或者性别平等意识很强的男生，否则他们也会觉得不大舒服。”一一说。

小陈能理解不接待男生的规则。一是男性很少有这样深度感情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担心陌生男性来家里总归不大安全。为了配合女生餐桌的规则，有客人用餐的时候，小陈会提前离开去公司加几个小时班，10点后才回来，自觉让出空间，“好让客人都觉得自在一些”。

唯一一个打破“只接待女生”规则的客人是一位重庆嬢嬢。她是7月份最早的一批客人，预约的时候只说要带个小朋友过来一起吃，来的前一天，她才说明要带来的是自己的侄儿。一一起初有些不高兴，心里还有点防备，“嬢嬢是不是要带侄儿来相亲？”于是让其他客人改期，单独招待了他们。

聊天中一一才得知，男生受过校园霸凌，和人沟通有些障碍，这次来北京也是看病的。嬢嬢算是和他关系比较好的长辈，想用小饭桌这个形式让他迈出和外界交往的第一步。吃着吃着，男生好像放松下来，虽然不主动说话，但也会好好回答一一的问题。走了以后，嬢嬢说谢谢一一，那是侄儿这段时间吃得最多的一顿。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饭桌上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好几位小饭桌的客人这样告诉我。从预约开始，小饭桌就注定是一场盲盒式的社交体验。客人们在群聊里报名，预约成功以后，一一会挨个私信通知，但在用餐之前，她不会拉微信群，也不去了解客人的背景，“我觉得保持那种开盲盒的状态很重要，能带来更多期待和惊喜”。

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更真实，这是尝试过小饭桌的人共同的感受。小饭桌不是基于行业、兴趣和身份组织的活动，是“吃后即散”的临时约会，就像一个个随机组成的家庭，充满多样性的食客能为彼此提供想象不到的新体验。

跟身边的点头之交比起来，只有一顿饭交情的陌生人反而更加给人坦诚的感觉。程程是小饭桌的常客，几乎每个月都要预约一次。她的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因为总是负责面试、裁员、仲裁这样的工作，渐渐放弃了和同事深交的想法，“一旦涉及切身利益，人性很容易暴露出来，大家变得睚眦必报”。在陌生人中间，她反而觉得能放松说话，“没有利益冲突，我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很善良”。

或许因为没有后续的人设压力，也没有任何实用主义的诉求，大家都脱下了熟人社交里的面具，一下子把憋在心里不能说的话往外掏。饭桌上的话题从自我介绍开始，半顿饭就能深入到失业、劈腿、女性主义。程程记得吃饭的时候，坐在对面的女生突然看着手机眉头紧皱，“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我应该是被分手了”，接着说起自己和伴侣之间的纠葛。整桌人都开始陪着她出谋划策。还有个客人忽然说起自己刚刚离婚，分享离婚以后看过的书，骄傲地告诉大家，离婚让她更关注自己的情绪了。

小饭桌上的人几乎没什么交集，对彼此的工作生活充满好奇和开放的态度。程程告诉我，她从没想过别人那么希望了解她每天耳熟能详的专业知识，比如年终奖的计算方法、怎么和老板讨价还价、劳动仲裁流程，她在饭桌上进行了一番科普。木恩毕业后换过好几个行业赛道，感觉自己没什么职业积累，陷入迷茫期。在小饭桌看到大家都换过不同工作，不再觉得自己被困在焦虑牢笼里了，“如果有一天我要面对失业，是不是也不用特别慌张，反而可以换个思路，尝试做一下我之前想要做的事情？去过小饭桌以后，好像心里面会稍微放松一点点”。

单纯因为一顿饭聚集起来的人，更容易因为找到共同点而惊喜。程程记得饭桌上大家说起最近听过的播客，发现四个人都听过“无人知晓”电台的一期“让万物穿过自己”。那感觉就像中奖了一样兴奋。波杰提到，女孩们聊到新上映的《芭比》电影，她注意到客厅里的音箱开始播放比莉·艾利什唱的电影主题曲《What was I Made for？》，“一下觉得被击中了”。后来才发现，是一一听大家聊到动情处，悄悄在手机上切换了 BGM。

都市里面，人的距离很远又很近。一一的冰箱上贴了一张瑜伽班的毕业证书，她说有个客人来了以后才发现，两个人去的是同一家瑜伽馆，却从没碰过面。还有客人在饭桌上碰到了自己的初中同学。偌大的城市里，一点小小的奇遇都能打破日常生活的轨道，让人雀跃。

一顿饭过后，一一会为大家拉一个微信群。有的群会继续聊天，也有的群就此沉寂。木恩和一一成了会一起参加其他社群活动的朋友，波杰和程程不咸不淡地在群里分享着最近听过的音乐或者看过的书。一一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说明大家都没把这件事变成社交负担。

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社会性活动，人类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共餐”（commensality）。饮食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经提出“破译一顿饭”理论，认为每一顿饭都是结构化的社会事件，共餐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成员在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时间聚集在一起，进行一种共享、互惠的行为。即使平时不一起吃饭的人，也能通过共享一顿饭，在一段时间内分享同样的感觉，这主要是归功于共餐的秩序、仪式和好客。

道格拉斯的分析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大家仍然坐在一张桌上吃饭，实际上现代人好好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克劳德·格里尼翁（Claude Grignon）在《共餐与社会形态》（*Commensality and Social Morphology*）里为此深表担忧。他认为家庭成员的共餐生活强度可以被认为是群体整合度的一个指标，但城市生活让越来越多单身成年人缺少家庭共餐的机会，陷入了无可自拔的孤独，“这种生活将变得危险甚至可能致病”。小饭桌的诞生，就像在饮食流于形式的现代生活里恢复了“共餐”传统。像小野敲开春日的门邀请她去家里吃饭，顺便也开启了一段从相见不相识的邻居，到暗生情愫的恋人的情感旅程。

一一不是唯一在城市里给陌生人做饭的女主人。这样的成人小饭桌，在北京至少有三家，满足着不同人群的共餐需求。波杰也研究过别的小饭桌，她发现主人的年龄、职业经历和背景潜移默化地决定了客群属性。另一家小饭桌的主人更年轻，前去吃饭的多是大学生，一次招待七八个人，有种开派对的氛围，但是她感觉不大想去，“她们还在苦恼绩点、实习、找工作，那离我太遥远了”。

算下来，小饭桌的收入不能当作维生手段。一一另外找了一份餐厅的兼职，一周开三天小饭桌，另外三天去打工，“想看看把做饭这件事当职业做感觉怎么样”。小陈觉得小饭桌太辛苦，始终是一个人生过渡期，前两天在回家的飞机上，他发现一一的右手粗糙了不少，“还是挺心酸的”。他觉得或许不久以后一一还是会去找份稳定的工作。但小饭桌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态，“我们现在特别佛系，一切顺其自然，做好眼前的一顿饭就好”。

（参考资料：杨丹，《西方人类学共餐研究脉络与反思》）

『特种兵式旅行』，即刻出发



（插图：Jessie Lin）

主笔·张星云

在这次采访前，我问了一圈周围爱旅游、爱户外运动的朋友们，结果没有一个人认识"特种兵"。因此我也很好奇，都是哪些人在进行今年火爆的"特种兵式旅行"。

日行五万步

周六一早，我从北京坐早班高铁抵达上海，先去酒店放下行李，然后赶去与张楠他们会合。

结果发现，我是唯一拖着行李箱出行的人。张楠挎了一个小腰包，一台单反相机，这是他的全部行李。和他一起同行的小伙伴，也只背了一个小背包在身上。

周五晚上5点下班后，张楠从办公室赶到成都天府机场，晚上11点多飞机降落上海，他在徐家汇附近找了一家青年旅社住下。他的朋友则是从南昌坐了一夜卧铺火车，周六早晨到的上海。

周六早上7点，他们在徐家汇会合，先去吃了肯德基早餐，然后从上海交通大学开始走，去了徐家汇天主教堂、徐家汇公园，然后衡山路，再转到武康路，路过巴金故居，转到华山路，路过静安寺后，再沿着南京西路，来到田子坊。

这是两人第一次来上海。按照张楠出发前的计划，他打算用周六一天时间从徐汇区一直走到外滩，周日再从外滩走到浦东世纪公园，这样不走重复的路，两天时间就差不多可以把上海逛完了。

于是在这个周六中午，我也加入了他们这场被称为"特种兵式旅行"的两日游。

"特种兵式旅行"是今年出现的一种现象。随着防疫政策的取消，这种报复性的旅行方式逐渐在年轻人和大学生中流行开来。按照网上的定义，"特种兵式旅行"是指人们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出发，在最短的时间，或者最少的预算里，以高强度的方式游

览尽可能多的景点。

年初，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等地靠着“大唐不夜城”的城市 IP 吸引大量年轻人。3 月，“大学生组团坐高铁去淄博撸串”登上热搜。五一小长假，有人 30 小时往返 1300 公里游六景点，有人五天游六个省，晚上“进淄赶烤”，然后直接“夜爬泰山”。也有人用 24 小时极限游遍北京，在火车上睡一觉后，第二天凌晨 5 点开始打卡北京天安门、前门、北海公园、鼓楼、南锣鼓巷、天坛公园六个景点，下午 6 点半返程，凌晨 2 点半到家。睡一觉第二天又去上学、上班。

与这些“特种兵”不同，张楠更为极致。五一假期期间，他曾在五天里爬完了五岳——衡山、嵩山、泰山、恒山、华山，夜里赶路，白天爬山。他为这趟旅行制定周密行程，时间精确到分，并列出了 A、B、C 计划，以备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他专门准备了不同颜色的短袖 T 恤，每到山顶，他都穿着五岳对应的五行颜色的 T 恤与地标合影。

“五天五岳”登上热搜，各家媒体争相报道，张楠在网络上红极一时。

我面前的张楠，短发，身着条纹衬衫、短款羽绒服，脚踩户外徒步靴，打扮干练，是个精力旺盛的男生，有着典型的旅行爱好者的开朗。他方向感很好，一路上边走边聊天，他可以在几乎不看手机地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在上海的街道里左拐右拐。

就这样，我们从日月光步行出发，路过复兴公园和瑞金医院，经过一大会址，穿过人民广场，到达苏州河，然后逛了四行仓库。傍晚我们沿着外滩看夜景，再从南京路步行街坐地铁去陆家嘴。尽管他走起来速度很快，但也会在每个景点停下来，用手机自拍打卡。

晚上 9 点 10 分，我们从陆家嘴地铁站出来，这是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虽然我只跟着他们走了半天多，但已经累得不行。出了站他们很兴奋，不觉地加快了脚步。我们赶在停止售票前最后一刻登上了上海中心大厦的电梯，在中国第一高楼 118 层的观光厅打卡上海夜景。

晚上 10 点，一天的行程结束。一路上，张楠不时地在看自己手机里的微信运动步数。此时坐在回酒店的地铁上，张楠发现自己今天的步数马上就要达到五万步。我此前来上海出差过很多次，平时跑步、运动并不少，但此时我的身体已经极其疲劳，同时又带着兴奋。对别人来说也许三天的行程，我跟着他们用了一天就走完了。巨大的满足感背后，我觉得自己这一天过得很值。

今天一路上，会有粉丝慕名而来加入我们，陪张楠走一段，聊聊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特种兵”，有一位从南通坐高铁来的粉丝，今年去全国各地看了很多场演唱会，包括薛之谦、李荣浩、毛不易、凤凰传奇、张杰、张韶涵、张信哲、林俊杰、林志炫。还有一位在上海本地工作的男孩，今年也是抓住各种机会出去旅游。五一假期在华山南峰上，他认识了张楠。那是张楠“五天五岳”的最后一站，当时张楠在南峰顶上想找人给他拍照，正好找到了他，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五天五岳”的经历让张楠收获了不少旅伴，后来无论他去哪里旅行，都能引来伙伴同行。上海这一路，他也和我细聊起“五天五岳”的经历。

五天五岳

2023 年 5 月 3 日，是张楠五一假期出门的第五天，也是他那次五岳之行的最后一天。此前的四天里，他已经先后爬完了南岳衡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2 日晚上他从恒山下来后，先是拼车到大同南火车站，赶晚上 8 点的动车，9 点 49 分到太原，再从太原坐晚上 11 点发车的卧铺列车到渭南。

为了节约时间，他这次行程中有两个晚上都选择了在火车上过夜。他是一个睡觉很轻的人，但那晚他实在太累了，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 3 号早上 6 点。在他原本的计划里，他会在早上 7 点 55 分抵达渭南火车站，在 16 分钟里完成换乘，坐上去华山的城际动车组列车。

但这天醒来后，他越来越担心自己赶不上，于是立即决定在渭南的前一站孟塬站下车，直接打车去华山。早上 8 点多，他终于顺利地到达华山脚下的玉泉院，开始徒步上山。

实际上在爬五岳的过程中，他很多次与偶遇的其他旅行者谈起过这个计划，大家都觉得很疯狂。但最初在做计划的时候，他觉得是可行的。

年初起，特种兵式旅行就很火，很多人去爬武功山和泰山。张楠最初是想五一假期去爬泰山，然后又觉得河南离山东不远，不如再去趟嵩山，再后



（陈耀刚 摄）

张楠在上海的"特种兵式旅行"，一天走了五万步

来觉得山西也不远，上次只去了悬空寺，没有去恒山，这次可以补上。如果这些都爬了，要不再去趟华山？

张楠开始做详细的攻略。一开始他设想的是先爬华山，但考虑到假期第一天山上游客会很多，于是他把起点转移到相对冷门的北岳恒山或南岳衡山。他最后的决定是：从成都出发，如果尽可能不走回头路，那最理想的第一站就是南岳衡山了，然后是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最后一天是西岳华山，正好从陕西回四川。

张楠对着地图，一共为这次旅行准备了三套方案。A计划基本全靠火车，但考虑到五一是出行高峰，很有可能会抢不到车票，因此在B计划中做了一些替补方式，比如候补车票和搭乘顺风车，C计划是保底的计划，他带上了驾照，最不济在一些路段租车开过去。

出发前一晚收拾行李，他决定一切从简，没带旅行箱，而是只背了一个很小的背包，里面除了短袖T恤、袜子内裤、一件外套、运动相机和稳定器外，就是很多士力架和果冻了。

为了不影响爬山过程中的身体状态，他这五天都没有吃午饭，爬每座山之前吃一条士力架，爬到一半的时候再从路边的小卖铺买一罐红牛。

华山自古一条路，这条路上，大部分时间里身体两侧都是悬崖，人几乎只在中间的山脊行走。此时已经是他"五天五岳"的最后一座山，身体逐渐达到极限。华山的路线本来就比另外四座山都要长，他在7个小时里走了17公里，几乎是前一天爬恒山的两倍。冲顶之前，他翻过百尺峡和千尺幢，那里都是几乎90度垂直于地面的石梯，他只能手脚并用。

到了山顶，天开始下起了雨，山顶雾气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在华山的几个标志性顶峰上，他请人给他打卡拍照，这是他爬完五岳的固定动作。衡山山顶"南岳衡山"石碑前全是人，当时他排队20多分钟才合上影。嵩山山顶没有"中岳嵩山"字样的石碑，他与峻极峰的海拔石碑打卡合影。在东岳泰山山顶，他找了半天"五岳独尊"石碑，最后发现是因为人太多被挡住了，他等了很久也找不到与石碑单独合影的方式，只能与很多游客一起与石碑来了张大合影。在北岳恒山天峰岭，他也是排队半小时才拍得一张合照。

并且就像前面提到的，他在出发前还专门准备了不同颜色的短袖T恤，每到山顶，他都穿着五岳

对应的五行颜色T恤与这些地标合影。

5月3日晚上6点，他顺利下山，在华山游客中心打到出租车，随后到达华山北站。在火车站他简单吃了口面，晚上7点前坐上了返回成都的高铁。到成都东站已经晚上11点半了。按照计划，旅行的最后一晚，他要到地铁附近的朋友家借住。张楠用手机最后2%的电联系了朋友，两人会合时，时间刚好过午夜12点。他的这个计划终于完成了。

5月4日，张楠返工上班，一日工作下来没有什么太大感觉。朋友说要给他接风洗尘，晚上约了一起吃火锅。去赴约前他先发了一条朋友圈，总结了一下自己的五一假期。实际上他从2022年10月开始就很久没发过一条朋友圈了。在新发的这条朋友圈中，他晒出每天一张的五岳山顶打卡合影，并配上定位和文字："闪现，南岳衡山""闪现，中岳嵩山""闪现，东岳泰山"……

到了晚上吃火锅时，他"五天五岳"的事情已经在网上火了，应该是有人截图了他的朋友圈，传到了网上。他早在2018年就卸载了微博，这回又下载下来，他发现自己上了热搜。他的事情也让人们对特种兵式旅行的讨论达到了一次高峰。

南岳衡山文旅局更是紧随热点在6月份推出了"五岳特种兵"打卡挑战赛，为了增加仪式感，还制作了五岳通关文牒和五岳印章，随后在网上总有"特种兵"打卡"五天五岳"的新闻。

25次周末出逃

张楠热衷打卡，但和大多数夜宿海底捞、夜爬泰山华山的大学生"特种兵"不同，张楠今年30岁，已经工作。他从大学开始穷游，走遍了四川，川西去过30多次，读研、工作的这些年，又去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他的梦想是在35岁前游遍中国，再用这辈子游遍世界。

今年1月3日，他刷抖音时刷到布达拉宫疫情后开放的消息，于是立即请了去年没用的年假去了一趟西藏。回来后，他觉得可以加快一下周游中国的速度，尤其是在高铁、动车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他认为在上班遵守规矩的情况下，下班后所有时间都是他自己的，于是给自己的2023年制定了一份"40次周末逃离城市计划"，每个周末，只要没有特殊原因都可以出行。

在张家界，他两天之内把所有景区全走到了。在重庆，他去了大足石刻，也去了"816"工程遗址和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在宝鸡，他去了青铜器博物院和太白山。国庆假期一共8天，他先后爬了安徽省天柱山、九华山、齐云山、黄山，又去了江西龙虎山和武功山，最后从长沙回成都。

最终他今年完成了25次"出逃"。这次上海行，是他今年的最后一次。他告诉我，今年他一分钱没有攒，全部用来旅行了。

大部分地方，张楠只会去一次，所以在出门前他会尽量做好功课。他平时喜欢看地图，会把想去的地点在地图上标下来，然后琢磨怎么样把地图上这些点串起来，不浪费时间，又能尽量去更多地方，计划周密。

这种习惯源于他大学时写实验报告的经验。他是学食品专业的，偏向于微生物方面的研究。每次做实验之前，他要先做一个实验方案，尽可能预设所有会发生的意外，做好方案后做预实验，然后再不断调整，这与做旅游攻略很像。

他曾经对自己人生的攻略也做得近乎完美。他考研时专业成绩第一，后来听父母的建议加入考公大军，顺利进入事业单位。再后来他辞去了别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坐30多个小时火车硬座，去新疆玩了18天。

现在他30岁，住在父母家，结婚、买房都有压力。他到处旅游，看上去身体很自由，但仍被社会成见困扰。他不愿意对我说他自己现在的工作，也不想同事对他的生活方式做出太多评论。但是，他会琢磨如何将旅行短视频拍得有流量。以前他会很认真地为旅行短视频设计文案，但一直不被关注，"五天五岳"特种兵打卡火了后，他也开始剪辑单纯打卡流水账的短视频。现在他同时经营着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几个平台的账号，并在微信公众号上介绍与自己去过的景点相对应的古诗词。

每次谈到他去过的那么多地方，我都感觉到张楠有一种自豪感。他觉得自己并非崇尚特种兵式旅行打卡的方式，但是想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走走。"最开始你的格局是一个点，但是你把点串成了线，线连成了面之后，你的格局就变大了。"他说。

周日，我又和张楠他们在上海逛了豫园、城隍庙，一起坐了观光巴士，去了上海博物馆。对张楠来说，除了外滩和"陆家嘴三件套"，上海其实没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他还是更喜欢中国西部。

夜幕降临，他和几位小伙伴相继启程离开上海。张楠最晚，晚上10点的飞机，凌晨1点到成都天府机场，第二天准时9点钟出现在办公室里。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

像他这种特种兵式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3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次23.84亿，比去年同期增加9.29亿人次，同比增长63.9%。国内旅游收入为2.3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2万亿元，增长高达95.9%。此外“特种兵”更是有上升为一种网络人设的趋势，在旅游之外，还出现了“存钱特种兵”“购物特种兵”等说法。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宇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这种“特种兵式旅行”看似是年轻人的主动行为，其实也有被动因素，大家并不是对这种旅行方式本身产生共鸣，而是对某种社会心态的共鸣：疫情之后，大家想要放纵一下，于是有了报复性消费的冲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刘海龙则对本刊说，这背后更与媒介营造的“加速社会”有关系。加速社会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提出来的，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不断追求提升生产效率，交通工具、通信设施获得巨大发展。原本人们以为效率提升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用于休闲，但没想到人们的工作任务也随之增加，最后导致人们比以前更加繁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内卷”。

具体到“特种兵式旅行”也是如此，在高铁、地铁、网约车等交通工具的便捷之外，社交媒体的发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人们对一座城市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全面，去几个地方就可以了。而如今城市“必玩榜”“必吃榜”层出不穷，短视频博主们不断开发打卡景点，使得一座城市的网红景点越来越多，淄博烧烤、雍和宫上香等项目都是被社交媒体创造出来的新景点。

此外人们对于旅行的理解也在改变。以前对中产人群来说，旅行是与工作相对的休闲度假，是注重体验。但“特种兵式旅行”回归到一种非常传统的观光游特质，以及一种媒介化的展示，旅游不再注重体验，而是为了打卡拍照，发到社交媒体，旅游也因此更像是一种劳动，似乎谁打的卡越多，谁去的地方越多，谁活动的效率越高，谁就赢了，谁就能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大家的关注。

刘海龙因此觉得，“特种兵式旅行”更像是对“996”和“007”工作制的模仿，以及一种变相的劳动力潜能的展示：人们可以在单位时间里做更多事情，可以吃苦耐劳，长期不休息，长期加班。

但相比进入倦怠社会后的“躺平”而言，加速社会下的特种兵式旅行无论如何是一种更积极的行为，在短暂逃离的过程中，年轻人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和自己。

在我采访的几位“特种兵”中，正在读大三的凯文今年去了将近40个地方，基本每个周末都出去玩。坐高铁，学生半价；坐普通列车，从重庆到西安13个小时的硬座50元，如果想舒服一点，硬卧票也就120元。“所以这个完全看个人，比方说你在宿舍，眼睛一闭一睁，醒来了还在宿舍，那我上了火车，眼睛一闭一睁，我到西安了。就看自己能不能折腾得起来了。”凯文对我说。

青年旅社一个床铺60元一晚，城市里的公共汽车1元一张票，拉萨四天三晚，他花了1000元，贵阳三天两晚，800元。有一段时间龙门石窟在网上特别火，他很好奇到底为什么那么火，于是他当即关掉小红书，马上订一张票，周五下课就出发了。

在旅途中，他遇到过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有在云南通过打义工换取住宿游遍云南的人，有在广州将自己2000平方米大别墅拿来做民宿的老板，在大阪他遇到喜欢专门玩小众目的地的金融工作者。

今年，他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去美国半工半游了三个月。那个项目在国内非常少人选，很多同学觉得不安全，但他通过自己的判断，还有对旅行的了解，觉得是一个可靠的项目。于是他自己找机构联系，最后成行，并顺便把阿拉斯加、西雅图和夏威夷玩了一遍。

也是因为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让凯文的眼界逐渐打开。从那时起，他开始慢慢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决定不在国内考研。他觉得通过旅行更好地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式。“我觉得旅行就应该是那种，‘今天晚上我们半夜去爬山’，然后我们就去了。”凯文说。

看演唱会的『空中飞人』



（插图：Jessie Lin）

记者·孙雅兰

卢蓉对演唱会的兴趣来得迅猛，这从她既分散又密集的行程可以看出：11月19日，她去深圳听了林宥嘉；11月24日，去合肥听了伍佰；11月25日，去南京听了张学友；12月2～3日，连听两场张惠妹；12月8～10日，连听三场陈奕迅；12月16日，在成都听了王嘉尔。而在即将到来的明年1月，她也已经买好了4场演唱会门票，分别在厦门、泉州和广州。

3个月，看11场演唱会

今年9月，28岁的卢蓉在赣州看了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那是一场群星演唱会，明星阵容中有她喜欢的张韶涵和王心凌。在此之前，卢蓉从未听过演唱会，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觉得这是一种离自己很遥远的生活，“像传说和梦想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卢蓉也确实是今年才发现赣州突然冒出许多演唱会，“网上随手一搜都是”。一开始，她只是为了凑热闹，没想到听完一场就喜欢上了，短短3个月里，她一连看了11场演唱会，都在不同的城市，看不同的艺人。

卢蓉对演唱会的兴趣来得迅猛，这从她既分散又密集的行程可以看出：11月19日，她去深圳听了林宥嘉；11月24日，去合肥听了伍佰；11月25日，去南京听了张学友；12月2～3日，连听两场张惠妹；12月8～10日，连听三场陈奕迅；12月16日，在成都听了王嘉尔。而在即将到来的明年1月，她也已经买好了4场演唱会门票，分别在厦门、泉州和广州。但与此同时，卢蓉看演唱会的态度却又十分随性。她从不蹲票，没有锁定哪位明星，也没有指定的城市，而是广撒网，大范围地抢票，“抢到谁的算谁的，抢到哪儿的就去哪儿”。

卢蓉一直喜欢旅行，飞到全国各地看演唱会对她来说是另一种旅行。每去一个城市看演唱会，

她都会随之规划一周左右的行程，顺便在当地或周边城市旅游。12月在成都看陈奕迅的演唱会时，她不仅逛遍了成都，还去了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并计划去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走一趟。为了不浪费出一趟远门的机会，她甚至一连听了三场陈奕迅的演唱会，即便每场的歌单都差不多。在成都逗留期间，她还顺手抢了一场王嘉尔的演唱会门票，虽然她根本不认识王嘉尔。每次出行，卢蓉会将预算控制在5000元左右，往返机票和演唱会门票占大头，生活上则尽量节俭，吃饭以二三十元一顿的快餐为主，住宿也在几十元一晚的青年旅舍。

有朋友问卢蓉，这样为明星花钱值得吗？卢蓉不以为然："我这是为自己花钱。"

像卢蓉这样的观众不在少数。整个2023年，演唱会的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各种大小不一的演出呈井喷之势，从一线城市火速下沉至二、三、四线城市，成为疫情结束后文旅复苏的流量密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中国"演出+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34.24万场，累计观演人次达1.11亿人次，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其中以演唱会和音乐节的观演人次最多、票房收入最高，演出市场对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也十分明显。对观众来说，看演唱会已不再是简单的观演活动，而是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热情追捧演出的同时，也将旅游、购物、消费等活动一并纳入计划，为看一场演出跨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

相较于今年各项疲软的消费数据，演出市场的一路逆势上扬令人惊诧，无论是路人盘广阔的高国民度艺人，还是粉丝量雄厚的流量明星，都不难享受到开票即售罄的火爆待遇。当各方势力都抓紧机会迅速下场时，闹哄哄的流量池中也乱象丛生，屡禁不止的高价黄牛票、知名歌手的假唱事件和粗制滥造的现场体验等，最终都由甘愿为情怀消费的年轻人买单。

为了奔赴TFBOYS的十周年演唱会之约，小澜准备了1万元的预算，计划开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唱会之旅。演唱会安排在今年8月于西安举办，小澜需要从厦门飞过去，她还想顺便在西安玩两天，旅程总计5天，再加上溢价几倍的演唱会门票，这趟行程的成本已经远超预算。

这场早在TFBOYS成团之初就定下的演唱会，引发的连锁反应堪称火爆。先是一票难求，仅大麦网上的想看预约人数一度达到679万，而演唱会体育馆仅够容纳6万人。紧接着，演唱会宣布进行强实名制购票（即人脸识别、身份证信息和票面信息三者统一方能入场），却催生出高额的门票代抢费，原本580～2013元的门票代抢费最终高达几千至上万元不等。

小澜完整经历了这场"风暴"的始末。第一轮开票，她找来两个黄牛团队帮自己抢票，还发动亲朋好友帮忙抢票，一直抢到第三轮，全部落空。小澜不愿意放弃，她发现了许多破解强实名制的"门道"。演唱会前一天，一个黄牛告诉她，由于现场人太多，检票环节难免松懈，可能跳过人脸识别和身份证验证，手持门票即可混进场。她还知道另一种入场的办法，让黄牛帮忙录入票面信息。但这些方法，小澜都担心不保险，还没等她拿定主意，一张黄牛票便从7000元上涨到1.5万元，而她想要的位置，原本票面价格仅为980元，黄牛开口却要2万甚至3万元，这样的溢价早已超出她所能承受的范围。权衡之下，她最终选择了最具性价比的办法——找黄牛把自己偷偷带进场，而这也需要一笔不低的费用——8500元。

演唱会当天，小澜被眼前的"盛况"惊呆了。现场人头一望无际，手机信号拥堵，电话打不出去，消息也发送不了，小澜不得不走到一两公里外打电话。她听见一个黄牛在电话里教人现场收票："你直接两万收回来，到时候我们四五万都卖得出去。"而答应带她进场的黄牛手里则拿着一叠门票，扬言说：如果今天能把所有人都带进场，就能买一辆高配版的路虎；哪怕带不了所有人，也能买辆低配版的路虎。

小澜先交了钱，最终还是没能被带进场。她早上6点便到集合地点等待，一直等到下午6点，也不见黄牛来找她。后来她才知道，和她一样交了钱却没被带进场的人有20多个，事后大家只能

组团去找黄牛退钱。晚上7点40分演出正式开始后，小澜站在场外，听到偶像开口的一瞬间就哭了。而像她一样站在场外听歌的粉丝密密麻麻挤满了空地，很多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

不过是努力哄自己开心

某种程度上，这个大热的演出之年，可以理解为积蓄3年的需求释放，人们渴望通过抵达现场来实现补偿性的体验。过去几年在疫情中被压缩的生活，给了年轻人足够多出行消费的理由，他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找释放情绪的出口。因此有分析师认为，2023年中国演唱会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不属于常规状态，之后演唱会消费将逐渐趋于冷静和理性。

去年刚从高校毕业的小赛原本是一位普通观众，在几次去看演唱会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市场太过火热，于是自己也尝试着做票务代理。刚开始，他只是把自己买到的票倒手出售，后来他学会找人帮自己抢票，然后再批量出售。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这个生意做起来很容易，一张票溢价几倍很常见。从他手里买票的人，大多是冲着某位艺人而去，重复购票的次数较多。“大家都憋了三年，而且也有从众心理，看到身边人都去看演唱会，自己也想去。”小赛说。而他自己的感受则是：心理阈值越来越高，不知道做什么事能让自己开心，看演唱会至少是个乐子。

生活在北京的李天天也是现场演出的资深爱好者，相比演唱会，她更偏好的是音乐节。这些年她去过的音乐节难以计数，国内有名的没名的乐队她都去看过现场，有的乐队她甚至看过七八遍。每年，李天天都会跟六七个朋友约着到处听音乐节，大多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每逢一场音乐节官宣，李天天和朋友就会在一周内制定好行程，提前订好酒店、机票或车票，而一旦计划落实，排除万难都要去，用李天天的话来说就是“把车门焊死”。

音乐节上最吸引李天天的是现场的乐迷氛围，所有人都不管不顾地全情沉浸在当下，仿佛昨天和明天都没有今天重要。她向我介绍了几种音乐节上最常见的玩法：“排甩”是一群人站成一排，互搂着肩膀，随着音乐节拍甩头；“死墙”是乐队指挥人群分开两边，伴随着音乐响起朝对方冲撞；“开火车”是后一个人搭着前一个人的肩膀，在人群中围成一个圆圈转动；“跳水”则是乐队成员朝人潮中纵身一跃，被观众托举着传递一圈。身处音乐节的现场，李天天最大的感受是“挤”，在人堆里挤来挤去时，身体是不受控制的，人多到都不用自己蹦，“人群的浪潮会自然把你托起来”。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没人在乎自己“疯”成啥样，每个人都可以旁若无人地放肆玩闹。

今年，李天天发现国内音乐节涌现出不少新品牌，音乐节现场总是爆满，年轻观众越来越多，其中许多都是“95后”“00后”，并且很多人表露出的态度是：“不管你什么阵容，不管你收多少钱，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要冲，很疯狂的感觉。”在李天天看来，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音乐节上的乐迷氛围被冲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抱着游览和打卡心态前去现场的观众，这些观众的特征是喜欢拍照和录像，通常会安静地站着不动，因此被躁动的摇滚乐迷戏称为“罚站”。当看见“罚站”的观众和“发疯”的乐迷身处一个场域，突兀而和谐地共处时，李天天的心情有些复杂。

疫情结束后，李天天明显感到自己心态的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珍惜每次观看演出的机会。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危机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看不到了。这次是疫情，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李天天经常对男朋友感慨：“过去三年好像做了一场梦。”这让她对眼下生活的真实感尤为看重，想要尽量抓住每分每秒，演出的现场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她的愿望。情绪低落时，音乐节对李天天来说就是可以“续命”的神器。2020年疫情期间，李天天感到心情郁闷，恰逢北京草莓音乐节官宣，门票很快售罄，她没抢到，却莫名生出一股执念——一定要放肆一次，于是从黄牛手里花了2500元购得高价票。“当时就觉得必须得去，花多少钱都要去，把我后半年的命给续上。”泡在音乐节里的两天，李天天的心情终于舒缓了许多，“那天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草地，大家围坐在一起，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加入，那种感觉挺幸福的”。

（金轲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2023 年整个演出市场逆势上扬，前三季度观演人次达到 1.11 亿

下图：李天天和朋友每年都飞到不同城市看音乐节


(刘新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跨城看演出成为常态，演出市场对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明显

还有一次在济南的迷笛音乐节上，轮到痛仰乐队压轴演出时，李天天和其他人一样激动地跳进泥浆里，“那一刻顾不了那么多，就想彻底释放自己”。

今年五一期间，李天天突发奇想，带爸妈去看在烟台举办的迷笛音乐节，顺便和他们去附近的海滨城市威海玩一趟。李天天的父母住在哈尔滨，平时与女儿聚少离多，过去几年见面更少。李天天想，假期带父母去音乐节堪称一举两得，既可以陪伴父母，也可以带他们走进自己的世界，让他们知道音乐节不只是一群“异类”的聚会。那天音乐节的体验算不上舒适，地上的草还没长出来，加之上万人来回地踩踏，风一吹便尘土飞扬，但李天天一家却玩得很开心。

李天天曾在教培行业工作多年，就职于行业内的头部公司，随着两年前“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动荡。李天天所在的公司很快开始裁员，她手里带的 12 名组员全部被裁，今年她所在的部门进行架构调整，恰逢自己的合同也到期了，她索性离职。这半年，她发现身边陆陆续续多了很多朋友都苦于找不到新的工作。

而对李天天来说，曾经的行业回不去了，想在 32 岁的年纪转型，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男朋友的关系，她还坚持留在北京，只是随着离开北京的朋友越来越多，陪她去看音乐节的人越来越少了。

遇见更多有趣的人

对卢蓉来说，把看演唱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是为了现下及时地享受。与其规划漫长的未来，她觉得眼前的体验更好把控，因此不愿意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而是更向往轻装前行的人生模式。

卢蓉从事主播运营的工作，无法遵循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经常需要 24 小时连轴转，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身体也常感到吃不消。工作 7 年至今，她每年都保持着同一种模式：每工作半年或大半年，就休息 3 ～ 6 个月。这意味着，她每年上半年赚来的钱，下半年就会被花掉，除了一笔 10 万元的应急资金，她几乎从不存钱。卢蓉 20 岁时，家人想支持她在赣州买一套房的首付，但她不愿意，“为了房贷，每个月都得勤勤恳恳地工作，我

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单身的状态则给了她更大的自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生活。这些年，她对婚姻的向往一年年推迟，从有具体节点的规划到随遇而安，从自由恋爱到密集相亲都没有结果。如今临近 30 岁，她只想尽量充实自己的生活，不断尝试新鲜事物，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卢蓉说，这样生活的代价是没房没车，“但也因为没有固定资产，我才没有被拴住。可能不是很好的事情，但爽是真的爽”。说完，她笑了：“如果问我，向不向别人推荐这样的生活，我肯定是不推荐的；但如果问我，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肯定是喜欢的。”以前她总在生活中迷失方向，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变得越来越不开心：“我这么拼命，赚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我又不想买房买车。”自从学会怎么花钱后，她觉得自己内心平衡了许多，工作都变得更有动力了，“今年努力让自己开心，明年再努力赚钱。”

放弃大宗消费的计划后，卢蓉的收入总有富余。以前赚了钱，她不知道该怎么花，休假的几个月里更喜欢到处旅游，住着上千元一晚的五星级酒店，打卡一些著名的网红景点。去年，她在厦门逗留了半个月，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去海边走走，或者去花鸟市场逛逛。好朋友对此感到不解，觉得她的消费观过于浪费，渐渐地，卢蓉也开始厌倦这种模式，觉得自己毫无规划，“都是乱花钱”，每次住完五星级酒店，她感到“内心什么也没留下”。直到今年，她决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把假期留给演唱会。一开始抢票时，卢蓉总是冲着便宜的看台票而去，但每次都抢不到，只好买一两千元的内场票。为了省钱，她将住宿换成了几十元一晚的青年旅舍，通常是几人混住的房间。

相比往年的例行旅游，卢蓉今年在演唱会上花掉的钱更多，但后者却让她感到更值得，“每次回忆起那个晚上，就觉得很美好”。围绕着演唱会来安排旅行，也让她觉得内心变得更充实了。卢蓉每次去演唱会都是一个人，她喜欢将自己置身于人山人海的浪潮之中，现场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能很快让人开心起来，“坐在那里就满心欢喜”。

看演唱会的经历带给卢蓉各种触动的始终是各式各样的人。12 月去广州看张惠妹的演唱会时，一个小插曲令她记忆犹新。那场演唱会结束离场时，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被工作人员拦下，不允许他带走手中的两根荧光棒，男人与他们起了争执，事情闹到报了警。卢蓉没能看到争执是如何结束的，直到她在地铁上再次看到那个男人，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袋里装着一根荧光棒和一张张惠妹的专辑，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卢蓉知道，那张专辑多半是假的，演唱会门口随处可见兜售这种专辑的志愿者，还号称有艺人亲笔签名，如果谁买了，就会被懂行的人嘲笑是“大冤种”。但卢蓉一点都不想笑他，她反倒觉得很暖心，“不管专辑是真是假，他的快乐是真的”。

从五星级酒店换到青旅后，卢蓉也遇见了更多有趣的人。住青旅的大多是穷游的年轻人，表面看起来很普通，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隐藏”特性。卢蓉曾经看到，一个住在青旅里的男孩背着昂贵的外星人电脑，在一群人中显得很安静，一问就是在准备雅思考试，准备出国留学。还有一个说话憨憨的“傻大学生”，连续两次问女孩要联系方式都被婉拒了，但当大家看到他在 iPad 上画的画时，都被他的手艺折服了。另一次在广州青旅，住在卢蓉上铺的女孩邀请她在广州游玩一天，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3 点，两人打卡了许多网红景点，走了两万多步。女孩背着一个很大的托特包，里面有一把雨伞、一台电脑和一双高跟鞋。

旅途中遇见的人，大多都会成为卢蓉生命中的过客，但她仍然欣喜于每场短暂的相遇。“他们让我发现了很不一样的世界，也给我带来了积极的能量，我能感到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开心愉悦的。”在卢蓉看来，生活中人很容易陷入不开心的状态，不是压力太大就是茫然无措，所以她会想尽办法哄自己开心，尽量搜集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正能量”。每到一处，卢蓉最喜欢逗留的地方是博物馆，听导游讲解时，她觉得自己的不开心都被化解了，“在历史面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自己的烦恼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古至今人的烦恼都差不多”。在演唱会上，她也更喜欢记住那些带给自己力量的歌词，就如陈奕迅在《任我行》中所唱的：“亲爱的，等遍所有绿灯，还是让自己疯一下要紧。”

在夜校，度过一个Gap Night

记者·魏倩



（插图：范薇）

和上个世纪专注职场提升的“夜校”相比，当下流行的“夜校”已经不是一种迎合外部标准的途径。穿梭在琳琅满目的课程中的年轻人，与其说是想学习某种技能，倒不如说是在找回学习本身的幸福感。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和一群有同样爱好的人，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Gap Night。

夜间缝纫班

2023年12月9日晚7点，我在北京市国贸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穿针引线。眼前的长桌上散乱摆放着花布、线轴、线剪和按扣，两台电动缝纫机搁在一角。围着长桌，和我一起埋头工作的还有其他五位女同学，我们都是这家夜校“手工缝纫班”的学员。

“这个藏针的手法我怎么一直搞不懂？”“你看我这反面走线还是有点歪。”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同学一边忙活，一边搭上话，眼睛丝毫没有离开手里带花样的小茶垫。

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她们都在为它努力着。一位同学说她昨晚睡前还在缝那朵菱形小花，差点把针落在床上。围着长桌，身边另外几位同学也探头互相看看进度，聊起针插的使用、划粉的成分，一时间，人仿佛身处上世纪晒着太阳的农家小院，正和邻居亲戚们纳鞋底缝被套。只有窗外的风声和拥堵道路上的汽笛声，提示我仍在冬夜里的东三环，身边的人则是附近写字楼里的上班族。

她们的热情也让刘国杰颇感意外，“不知道怎么就爆了”。她是手工缝纫班的老师，也是国贸这家成人培训机构的合伙人。2023年10月，她所在的机构第一次开夜校课程，首周报名人数就超过1000人。两个月后，他们在海淀区、朝阳区等地开出分校区，学员总数超过5000人。他们在“小红书”上开设的账号，每天同时有七八个人咨询报名，还因此受到了平台方的推荐。

今年以来，像他们这种在夜间开班的小型培训项目，现在流行说的“夜校”，越来越受到城市年轻人的欢迎。

刘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除了做培训讲师，她还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箱包贸易公司。在她的印象里，“夜校”这个词时隔30年后又集中出现在大众面前，还是在2023年下半年。8月11日，已经开办了八年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开始了今年秋季课程的招生，报名当天，有65万人上线“抢课”，当地媒体报道，最热门的零基础手工皮具体验课和烘焙课仅16秒就被抢光。在北京，刘国杰所在的机构原本主要面向成人做职场培训，也陆续有学员询问能否在晚上开课。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突然又想来上夜校了？”刘国杰一时没想出答案。但他们机构决定赶紧抓住机会，今年10月，第一期夜校课程上线。开始的授课内容都是根据老师们原本的技能发展而来的。缝纫打版是刘国杰的老本行，所以开了缝纫课；一位原本教职场演讲的老师在北京电影学院受过表演训练，就来教即兴戏剧。

课程进行快两个月，接触了不少学员，刘国杰也琢磨出了“夜校”的一点门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培训班，收费低廉肯定是“夜校”吸引力的来源之一。500元12节课是目前行业内的基本定价。他们的机构采用“划卡制”，12次课不限于同一课程，“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不同的体验机会”。

就在我们围着长桌边聊天边忙针线活儿的时候，场地另一侧的“吉他弹唱课”正在同时进行。隔着一条布帘，那边忽而“一闪一闪亮晶晶”，忽而“陪你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边拈针的同学也跟着轻轻哼唱，气氛颇为温馨。8点半吉他课程结束后，又来了一位教计算机课的小姑娘，于是布帘那头的声音又变成“你把这一行选中，双击，上移”……每周二到周日晚上，这个场地内都有三堂“夜校课”在同时进行，有时这边在学茶艺，那边在大声学英语口语，这边在插花，那边在瑜伽冥想。

这环境当然算不上正式。但因为定价不高，很多学员的心理预期也相对较低，反而能有一点轻松的惊喜。拿我两天后上过的一节瑜伽课来说，练习场地其实就是把缝纫教室里的长桌移走，换上瑜伽垫而已。但因为学员人数不多，能有更多时间和老师交流，倒比之前在瑜伽馆里上过的课更令人感到亲切，好像自己在家做练习一样。我也是在这个班里，才放心地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肘倒立”。

夜校里，最受欢迎的课往往与“硬技能”提升相距最远。刘国杰本来预计招生量最大的是演讲，这也是过去他们机构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招生开始一周后，“手工缝纫”就在柱状图上一骑绝尘，成了后台咨询量最大的课程。

这倒是当下大城市夜校课程的一个微缩版本，轻松、亲切，很少涉及学历提升和职场晋升的“功利”需求。随手在网上搜索，分散在各个城市角落的夜校班几乎涉及了你能想到的各种内容，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市民夜校有300多门课程，包括烘焙、评弹、芭蕾舞，北京正在开班的夜校也有声乐、演讲、木工、簪花等，我甚至还搜到过一门教授“果木烤鸭”的课程。和上个世纪的工余夜校相比，我们与其说是在上“课”，



左图：夜校班里，同学们在学习插花

右图：夜校缝纫课教师刘国杰

倒不如说是上“兴趣班”。

我上一次学习缝纫就是在一个兴趣班里。那是20年前读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的两节课上完，4点钟会有一个长达40分钟的大课间，同学们可以彻底放松一阵，在跨班级的课外小组里，绘画班围着长桌画画，声乐班排队练声，软笔书法班的同学老是带一股墨汁味回到教室，足球班经常有人挂彩。我则在一位数学老师发起的缝纫班里第一次学会缝扣子和织围巾，课上，那位平时总黑着脸的老师会变得格外爱表扬人。

沉浸在一种混杂了怀旧与温情的情绪中，手里的活计也快完工了。因为是第一次上课，我做的是手工缝纫课里最基础的收纳包，两块裁成长方形的布料，单线缝制后翻正，折叠锁边，缝按扣。成品虽不很完美，锁边时好几次回错了方向，线迹都歪了，但完成后还是感到心满意足。我掏出手机拍照发给朋友，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我没有想着工作，也没有看剧、听播客，却一点都没觉得无聊。

“和真正的学习比起来，体验没意思”

想联系上庄玲不太容易。这周她一直在忙着做一只羊毛毡口金包。羊毛是自己买的精纺，在家染色，再用肥皂液一遍遍搓洗，做出湿毡羊毛片，晒干后在上面刺好纹样（一棵圣诞树），填球，剪开，上口金。一整套流程下来，就把一周后所有的下班时间都填满了。因为手上总是有活儿，她只有睡前才能用手机回我的信息。

做包的手艺都是从夜校里学来的。过去的一年里，庄玲在上海市民夜校里连续报了春季和秋季两个班，她也是今年8月16号秒抢到零基础手工皮具体验课的幸运儿之一。

在这之前，庄玲的生活主要围着钞票和账本转。她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一开始是做柜员，后来转到后台。银行的工作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上班、下班、清点、轧账、点库存，每天完成好规定动作，精神却一天天萎靡，只有在脱掉工服汇入人群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人有了点



（王攀 摄）

生机”，因为在过去的8小时里，没有人会真正看见她的脸和眼睛。

回家脱掉衣服就躺着，但到半夜都还在玩手机，第二天匆匆吃口饭又要挤地铁。上海疫情过后，连续44天没怎么见人的庄玲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了。周末爬山、摄影、做瑜伽，尝试了一圈之后，她被大学同学拉到了夜校。

“最开始以为活动只针对社区的老年人”，庄玲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小时候学过画画，她第一次报的是水彩班。学生比想象中要多，大多30岁上下，“百分之八十是女生”。内容也挺深，庄玲跟着老师打了一次线稿，发觉这并不是一项“消遣”，而是实实在在的课。

上课的感觉和其他活动都不一样。庄玲给我发过一个小红书上的链接，叫“去除班味儿”方法合集，具体做法包括：在“12306”找到3小时以内的高铁线，周末切换城市感受生活；周五放纵日，吃顿火锅；在工位准备一支自己喜欢的护手霜……过去一年里，这些她都尝试过，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上夜校。

我开玩笑问她是不是“东亚做题家灵魂觉醒”，她却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和我分析，同切换城市和闻护手霜相比，上课肯定有痛苦的感觉，你被课程要求和自己的水平束缚住了，必须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但一旦坚持下去，任务奖励又是即时可得的，这次课学会填色，下节课就能用得上，时间久了，进步累积，当你发现自己能画出一个还不错的作品时，更大的喜悦也随之而来。

“人其实是喜欢有一定程度痛感体验的，”庄玲总结她的发现，“一直吃甜的东西是在哄着自己的味蕾，但没多久就腻了。去上课，你很少会觉得腻，因为永远有你做不到的挑战，好像吃辣椒一样。”

陶艺师柴鑫杰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宋庄开了一家陶艺工作室，除了帮附近的艺术家做衍生周边，帮美院的学生做毕业作品，也做过成人陶艺培训。但宋庄地处北京最东头，学生往往要折腾两个小时才能到工作室，很难维持连贯课程。11月中旬，他和朋友一起在朝阳区租到场地，开了间陶艺夜校班，第一期报名人数就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陶艺零基础的学员，柴鑫杰挺高兴，觉得这或许是能让北京陶艺氛围变浓郁的途径。

在他的课堂上，我问柴鑫杰，夜校形式的课程和我们熟悉的陶吧体验有什么不一样？他回了我一句话：“和真正的学习比起来，体验‘没意思’。”

他解释，陶吧的体验偏重服务，店主的目标是要帮助客人初步了解陶艺，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件作品，作为消费者，一切都轻松愉快。但真正的陶艺学习却有标准，要提要求，要维持固定出勤，也可能充满疑惑、挫败和痛苦，做老师的有时也跟着着急，可“等他有进步，你也有成就感”，这些都是柴鑫杰口中“有意思”的根源。

我旁听的那晚是一节拉坯课，正赶上北京大降温，6点半，同学们从北京城四面八方赶到南四环附近的课堂，脱掉羽绒服就开始找板凳自己揉泥。一大块陶泥要揉到均匀无气泡，再小心端到机器旁边，再定中心、开动转轮，分头练习。

上课了，一群人围成圈，一项一项盯着老师演示，一位学员开玩笑：“把老师的手和我的换一下行不行？”她是从三里屯那儿下班后坐了40分钟地铁才赶过来的，现在课程过半，才刚学会拉



（王攀 摄）

陶艺师柴鑫杰（右）和他的同事王安邦一起开了陶艺夜校班

素坯。柴鑫杰告诉我，拉坯班最考验人的时候到了，同期的手捏班学员已经能做出一两个作品，他们还依然只能不停地练基本功，看着亲手做好的杯盘碗盏一次次重新变成泥土。

但也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最后的完成才格外令人兴奋。老师的演示完成后，那位学员在角落里找了台机器，重新练习做小杯子。这次，她试了试用老师教的方法，两手食指配合着固定立面，轮盘转动，这次杯子没再变形。看着她专注的神情，我突然想到，人类的大脑会遵循一种模式，当新的发现和顿悟产生的时候，释放大量多巴胺，从而产生极度愉悦的心理感受。

在各种夜校群里潜伏，我经常看见缝纫班里，有同学半夜长吁一口气，把自己刚刚缝好的作品拍照发出；陶艺班里动不动就有人发来照片，说要做这样或那样的罐子；一个教木质刻章和拓印的班，已经有同学买了“超纲”的材料，把手都磨破了皮。

我则在第一次课后就找出自己去年扔在柜子里的一条没织完的围巾，在网上连续搜了好几个针法视频，花了一个下午奇迹般地把它收了尾。

暂停吧，夜晚

19 世纪的夜校创办者们应该不会想到，100 多年后的人们会通过上学来休息。

若要追溯“夜校”的教育形式，是始于 19 世纪的欧洲。为了帮助普通工人利用工余时间提高文化水平，政府开办各种形式的夜校、职校和函授班。当时，意大利的劳工组织为了应对民间罢工的压力，想到利用工人们一天中最整块的闲暇时间完成文化基础普及，减少文盲数量。从那时起，上夜校就被视为工人实现智识跃升的标志之一。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夜校的课程内容几经更迭，但它所代表的“积极”“勤奋上进”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尤其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候，总有一些年轻人想到利用万籁俱寂的夜晚完成充电、冲刺。20 世纪末，由于人们对职业技术培训需求增长，夜校在全球各大工业城市都得到普及，这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改革开放后的各种职业夜校。

可对现在的人来说，如果已经花了一整个白天冲刺了呢？这时，夜校提供的学习时间反而成了生活里不可多得的停顿，或者用时下的流行词来说，是一个“Gap Night”。

在互联网上各种课程都如此丰富的当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出门上课？这几乎是我向每一个夜校学员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在夜校班里，同学们给了我几个答案。一个相对现实的考量是，在通勤距离较长的大城市里，平时出一趟门安排活动动辄一两个小时，着实需要斟酌。但到了上班的日子，反正“今天已经被上班毁了”，不如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学习看看，打发时间，所以周中的夜校反而比周末课程更受欢迎。

另一个答案来自庄玲。她告诉我，每个有课的日子都被她视为特别的一天，出门前要带上双肩包，下课后脱掉工服背起包，好像一下子回归学生身份，

成了十年前的自己。夜晚上课还给了她一个名正言顺不回信息的理由，和同事朋友解释了几次，晚上就很少再有人联系她了。“你想象一下，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坐在阳台上喝酒时那样，阳光洒在肩头，如同自由人。”庄玲开了个玩笑。

听着她的解释，我眼前仿佛也出现了一个透明但坚固的空间，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属于夜晚的区域里，课程是什么反而不再重要，关键是只要进入其中，人就可以被暂时豁免于常规生活之外。

自由摄影师杨杨同时是缝纫课和陶艺课的学员。因为日常工作不需要坐班，她自认不是个“标准受访者”。她告诉我，对于夜校，自己的期待来自2022年夏天在景德镇学陶艺的经历。她早就对陶艺有兴趣，在社交网站上也总是特别留意各种各样的手工陶器，一看见好看的就放进收藏夹。尤其是那些“手捏大陶罐”，更让她觉得神奇，不用转机器，就能做出各种形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去试试呢？她在网上报了班，飞到景德镇租好房子，整整在那儿待了两个礼拜，“每天的课从早上到晚，但人一点都不累，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在那儿做东西，天自己就黑了，人特高兴”。

杨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上大学时自学摄影，后来做成了本行。上班后又练过快7年的爵士舞，偶尔还约朋友出门骑行、画画，但很久没有一件事像景德镇那次一样令人快乐了。

除了学习带来的心流状态，和强制“不能碰手机”的与世隔绝感，柴鑫杰还特别强调了学习氛围的助益。小组互助学习，也是夜校一开始就有的特征。起初是因为夜间教师稀缺，后来的教育者们则发现，这种学习模式更适合成年学生。柴鑫杰的夜校班每次都有近20人一起上课，和过去在宋庄孤零零两三个人的上课体验完全不同。人少的时候没有比较，自己一个人回家捏泥固然沉浸，进步速度也慢，尤其是基础班，“你出问题的地方我没有，学生自己就可以互相指点”，大家一讨论，动力就更足了。

一开始拉庄玲上课的那位大学同学，就是为了这种氛围而来的。她告诉我，自己过去也通过网上的小组报名去佘山徒步，去市集打卡，到滴水湖环湖骑行，但过了30岁，在上海也待了快10年之后，她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一开始的探索欲。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再是“体验”，而是期待更深更慢的连接，这时，城市青年小组安排的活动也多少有点不合适了。

“我觉得自己需要的不是‘搭子’，而是伙伴。”我请庄玲的大学同学解释二者的区别，她没有给出特别确切的答案，只告诉我，“搭子”的作用可能是提供陪伴，缓解孤独，伙伴则可以不一直在，但每次见面都能有相对深入的交流。因为夜校，她和庄玲的关系也变得比以前更密切了。她俩虽然住得不远，但一年顶多约两次吃饭，但过去一年，两人除了一起抢课、上课，还一起去杭州参加了次市集，把手工做好的耳环、包包都卖了出去，赚来的几百块也都一起在杭州花掉了。

虽说是为工作，上夜校也给我带来了一点点改变。过去一周，我几乎每晚都出门，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在地铁站分别，情绪状态比整天在家的时候更好。和不同课程的同学聊天时，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同城活动资讯，他们还把我拉进了北京城郊游绘画群、密室群、二手市集群……每次聊完，他们的结语都是，“那下次叫你一起啊！”

12月15日是个周五，我陪着摄影师去给采访拍照。那天正赶上北京初雪后的大降温，人们都躲在家里防寒，东三环久违地不堵车。在国贸附近的夜校里，缝纫、插花和英语口语课同时进行，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快下课的时候，缝纫课的同学掀开帘子，拿着手工皮具到插花班“串门”，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虽然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也因为眼下的课程有了交谈话题。

又过了一会儿，隔壁英语课也下课了，一群女生嘻嘻哈哈地挤在门口，想看看刚才声音洪亮的老师长什么样子。就这么一直聊着，快到9点半还没散场的意思。

看着他们，我想起刘国杰刚见面时跟我说过的一件小事，那也是她想在北京开夜校课的初衷之一。今年3月，她在上海国金中心楼下的一家咖啡厅里闲坐，一位英国小伙子走过来，问能不能和她拼桌，见他俩聊起天，一个法国姑娘也顺势坐在旁边。到最后，一张六人卡座全部坐满。原本毫无关系的六个人，就借喝杯咖啡的机会天南海北地聊了几个小时，她原本郁闷的心情也消失了。“一杯咖啡47块钱，但这47块钱的快乐却是身边人给不了的。”离开咖啡厅，刘国杰想，“让我也搭一张桌子吧，复兴这种单纯的快乐。”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庄玲、杨杨为化名）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立后破，科技兴国

主笔 · 谢九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对2024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两大提法格外引人关注，一是强调“先立后破”，二是将科技创新提到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

2023年是中国经济比较特殊的一年，三年疫情防控结束，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增速在取得恢复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多超出预期的困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肯定经济发展的成绩：“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随后，对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也作出了总结：“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困难的总结是：“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困难的总结增加了更多笔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稳”字提出了更多要求。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是“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是在稳的基础上求进。今年虽然也提出了稳中求进，但同时强调了以进促稳，“稳”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更重要的是，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先立后破”，这成为这次会议最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

通常而言，经济改革最常见的说法是需要不破不立的勇气，只有先打破旧事物，才能建立起新生事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先立后破，凸显了稳健务实的风格，在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之际，先不要过急打破旧有的增长动力；当新的增长动力确立之后，就可以更大胆地破除一些旧有的发展模式。

“先立后破”的提法，其实并非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2021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前几年，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很多地方开始运动式减排，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减排达标，甚至对企业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先立后破，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度提出先立后破。不过，当时外界对于先立后破的理解更多局限于碳减排等局部产业，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提出先立后破，和两年前相比，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先立后破不再只是针对个别行业，而是事关经济全局。先立后破的提法，意味着原先一些面临重大改革的行业，可能会迎来喘息的时机。这一次的先立后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明确提及具体指向，更直接相关的可能是房地产行业。

和两年前相比，房地产行业迅速恶化，风险快速上升，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提法是：“积极稳妥

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及“房住不炒”，前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及“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去年年底，房地产被重新提高到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在先立后破的思路之下，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引擎的房地产行业，可能还需要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光发热。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在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当中，科技创新被放在了第一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将科技创新放到首要任务，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希望以高科技产业突围的愿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头号任务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第二号任务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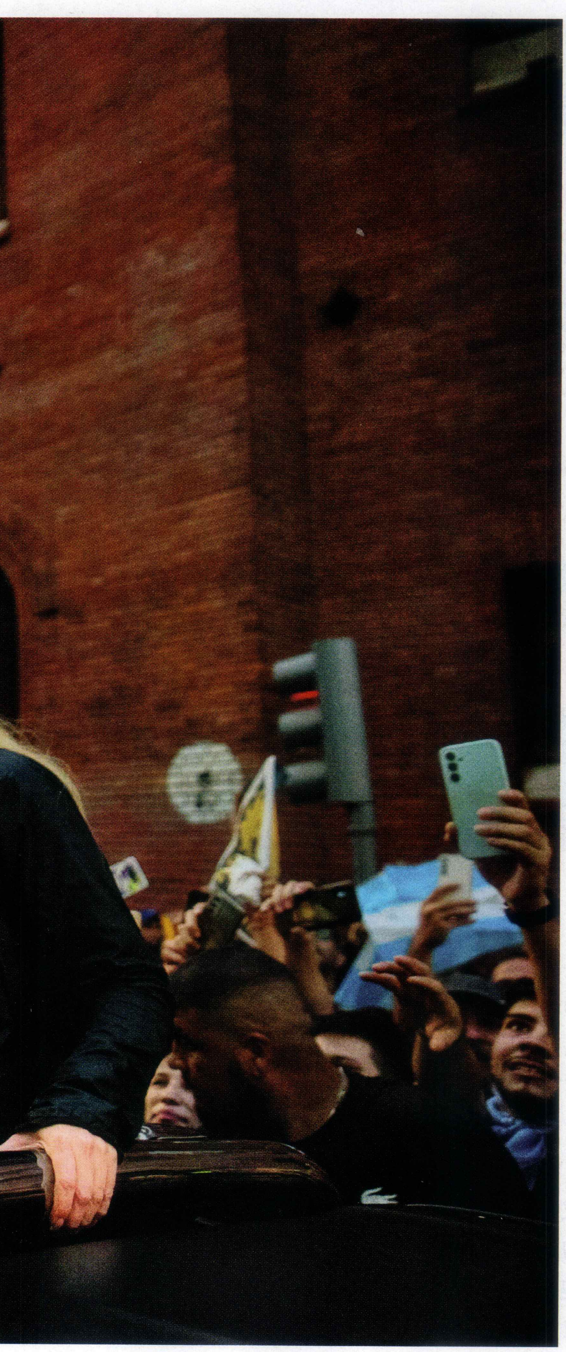
到了今年，两大任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为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头号任务，“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成为第二号任务。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思路。



“疯子”米莱背后：阿根廷向“庇隆主义”说“不”

记者 · 程靖　编辑 · 徐菁菁

过去 40 年里，结束军事独裁、进入民主化的阿根廷政坛，一直在代表左翼的庇隆主义者和少数中右翼政客之间来回横跳，但始终没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通胀、货币贬值和经济停滞困扰着阿根廷人的当下与未来。新总统哈维尔·米莱的当选，是超过半数阿根廷人对庇隆主义和传统政治精英说“不”的产物。



11月16日，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举行竞选集会

“疯子”横空出世

“如果一个国家像阿根廷一样失去声誉，它不进行财政改革，就不会有商业投资。选择渐进主义（改革），得有钱才行。但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已经没钱了。（休克疗法）一定会冲击经济活动、就业、工资和贫困率，但我们不是故意要选这么艰难的决策。为了清理过去100年政治精英们制造的‘垃圾’，除了‘休克疗法’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上午，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民众“自由，自由”（libertad，libertad）的呼声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誓就职总统。此次，阿根廷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76%，米莱最终斩获了55.69%的选票。在就职演讲中，他用上述强硬的措辞给阿根廷民众打了一剂“预防针”，宣布要将他竞选时期提出的激进改革主张付诸实践。

29岁的阿根廷人桑迪亚戈·古格里耶梅蒂（Santiago Guglielmetti）在家守着电视机观看了米莱的就职典礼。当桑迪亚戈接通本刊记者的视频电话时，他身穿阿根廷球衣，脸上是忍不住的喜悦之情。桑迪亚戈告诉本刊，自米莱宣布参选总统后，他一直在劝说亲友给米莱投票，当天的新总统就职对他而言，如庆祝“国庆节”一般开心。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梦琪就在米莱的就职典礼现场。她向本刊回忆：“大批米莱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外，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人们举着写有‘我们终于拯救了国家’的纸板，在小巷子里边走边唱改过歌词的政治歌曲，比如‘政治精英（la casta）要走啦’‘（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要坐牢啦’。经过居民的阳台时，激动的人群还会抬头向楼上的老奶奶唱歌致意。”

和桑迪亚戈一样，袁梦琪见到的就职日的庆祝人群，大多也身穿阿根廷图案的T恤、手举阿根廷国旗，但极少有人拿着支持米莱的特有标语。在她看来，这意味着，阿根廷人的庆祝并不“全心全意”为米莱，而是在庆祝阿根廷终于有机会走出民主化后庇隆主义（Peronism）党派长期执政带来的经济困境、迎来革命性的改变。

庇隆主义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非美式资本主义、非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其中“社会正义”通过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等再分配手段来实现。在1946年庇隆当选总统后的77年里，即使庇隆和支持者经历了流放、镇压与政治禁令，庇隆主义候选人在被允许参加的14次大选中获胜了10次。进入21世纪，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和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左图：12月10日，米莱宣誓就职阿根廷总统，支持者身穿阿根廷元素衣服、挥舞阿根廷国旗在街头庆祝

右图：2019年10月19日，时任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中）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当年10月27日举行的大选中，马克里输给正义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

夫妇、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等总统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衣钵。2019年选出的中右翼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已是阿根廷能找出的“最右”政客。

米莱则和庇隆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离开就职典礼现场、乘公车回家时，袁梦琪就目睹了支持与反对米莱的两拨老太太的冲突：“反对者看到身穿阿根廷服装的支持者，把自己的提包往后者身上砸，嘴里喊着‘你们都是不会阅读、不会学习的无知之人’，支持者将包砸回去后，表示‘你是疯子，我才不要和你说话’。”

在舆论场上，米莱才是被称为“疯子”（el loco）的那个人。米莱担任众议员仅两年，没有推动过任何立法，几乎是个“政治素人”。自米莱参选以来，无论是他提出的自由放任经济改革计划，还是夸张过激的言行举止，在阿根廷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极大争议。

米莱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支持自由放任经济学。他宣称要“炸掉央行”，实施全面美元化；他曾称政客为“老鼠”和“寄生阶层”，还公开辱骂批评他的女记者是“驴”。他称“国家是一个犯罪组织”，“用武力征税为自己筹集资金”，担任众议员时每个月抽奖给民众发钱。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高举电锯，扬言要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开支。他还在画着阿根廷政府架构的白板上，将写着部委名称的卡片一张张扔掉，表示要裁撤社保、教育和妇女等部门。

此外，米莱还曾模糊地表达过对器官买卖和人口贩卖的认可。尽管支持同性婚姻和性别选择自由，但他反对女权主义和堕胎权，也反对学校性教育，否认气候危机。他主张和美国与以色列拉近关系，和中国冻结官方贸易关系，退出和巴西等5个拉美国家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协议。此外，为了保持发型的“凌乱和随意”，他从十几岁起就不梳头，因此也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

1970年，米莱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分别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血统。米莱的父亲曾是



一名公交车司机，后来生意发达，成了几家运输公司的老板，母亲则是家庭主妇。据米莱成名后自述，他和父母的关系糟糕，小时候遭到过父亲的暴打和心理暴力。

在米莱19岁那年，阿根廷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83年上任的总统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没能解决好军事独裁时期遗留下的财政赤字和外债问题，到1989年初，阿根廷当时使用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在5个月里贬值了1200多倍，年通货膨胀率近5000%。当时已是经济学学生的米莱和母亲去超市时，目睹售货员用价签枪不停地重新给商品标价，顾客们却仍然疯狂地购买。“经济学供需理论告诉我，当价格上涨时，需求就会减少，”米莱今年接受采访时说，“但为什么现实不一样？我觉得我学习的东西出了问题。”

自那以后，米莱一头扎进经济学，至今已获得两个经济学硕士，发表50余篇经济学论文。他先后在投资公司、金融咨询公司、跨国银行和国际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和顾问，写过多本经济学书籍，包括202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者之路》。进入政坛之前，米莱相当高调。他有自己的广播节目。2018年的数据显示，他还接受过235次阿根廷及国外媒体的采访，露面时间超过537小时，为阿根廷同行中最多。

米莱在媒体上频繁的露出，将他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主张，在庇隆主义思想主导政坛的阿根廷最大限度地传播了出去。米莱不仅政见相反，他的极右翼言论、情绪充沛的表达和一头乱发的形象，通过15秒、30秒的短视频和搞怪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在爱玩手机的年轻人中尤其受欢迎。

米莱支持者乐观地将2019年视为起点：2020年，米莱决定竞选参议员，他在门多萨举办的集会，在支持者的组织下吸引到了2万名观众，比前一年时任总统马克里的集会（5000余人）还要热闹。当选众议员后的米莱，又在2022年宣布参选总统。

相比于对手，今年米莱的造势活动显得寒酸：没有经费购买巨幅广告、只在少数省份举行了集会，多数时候在街头与民众交谈，但今年恶劣的经济形势已足够帮助他在大选中获胜。

说“不”的政治

11月19日晚大选结果揭晓的时候，坐在电



1.3月16日，市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市场里购买果蔬。此前12个月里，阿根廷记录到的通胀率高达102.5%，为1991年以来最高

2.3月12日，阿根廷圣达菲的农民在干枯的玉米地里，清理受到严重干旱和高温影响的玉米作物

3.9月1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在清点他用来支付房租的9万阿根廷比索现金

视前的索菲亚·玻吉（Sofia Poggi）开始哭泣。索菲亚是新闻专业出身，曾在英国生活，是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身上所有标签都和米莱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南辕北辙。索菲亚告诉本刊，在她心情平复之后，她开始理解那些投票给米莱的人，“他们并非热爱米莱，而是为了改变现状，谁会想生活在永久性的经济危机里呢？”

1989年阿根廷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改变了米莱的人生路径。而在34年后，出生于1992年的索菲亚和她的同龄人们，又遭遇了他们人生至今最严重的通胀。据《经济学人》报道，今年阿根廷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到90%，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今年4月，阿根廷年度通胀率一时间赶超津巴布韦位居全球第二（102.5%），仅次于政府破产、同样深陷经济危机的黎巴嫩（190%）。

高通胀伴随着阿根廷比索大幅贬值。2023年起更是如火箭般蹿升，比索币值在一年之内缩水近80%。袁梦琪2021年中抵达阿根廷开始田野调查，两年半时间里目睹了超市里的一公斤洋葱从99比索涨到549比索，比索对美元汇率也从300比索兑换1美元跌到1000比索兑换1美元。由于阿根廷政府每月仅允许民众通过官方渠道兑换不超过200美元（但通常难以换到），民众普遍采用黑市汇率来计算比索价值。袁梦琪还用人民币换算价格，发现一公斤牛肉的价格也翻了一倍。

货币变成“废纸”，让阿根廷今年的贫困率超过40%。阿根廷并非大范围失业的国家。今年9月该国失业率为6.9%，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这意味着阿根廷广大中下层民众在有工作的情况下，


2


3

生活却难言富足，有时甚至为了补贴家用而打好几份工。

索菲亚的好友是一名记者，接受了5年本科教育，读完硕士后进入国家电视台工作。但朋友以比索计算的月薪，按当下的汇率仅合230美元，刨除每月150美元的房租，她还要吃饭、通勤、养车和宠物。为了满足开销，朋友要接自由撰稿项目、卖饰品来挣外快，还需要父母的接济。

索菲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美国公司远程做文案策划。工作虽然普通，仅仅是因为以美元领工资，索菲亚的收入就能达到朋友收入的20倍以上。她坦言，如今挣比索工资的朋友在生计上挣扎，外出时一些朋友乐于接受索菲亚的买单，但另一些朋友的自尊心不允许，和他们维系友谊需要艰难地平衡。

经济危机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索菲亚的母亲是房产经纪人，而近年来阿根廷低迷的房市让母亲几乎没了收入。由于通胀飙升，阿根廷银行越来越少批准贷款：202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交易的3.3万套房中，只有4%获得了银行贷款；若要全款买房，购房者要在外汇管制下筹集足够的美元现金。瑞银数据称，阿根廷人需要攒19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购房难度仅次于中国香港。袁梦琪在阿根廷的好友多是来自首都的年轻人，在政府部门、银行、审计等中上收入行业工作，但购房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租房也很难。几位阿根廷年轻人都告诉本刊，如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租房，房东不会与租客签署固定租金的合同，一些房东用美元收款，或每月、每三个月涨价，否则会面临亏损。袁梦琪的俄罗斯邻居则以比特币付款，“即使是高波动的比特币也强过比索”。

据索菲亚观察，经济每况愈下，让社会的倦怠、不满和愤怒情绪积累起来，已到达爆炸的边缘。在电视台工作的好友，常常向索菲亚抱怨：“我的工资这么低，也没有奖金，能来上班已经很够意思了，什么事都不应该让我做！”

大选期间，米莱屡次用激烈的言辞高呼“统治阶级走开”“政客是老鼠”等，正利用了自己“政治素人”的形象、迎合了民间对政治精英以及工会高层、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

前总统马克里曾担任著名足球俱乐部博卡青年队的主席，是阿根廷巨富马克里家族的继承人，曾因2016年披露的“巴拿马文件”风波和利润高达7000万美元的风电场交易接受阿根廷检方的调查。

而阿根廷民主化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前总统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夫妇，已多次因欺诈、挪用公款、藏匿现金等被指控。2022年12月，克里斯蒂娜因涉嫌腐败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她被指控将巴塔哥尼亚高原的道路建设项目交给熟人，案件还涉及她担任总统期间的两位内阁部长。

事实上，30岁上下的索菲亚、桑迪亚戈，几乎没有见过阿根廷的“好时光”，除了90年代梅内姆总统实施经济改革带来的短暂繁荣，和2003

年基什内尔总统上台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他们迄今为止的人生几乎都在经济危机中度过，“没有哪一年不在通胀”。父母辈更是从军事独裁年代（1976～1983）和恶性通货膨胀中一路走来的。索菲亚认为这是阿根廷人悲观心态的来源：“当你以为情况到了谷底，那还不是真正的谷底，未来还会变得更糟糕。”

理想与现实

“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riche comme un Argentin）这句法语俗语自诞生以来已经过去100多年。1880年上台的自由主义政府，将阿根廷打造成了一个建立在出口农产品和进口欧洲的技术、资金、管理和劳动力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到“一战”爆发前的40余年里，600万人从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地横渡大西洋来到阿根廷。1913年的阿根廷已是全球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墨西哥记者、拉美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冈萨雷斯（Alex Gonzalez）将阿根廷描述为“从20世纪初高点陷入长期衰退的经济体”。“一战”爆发后，整个欧洲投入了残酷的战争，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阿根廷赖以生存的农产品出口，阿根廷转而开辟国家工业化道路。工业化进程中壮大的阿根廷工人阶级，希望在自由主义政府遗留下的贫富分化的社会中拥有话语权，庇隆认识到了工人的力量。1943年军事政变后当上劳工部长的庇隆，创造了后来被称为庇隆主义又被称为“正义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

庇隆主义一度乘时代的东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战”后百废待兴，欧洲和北美尚未复苏，阿根廷乘虚而起。1945年至1949年间，阿根廷年经济增长率接近6%，工业产量增加25%，同期就业水平提高13%。庇隆主义三大支柱中的“社会正义”为他巩固了工人群体的支持。庇隆担任劳工部长后的5年间，阿根廷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5%，工资和薪水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50年上升到50%，大多数人能享受医疗补助、产假、带薪病假和免受任意解雇的权益，还有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奖。一位阿根廷工会领袖曾说，庇隆给予了他们“寡头政治一直拒绝给予我们的尊严”。

但尊严并非没有代价。美国历史学家布朗(J.C. Brown）在《阿根廷史》中分析了“民众主义”在庇隆总统任期内导致的通货膨胀：全面国有化带来的机构冗余和人浮于事，大大增加了庇隆政府的开支，赤字滚雪球般地累加到下一年的账目上；国有化扩大了公共事业的受益人，也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政府限制农产品价格，让农民不事生产，物价也因此上涨，工人和中产阶级购买力降低；1951、1952年的旱灾导致农业出口显著下降，外汇收入急剧下降破坏了阿根廷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能力。而庇隆政府决定用紧缩计划来应对危机，大量裁员、冻结工资，利益受损的工人很快就上街示威，表达愤怒。那时的庇隆就已发现，维护工人权益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难以取得长期平衡的悖论。这个悖论也在此后几十年里反复上演。

亚历克斯向本刊分析说，庇隆主义者多选择保护主义路线，让企业就业和薪资不随市场波动，这样一来，阿根廷的公司成了保护工人收入的机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袁梦琪指出，阿根廷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经济自主，一直是一个原材料出口为导向、极度依赖国际市场环境的经济体，其偶然的繁荣有外部原因。“例如2003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上台后首个任期的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带来了红利，能让阿根廷政府有余力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大豆价格降低后，很快就难以为继。”

于是，一个死循环诞生了。庇隆进入政坛后的70余年里，阿根廷政坛可谓在“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来回横跳。1955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的统治，此后上台的军人和文官政府又大多选择维持庇隆主义。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至今，阿方辛、梅内姆和马克里等总统都尝试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每一次都以债务和经济危机爆发、民众回头选出庇隆主义总统而告终。

亚历克斯告诉本刊，上世纪阿根廷的移民多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土壤的国家，他们在本国独裁政府或

法西斯政权下受压制，来到阿根廷后拥有了组织工会的广阔空间，形成了街头政治传统。为了给工人发福利（目前 80% 的阿根廷人或多或少享受政府补贴），工会会要求政府增发货币来填补财政赤字；通胀时期工会又会组织起来，要求提高薪资以跟上通胀的速度。

一届政府一旦陷入危机，往往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帮助他们进行改革，也没有时间熬过改革的阵痛。政治对手会利用危机。阿根廷经济学家巴勃罗·萨尔瓦多（Pablo F. Salvador）认为，为了赢得支持率，下届政府往往放大上届政府遗留的问题，采取完全不同的新政，这影响了阿根廷的投资大环境，经济难以长期稳定发展。

12 月 12 日，米莱烧起他上任后的“三把火”。新任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宣布将本币比索官方汇率大幅贬值 50% 以上，从 1 美元兑 365 比索贬值至 1 美元兑 800 比索；阿根廷中央政府将减少向各省政府的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公共工程招标将停止；政府还将减少能源和交通补贴，但给最贫困人群和儿童的补贴将分别增加 50% 和一倍。由此，“休克疗法”正式启动。

针对外界对“美元化”的质疑，卡普托 15 日重申，米莱将会对该政策信守承诺。但袁梦琪对美元化的落地并不乐观。她认为，尽管拉美国家中厄瓜多尔已实现过美元化，但前者的经济体量远远小于阿根廷，实施美元化时仍有足够的本金，而阿根廷在美元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支撑市场的货币需求。此外，美元化后，阿根廷农场主会因收益增加而扩大生产，长此以往将导致国际市场上牛肉、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利于美国同类产品出口，因此美国不太可能愿意支持该政策。

亚历克斯则对米莱政府的前景相当悲观。他认为，阿根廷的经济恢复还是得寄希望于已持续三年的干旱在未来能够缓解，农产品收成得以恢复。“比索贬值将吸引外资进入阿根廷，以便宜的价格购买锂矿和大豆。如果进展顺利，阿根廷的经济数字可能会很好看。但长此以往，阿根廷可能会变成一个外资拥有的国家，而国内民众什么也买不起。等到矿产枯竭、干旱来袭，外资就会卷铺盖走人。”亚历克斯说，“到那时，愤怒的民众又会走上街头，他们会说，‘当初是谁保护我们工人的权利不受侵害？’于是或许又会开始下一个循环。”


（插图：老牛）

通宵直播 5 天后猝死的年轻人

记者 · 彭丽　编辑 · 王珊

李双霖是河南省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大专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在一家直播机构实习。2023 年 11 月 10 日，他在出租屋里猝死。李双霖的账号直播记录显示，去世前，从 11 月 5 日开始，他每天晚上都从 9 点左右直播到第二天早上 6 点，连续通宵直播了 5 天。

连续通宵 5 天

11 月 10 日傍晚 7 点多，身在东莞的李国良接到一个来自河南的电话。电话是儿子李双霖的辅导员打来的，说李双霖的情况不太妙，还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拨过去，说是医生的。半信半疑的李国良打了过去，医生告诉他，李双霖因猝死已经离世。

李双霖是河南省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年 20 岁，出事前在郑州一家直播公司实习。李国良无法相信这个事情，他记得，儿子出事前两天，还让妈妈寄了冬天的衣服过去。匆忙

赶到郑州的李国良在殡仪馆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身高超过一米八的李双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李国良那时才意识到，儿子真的没了。

与李双霖一起合租的同学告诉李国良，李双霖是11月10日下午5点半左右出现问题的。李双霖当时还在睡觉，同学听着他呼吸非常急促，试图去叫他，却叫不醒，就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还在医生的电话指导下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之后救护车赶到后也进行了抢救。合租的同学说，在猝死前，李双霖刚刚“通了一个大宵”，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游戏直播。

李国良今年46岁，十多年前到东莞打工，现在在一家小环卫公司当主管，手下有十几个环卫工人。他不了解游戏直播，只知道这是儿子找的一份实习。李双霖今年读大专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根据学校要求，毕业前，需要完成为期6个月的专业实习，并开具实习证明。一开始，李国良托关系将儿子安排在自己所在的公司。李双霖在那里实习了两个月，工作并不难，整理环卫公司的资料，写每周工人的安排计划。在李国良看来，这份工作很不错，坐办公室，每月工资还有4000多元。但李双霖告诉他，自己想回学校，找一份跟同学一起的实习。10月14日，李双霖开始进入河南省琴意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实习。与他一起的，还有他的3名室友。

河南省琴意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的招聘介绍显示，这是一家规模为20～99人的游戏直播公司，2019年注册，“从事游戏领域、深耕多年、有基础和资本”。李双霖的岗位为游戏主播。他直播的游戏叫作《原神》，这款游戏2020年9月上线，几个月就积累了6000多万粉丝，是一款开放类冒险游戏，玩家扮演“旅行者”的角色，在游戏世界里遇到同伴、打败敌人。在游戏中间，会有许多重复性任务，很多玩家觉得麻烦会有偿找人帮玩，帮打游戏的被称为“代肝”。

李双霖要做的正是直播“代肝”的过程。曾在同一公司直播过的谢意告诉本刊记者，在直播间，粉丝会打赏给主播，主播会现场帮打赏最多的“榜一”代打。李国良查看儿子的直播记录发现，11月5日前，李双霖一直是白天直播，从早上9点播到下午6点。同去的室友告诉李国良，在直播20多天后，公司经理找到李双霖，希望他能从白班转到夜班，“他（经理）说，夜班效果好，有更多流量”。不想通宵直播的李双霖一开始拒绝了这一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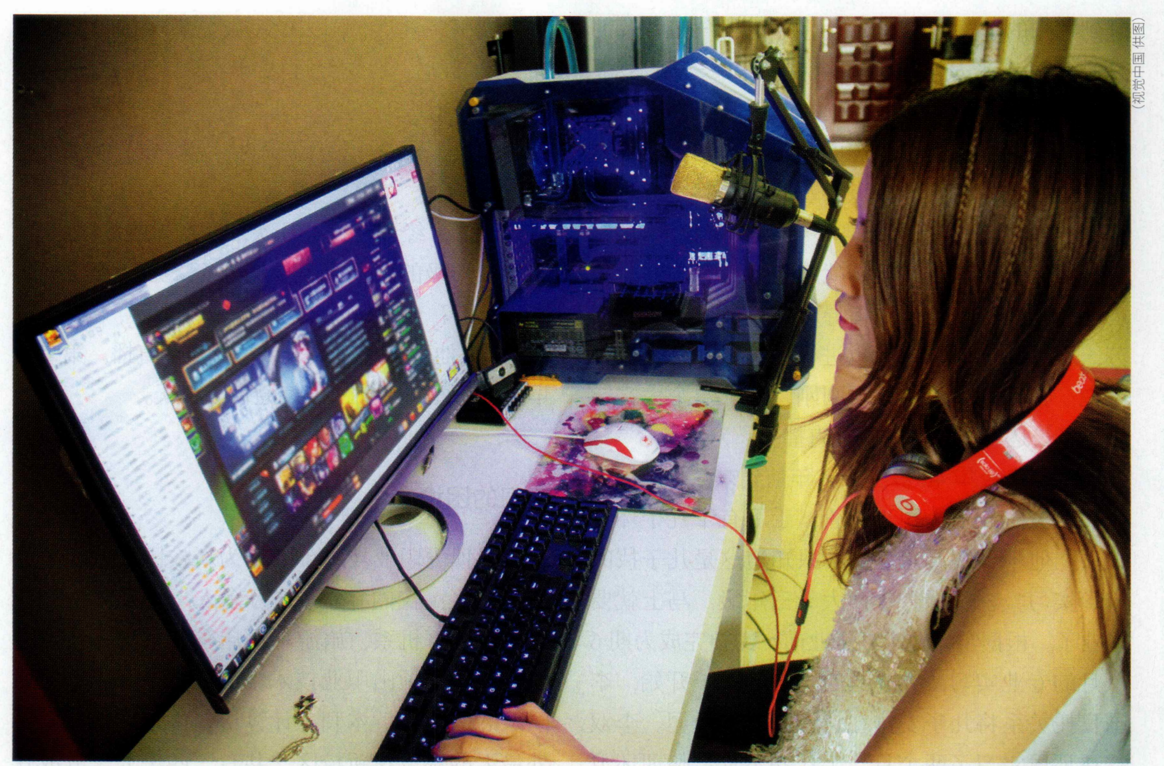
然而，经理连找了几次，李双霖最终同意了，大专三年级的他马上就要毕业了，迫切需要一份实习证明。李双霖的账号直播记录显示，从11月5日起，他基本从晚上9点左右开始直播，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下播，连续通宵了5天。

实习的困境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分为新校区与园丁校区两个校区，校内学生1.6万余人，学校开设有教育系、计算机系、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等16个系。李双霖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的。一名同系的同学告诉本刊，计算机系是全校除教育系外最大的系，在新校区，共有三四千人，分成软件工程、大数据、数字媒体等多个专业。与李双霖同在计算机系就读的吴哲理解一份实习证明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毕业前都需要在与专业相关的岗位上实习6个月，拿到实习证明后才能毕业。吴哲也是即将毕业，在读大专前，吴哲先在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合作学校读了3年中专，随后才来到了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继续读大专。吴哲说，他们班的同学，只有一半人自己找到了实习。但很多是不对口——一个大专生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是没有优势的。比如说，一个同学去做了篮球教练。

吴哲告诉本刊，找不到对口实习的人，可以去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电子厂实习。吴哲曾在这家电子厂实习。他形容那段时间“人都快疯了”。他被分到的任务是用气枪给空调外机拧螺丝。一条流水线30个人，两个人间隔一米，空调外机不停地从线的一端运过来，吴哲需要给每台机器打3个螺丝，1秒平均最少打2个，“不然会被组长骂拖了进度”。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6点结束，中间只有40分钟休息时间。吴哲觉得自



（视觉中国 供图）

“一万个主播里能遇到一个好主播，这个公司可能就挣钱了”

己在里面像个机器人，“压抑、没动力、没活力”，唯一的情绪就是“倒数还有几天能走”。他不敢中途逃跑，拿不到实习证明，就不能毕业。

事实上，在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不只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其他院系的学生也面临着找实习困难的处境。小学教育专业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牌专业。与李双霖同一级的李梅说自己一开始尝试投了几个县里小学的实习教师岗位，都被对方以“人已经招满”拒绝。李梅说，公立小学基本都要求是本科文凭。最终，为了毕业，她只能托关系在平顶山郊区的一所小学里实习。李梅告诉本刊，小学只有一栋教学楼，操场极小，学生只有小几百人，但她依然没有获得上课的机会。李梅说，自己的同学，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了专升本，还有人最后去干了幼师，或者进工厂、送外卖。

李国良几乎没有跟儿子李双霖聊过这个话题。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跟儿子交流很少，很多时候对儿子的关心也是通过妻子传达。李国良家在信阳市平桥区陈店村草楼生产队，村里没有临街优势，不能做生意，也没有支柱产业，他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对孩子成长中的种种困难，李国良考虑得更多是钱的事情。李双霖每年学费5000元，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0元，二儿子今年刚上初一，老婆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李国良必须努力赚钱。

公司的套路

一名游戏直播公司的负责人黄易告诉本刊，像《原神》这种类型的游戏直播在今年开始兴起。他说，《原神》游戏兴起后，不少人看到了巨大的玩家数量背后的机会。直播就是其中一种，主要盈利模式是粉丝打赏。“《原神》玩家多，愿意花钱的也就更多。而且，《原神》不是技术类的游戏，主播门槛不高，也容易招到人。”黄易原本是在杭州做游戏运营，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做游戏直播公司，目前已经开了两家公司，有40多位主播。”一位熟悉直播运行模式的知情者告诉本刊，对于直

李双霖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然而，这些证据当事人家属还原起来难度更大。

播公司来说，寻找一个好的主播越来越难，所以会采用广撒网的模式，把人招进来，任其发展，“一万个主播里能遇到一个好主播，这个公司可能就挣钱了”。

在李双霖出事后，曾在河南省琴意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工作两个月的谢意很庆幸自己早早辞掉了工作。谢意今年25岁，她是9月中旬应聘的游戏操作员的岗位，到了才知道是要做主播。谢意说，公司不大，从前台往里走就能看到四五列工位，坐了二三十个男生，都是主播，全部戴着耳麦在打游戏，很多都是在打《原神》游戏。

直播可以选白班和夜班。工作的前20天，谢意是白天直播，每天六七个小时，她内向，不好意思说话，直播间最多时才有十几个粉丝，每天的打赏都只有二三十元。这之后，经纪人找到谢意，建议她转去夜班，“他没有明说觉得我数据不好，而是说夜班人多，不说话也可以”。谢意不愿意，但经纪人说如果时长不够，拿不到保底工资——入职前，他们约定的是每个月如果能播到240小时，可以拿到4000元保底工资，播到260小时，可以拿到5000元保底工资。他们还签订了协议，约定粉丝的打赏分成比例，按照约定，谢意可以拿到40%。

为了拿到保底工资，谢意将直播时间改到了晚上9点到第二天上午11点多，每天直播13个小时左右。现在回想起来，谢意依然觉得那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一段日子。她告诉本刊，每次通宵直播下来，都觉得眼睛非常干涩。每次直播完，她还需要坐一个小时地铁才能到家，为了节约时间，她常常吃碗泡面就开始睡觉，醒后依然会忍不住干呕。她说其他直播的人状态也不好，他们同处一个办公室，各自在工位不交流，但每到后半夜，安静的工位上常常会突然一声大吼，“我不想上夜班！”熬到10月底，谢意想拿了保底工资辞职，但因为这一约定没有签在合同上，公司拒绝支付。

有关直播时间和保底工资，李双霖与公司签订的协议里面是有写到的。协议提到，李双霖要每月直播不少于240小时、直播天数不小于26天、每月上传短视频15条，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即可获得保底工资3000元。事发后，李国良曾去找河南琴意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希望公司能对儿子的死给出一个说法。但他只见到了公司的法务，法务将协议拿给他，并告知他李双霖与公司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合同，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赔偿5000元。

喻皓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文娱行业律师，也是湖南省直播协会的法律顾问。看过李双霖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后，喻皓指出，这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直播公司与主播签订的合同，即直播经纪合同。这一合同模式参考了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合同：经纪公司承担相应的培训、招揽资源、事业规划等义务，艺人则需要与之进行收益分成等。形式上，经纪合同的确不是劳动合同，这样的关系公司不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保，也不需要承担工伤责任。但喻皓表示，合同名称仅仅是形式上的参考，实际认定主播和公司的关系还是要以双方客观上真实的法律关系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中，家属可以从主播对公司经济上的依赖性及管理上的从属性来举证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比如公司有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去固定的地方打卡，必须在固定的工作时间段、在固定地点上班”等。喻皓认为，此次事件中，李双霖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然而，这些证据当事人家属还原起来难度更大，也很难系统收集，“可惜现在他本人已去世”。

郑涵从11月初开始看李双霖的直播，他记得李双霖的话不多，除了说“欢迎某某来直播间”外，其他时候都在解说游戏，但他游戏打得认真。郑涵说，有天中午，李双霖的直播间里加上他也只有两三个人，有人给李双霖打赏了1元的礼物。李双霖依然表示了感谢，帮他“代肝”得很认真。11月9日凌晨4点多，郑涵发现李双霖还在直播，郑涵劝他早点下播休息，李双霖回复了“好”，“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去休息”。

（应受访人要求，吴哲、李梅、谢意、郑涵为化名）



成都 SKP

成都 SKP：美好生活的全力奔赴

文 · 莫可非

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正在飞速变化。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求，这些年开始愈发年轻化和下沉化。这也促使着时尚行业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SKP 选择来到成都，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穿越周期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美好，值得人们去全力奔赴。当罗曼·罗兰在1906年出版的《米开朗琪罗传》中写下那句著名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序言时，他的脑海里或许浮现着这样一句论调。因为在那篇序言的最后，他总结道：欢乐和痛苦是一对圣者般的姊妹，“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灵。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能体会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或许，这才是平凡人“英雄主义”的真谛。即使生活充斥着疲惫、奔波与琐屑，但总有那么一些珍贵时刻，值得人们为之忍受所有的乏味。比如，外地人很难理解成都人对太阳的执念——因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常年阴天。每有太阳出现，成都人就喜欢倾巢而出去晒太阳，不惜翘班请假，仿佛那是某段时光里最重要的一天。网上还流传着诸如“成都人请假晒太阳的10个理由”的帖子。只有当地人知道，这不是段子，而是一种真实的奔赴。

成都人晒太阳更有讲究，一定要去开阔的露天广场和绿地，只有这样才足以显示对太阳的尊重。一年多来，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成都SKP成了成都人在阳光下的一个新“打卡”地标。这座开业一周年的高端百货商场，宛若一个大型的下沉式花园。从外部平视，只能看见地表葱郁的绿地，一旦从层层绿茵穿过，就会迎来一种忽逢桃花源的惊艳。在SKP入口处，一片金灿灿的风铃墙在日光照射下随风摇曳，被22.4万片金属片布满的墙体闪烁着金光掠影，灵动飘逸却又不失典雅大气，吸引了不少人驻足留影。

年轻的消费者Luna经常光顾这里。她说作为一个爱晒太阳的成都人，最初对于一个下沉式商场是有疑问的，“第一次踏入就是感觉特别亮堂，没想到采光这么好”。Luna回忆，那是一个阳光天，她坐在咖啡店外摆区，“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我就感叹，这地方一定要走进来了才知道如此地妙”。Luna此后频繁到访，成了会员。“这边的货很好，上个月去LV拿衣服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到了一大批的稀有皮，铺了大概两个柜。一方面说明店铺的受重视程度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顾客的消费水准相当可观。”Luna笑着说。

惊喜的阳光和簇拥而来的年轻人，是成都SKP主打市场的一个写照。过去五六年里，中国奢侈品市场快速增长。贝恩公司的报告《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个人奢侈品迎来增长新局面》显示，疫情三年期间，中国奢侈品的市场规模实现了从2019年到2022年的翻番。贝恩公司在2023年7月还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内地市场在2023年第一季度恢复增长，“预计今年将再次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他们预计202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同比增长9%～12%。

从某种意义上说，奢侈品等高端消费，扮演着引领消费复苏的角色，经济学界称之为“K型修复”。这背后蕴含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朴素道理：无论环境和周期如何变化，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向往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像成都人忍受阴天、等待太阳一般，包括奢侈品在内的种种美好事物是人之所向，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一如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所言，“奢华给予人们自由，使之摆脱旧习，不再麻木生活。奢侈是自由，奢华是优雅”。

现代奢侈品行业的起源，本身就是人性解放的结果。它诞生于文艺复兴之后，在一个倡导解放与自由的年代，从宗教禁锢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关注自我，就此将精致的手工业推向时代前台，在工业革命后催生了一批经典品牌。1854年，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巴黎开设了第一个店铺，同期的爱马仕（Hermès）和古驰（Gucci）也依靠马具起家。欧洲皇室是他们最早的客群。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中，这些品牌走向集团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享受，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都市生活的一种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

中国对奢侈品的认知始于改革开放后，在高速发展中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这片土地对时尚的热爱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更是在近年呈现出了一些引领全球的趋势。它开始穿越阶层和地域，走向了年轻一代和内陆地区。研究机构Bernstein联合意大利奢侈品协会



成都 SKP

Altagamma 在 2023 年 7 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比疫情前更加多元，来自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将对行业增长越来越重要，需要品牌们去探索更多“玩法”。

当下的中国年轻人与过往有着很大不同。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睁眼看过世界，别具时尚风貌和品位。怎么去跟这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沟通交流，也是高端零售要面对的新课题。

荟聚成都

或许，成都是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城市。它身居内陆，辐射西南，热爱时尚潮流的年轻人众多。从 2017 年香奈儿跨出京沪、在此举办一场近乎万人空巷的时装大秀，到 2022 年 LV 在太古里开出国内第三个路易威登之家，成都早已成为这些知名品牌走出一线城市后的第一站。

进入 2023 年，各大时尚品牌的高管们纷纷到访中国，行程单上必有成都。10 月，卡地亚（Cartier）、普拉达（Prada）等品牌的高管齐聚成都，参加由成都 SKP 和 WWD（Women’s Wear Daily）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时尚峰会。他们在此以“重塑世界”为题，共同探讨全球时尚行业的未来。

凭什么是成都？这座城市究竟有何魔力，能让品牌高管们远渡重洋来这里谈论世界？数据解释了部分原因：过去十多年，成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10 年常住人口是 1404 万，到了 2022 年就增至 2127 万人，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排第四——前三名均是直辖市。至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都更是在此期间翻了四倍。

数百万涌来的“新成都人”，多少是被这里的氛围所吸引。“天府之国”历来的富饶养育了古往今来的人们，也养成了当地人悠闲享乐的脾性。成都也热衷于拥抱美好生活的各个层面，哪怕它来自不同的文化。早在 1997 年，日本伊藤洋华堂就在成都开出中国首店，成都人就此初尝了精细零售管理的魔力。2014 年太古里和 IFS 开业，则进一步拉升了成都人对高端零售的感知。时尚大牌们在此精心地尝试“在地化”玩法，把时尚潮流搬到室外，让更多人目睹了品质生活的别致模样。

这也是外人最熟悉的成都，它聚焦在市中心的春熙路—盐市口商圈。太古里街区走路带风的潮人青年，连同几百米内扎堆争奇斗艳的大牌门

店和IFS熊猫，一度成为成都商业最明晰的烙印。只是匆忙的游客很少了解，春熙路并非成都全貌。从春熙路一路往南，会遇见一个更现代、更繁华的成都。

如果说要给近十年来成都的发展找一个微缩的具象代表，那成都高新区就是典型代表之一。这是成都近十年经济发展高地。在SKP所在的成都高新南区，一栋栋被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大厦组成了一组繁华天际线，聚集着互联网、金融、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涌来"蓉漂"们，很多都落脚在此。他们通常年纪轻轻，有着不错的学历和收入，促使高新区多家商场的诞生。在最核心的交子公园商圈，9.3平方公里内就汇聚了9大商业综合体。每到夜晚，交子大道旁灯火通明的商场和写字楼，点缀着商圈内高耸的双子塔灯光秀，描绘出一幅有关南门新成都的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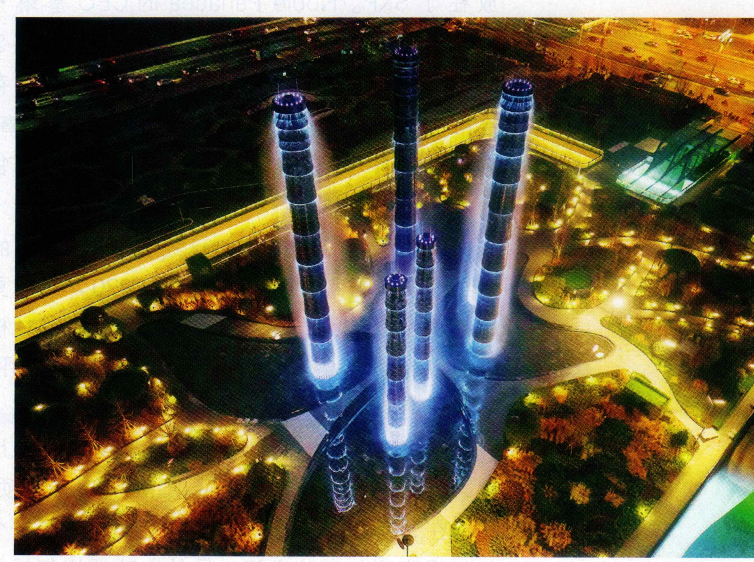
这也是成都SKP选择落脚的地方。交子金融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SKP到来前，交子公园商圈虽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商场，但缺少一个一线品牌齐全的高端商场，以至于不少重奢消费还要"进城"，SKP到来补齐了这一短板，交子公园商圈从此可覆盖区内全龄层人群。"2019年时，大家都知道SKP要来成都了，都很兴奋和期待。"该负责人表示，SKP的到来给商圈及周边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让成都的商业生态迈向了一个"双中心"格局。

不过项目要落地，还要克服一定挑战。SKP位于天府大道旁，地铁线横穿交会，多个绿地公园和高速路环绕。这块地是城南生态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允许有大型地上建筑。这是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SKP首次"南下"要攻克的难题——如果说春熙路商圈代表着一种传统成都的消费文化，要做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那在一个高度现代式的成都南门，考验SKP的就是如何找到一条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个打造亚洲最大下沉式建筑的想法应运而生。英国建筑事务所Sybarite承担了主要的设计重任。其联合创始人托奎尔·麦金托什（Torquil McIntosh）说，成都SKP向下挖了30米，99%的建筑物都在地下，地上是由Field Operations以蜀地织锦为灵感设计的生态公园。唯一的建筑是被视作SKP地标的"生机之塔"，6根高耸水柱直冲云霄，洒落的亿万水珠给人一种后现代般的虚幻与冥想感。这个超然的想象灵感来自格利高里圣咏（Gregorian chants）及其对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影响，旨在为成都的当代环境创造一种共鸣。

"它模糊了自然和商业之间的界限，也唤起了人与人的聚合与联结。"托奎尔·麦金托什说，SKP场域是一个辐射周边的"引力场"，能吸引各种元素在此融合。项目所处的地理区位、用地属性和TOD特性都支撑着这个"引力场"的茁壮生长。为了方便行人游逛，原本没有红绿灯的天府大道特意在此预留了人行道和红绿灯。SKP内部也设置了多个通道，与周边互通互联。

Luna至今记得SKP开业后她第一次到访的场景。那一天她打车过来，车停到SKP一旁，司机愣是没发现路边有一个购物商场，因为地面都被精修的绿植覆盖。"去SKP最好的点是再也不用进城堵车了。"Luna说，之前南门虽然商场多，但是品牌很难有差异化特色，买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差强人意。"对于住南门的人来说，SKP基本上把我想要的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品牌都补齐了。"


成都SKP生机之塔

SKP之道

衡量一个城市的时尚程度，这些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首店”数量。在各种报告中，成都几乎都是紧追京沪的中国“首店”第三城，在新一线和中国内陆城市中遥遥领先。中商数据与成都零售商协会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成都首入品牌研究》显示，2022年成都共计引入708家首店，数量居全国第三。

品牌们选择一个城市或商场开设“首店”，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成都与SKP的结合是一种天作之合。2022年12月，当成都SKP开业，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个翘首以盼的高端百货一站集齐了全球超1300个一线品牌，量级堪称西南之最，其中更是涵盖了222个首店品牌。

这当中，有在国外走红多年的低调高奢羊绒品牌COLOMBO。这家意大利传统手工艺品牌将中国西部首店落户在成都。还有护肤品牌Noble Panacea的中国首店，这是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泽·司徒塔特爵士（J. Fraser Stoddart）创立的品牌，有着“降维打击”般的护肤技术优势。当然，爱吃的成都人还能在此享受到南北两端的纯正美食，在米其林和黑珍珠常年榜上有名的北京厨房和大董，都将其成都首店放在了SKP。Noble Panacea的CEO塞琳·塔拉巴扎（Céline Talabaza）直接点明了成都SKP软硬兼备的优势：“成都是一座时尚与活力并存的都市。这里的消费者关注奢侈品，乐于接受新事物。选择SKP并不困难，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百货公司。”

诞生于北京的SKP，已经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蝉联中国商业地产第一名。2020年，它更是超越了伦敦哈罗德成为全球第一。极致的规模源于极致的管理和效率。无论单店销售额还是坪效，它均冠绝全球。

千呼万唤始出来。2018年，SKP首次走出北京，西安SKP落成。一年后，SKP启动成都项目，同时在北京SKP以南打造SKP-S。后者是一个针对年轻客群的潮流空间，是其主动拥抱年轻人的尝试。大量空间在此让渡给了沉浸式的艺术装置，机械羊群、人类移民至火星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在此都被具象化，兼具艺术感和未来感。

SKP自营买手店SKP SELECT也在其中，海外淘来的诸多前卫的小众品牌，在此为年轻消费者带来更潮流的多元选择。这也是Luna的最爱。“做买手店既考验选货能力，又必须有强大的经济能力，SKP SELECT真的哪儿哪儿都熟，它涉及的品牌聊起来我可以滔滔不绝讲两小时。”Luna说。

所有的这些，都被SKP应用到了成都。成都SKP的品牌门店标识高度统一，配合着整个场域的强大气场。黑白金的主色调配以优雅曲线，让空气里遍布着一种华贵之气。在成都，SKP继续以一种工匠般的精神，深耕零售的独特体验和业态组合。一个例子是，SKP几乎处处都为顾客的体感和观感考虑，也让身在其中的品牌这样做。Noble Panacea品牌透露，首店开业前，SKP团队会和他们反复沟通、提供意见，以确保其门店形象与SKP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

COLOMBO门店就是一个代表案例。设计时，他们采用大地色作主色，特意配置了一面可翻转的木制格栅墙面，与SKP“风铃墙”遥相呼应。“我们采用了大量木质结构，希望每一个到店客人都能感受到惬意与舒适，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挑选产品。另外考虑到成都年轻的一面，Z世代顾客更喜欢潮流与独特的事物，我们将巨型的羊形艺术装置‘搬’到店内，如同一朵白云悬浮在空中，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也适合打卡的地方。”COLOMBO负责人说。

最让人感叹的是，这样一个大型建筑中，SKP对细节的关注近乎无微不至，照顾到几乎每个环节：导购总是面带微笑；卫生间干净得像高档酒店，随时有人打扫；看见顾客提的行李太重，工作人员会主动帮忙去拎；下雨天时，哪怕只有几米的距离，保安也会打伞护送顾客到目的地；听闻一些反馈说南北馆之间的距离有些长，SKP很快就配备了招手即停的观光小火车。Luna有过更切身的体会，她曾在卫生间遗落过两枚戒指，直到午饭后才记起来去寻找，发现戒指已在第一时间被交到服务台，“一下子挽回了三万块的损失，放到


2023 成都 SKP iSING! 歌剧之夜

其他地方真的无法想象”。

有关SKP的这一切，Luna最喜欢的是陈设布置中的一个小细节。常逛SKP的她留意到，SKP馆内的鲜花几乎每周都会更新，从不同的色系、品种到不同的搭配，周周推陈出新，节假日还有整片的花墙和花园，让她在冬日里也感到温暖和惬意。“绝对是一大亮点。”Luna赞叹，“没有哪个女生能抗拒这么多的鲜花吧。”

由于经常光顾，Luna很自然地成了会员。她发现，SKP对会员十分友好。当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享受的折扣非常高。“特别是10倍积分的时候，真正做到了积分抵扣。上次我买了一双Jimmy Choo的高跟鞋，新款算下来都是7.8折，这比在海外买还划算。”此外，SKP还经常邀请她参加各种活动。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23年10月，第三届全球时尚峰会召开的前夜。那一晚，成都SKP隆重举办了“2023成都SKP iSING！歌剧之夜”，Luna受邀出席。来自8个国家的20位歌唱家，在标志景观“水幕盒子”和中央大台阶之间，为成都市民和来华的高管们献上了一场视听艺术盛宴。

这是成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的歌剧户外演出。由享有国际声誉的歌剧演唱艺术家田浩江担任艺术总监，舞台设计导演为与帕瓦罗蒂、多明戈多年合作的全球著名歌剧导演乌戈·德·安纳（Hugo De Ana），美国著名指挥卡马尔·可汗（Kamal Khan）与四川交响乐团以及iSING!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的制作团队共同合作。舞台在下沉广场的映衬下美轮美奂，中外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天籁之音，演绎着《卡门》《燕子》等经典曲目。“从舞美效果到现场歌剧，都非常震撼。”Luna看到，演出接近尾声时，当中外艺术家们唱响《从茉莉花到图兰朵》和《我爱你，中国》时，现场观众不约而同地齐声唱起了这首融合了东西方经典的曲目。

那歌声动听高昂，响彻成都的夜空。“那个画面太令人感动了。”Luna说。（Luna为化名）

现代人的"健康大业"与身体管理

文·三布

马拉松、斯巴达、轻徒步、普拉提、卡路里、多巴胺、马甲线、健身打卡、囚徒训练、运动手表、智能穿戴设备……越来越多的与运动有关的名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社区的健身馆在某一天悄悄地变成了 keep fit、cross fit 馆，海报上"减重"两个字逐渐被"身体管理"所替代。它们似乎无一例外都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挂钩。

小蒋的心事

阳光明媚的中午，蒋斯涵准时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关上电脑，迅速吃一份代餐，啃了一个苹果，兜里揣上一听罐头，拉着小伙伴从北京朝阳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走了出来。

她每天中午都利用午休时间，雷打不动地前往公司附近的公园走上一个小时——罐头是给公园里的流浪猫们准备的。促使她坚持每天运动的起因，是明年的婚礼。

蒋斯涵曾经无数次梦想过自己穿上那件婚纱的样子。试装的时候，她发现离自己心目中的完美还有差距。于是她不再吃甜食，戒了饮料和高糖水果，效果不算明显。蒋斯涵发了狠，高强度的节食让她的体重一度迅速下降，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抵抗力随之下降，加之忙碌的工作，秋天的一场流感击垮了她。长达三周的恢复期，不仅影响了生活，体重也渐渐恢复到减重前的数字。妈妈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地批评她："不吃不喝真是胡闹，马上要结婚的人了还不懂得照顾自己！"

"人肉矛盾"尖锐且痛苦。减重要科学，饮食与运动要结合，这道理蒋斯涵懂。蒋斯涵认真地反思过自己的问题，久坐、不规律饮食、试图通过简单的挨饿代替运动、与朋友的聚会多是吃吃喝喝、周末不喜欢出门、赖在家里睡觉、逃避家务劳动，有时候，连"洗碗权"也要和男朋友猜拳赌个输赢。

"当我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彼此都会聊起减重的话题。权衡利弊，只有增加运动量，没有其他的办法。"蒋斯涵说，"加班的话，大不了吃个代餐，按时吃饭总比饿过劲再去大吃一顿健康得多。"

蒋斯涵坚持了三个月。每天两万步的运动量，让她的身体轻盈了不少，心情也愉快了。"只要坚持下去，明年就可以自如地穿上婚纱，拍一组美美的照片！"她的心事最终成了她的最大动力，当然，也是她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正确的减重方式。

体重之痒：我们的胖与瘦

人为什么胖？未必是因为管不住嘴，而是源于人类刻在基因里的、愿意储存高能量食物的本能。但今天的我们却不再需要和野兽搏斗——别说搏斗，自从有了电梯、汽车这样提升生活质量的工业品，我们连一步台阶都懒得迈。没有那么多运动量去消耗，人自然变得胖乎乎。

到底多胖算胖？目前人们判断胖瘦的方式，通常通过 BMI 指数、腰围和体脂率三个数值。数字一超过标准值，人们便心痛不已，但有趣的是，"胖"这个字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并不会让人难过到说不出口，"心宽体胖"甚至是个褒义词。但在西方，你可以说朋友 chubby（胖嘟嘟），也可以说他 gain weight（变重了），但绝对不能说 fat（胖），那是个充满歧视、偏见的，极不礼貌的贬义词。

北京姑娘余佳性格很洒脱，从小就有点大大咧咧，对自己的外表也没有过任何焦虑。fat 不 fat 这件事，她似乎从未放在心上。前些年当了妈妈，余佳把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不再管理自己，人一下子臃肿了起来。余佳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照镜子，整整两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



服，身体状态也变差了。

有一天余佳在公交车站等车，一位大妈拉着她的手，非说余佳是她几十年前的一位朋友。余佳说起这个异常尴尬的时刻，自己内心有个声音说道："这样的状态，我一天都不想再继续了。我一定要改变，为自己活一次。"

彼时余佳在社区里加入了一家健康管理机构（康宝莱）举办的体重管理挑战赛，三个月的时间里，余佳的体重整整下降了 34 斤。瘦下来的余佳，大方地套上了一条过去的牛仔裤，用手拽开裤腰给我们看，空出足有一拃宽，她笑着说："这是我体重巅峰时期的裤子。"

减重的过程是痛苦的，余佳也经历了几次平台期，但她每天坚持在俱乐部打卡，学习科学减重、均衡饮食的方式，参加各种运动，同时也请了健身教练。她说自己如今的心态非常积极，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上秤，数字让她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

很久没见的朋友见了面，都说她"判若两人"。平生第一次，余佳觉得这是个好词。"因为我的确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她不再是那个不惮于把高油高糖食物往嘴里塞的姑娘，她觉得"一包薯条的快乐是短暂的，而健康的快乐是持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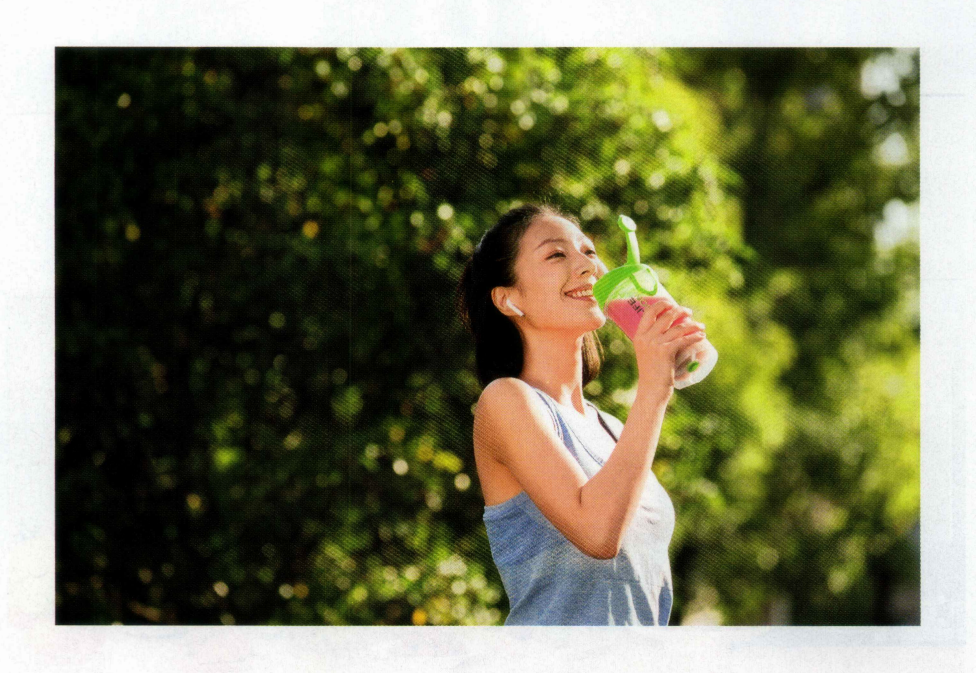
饮食习惯的改善，坚持与伙伴一起锻炼，缓慢但坚韧地调整日常作息。曾经抱着减重目的参赛的余佳，这时的收获早已不止于"瘦身"。她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了良性的身体管理。而这又指向了"美"。余佳确实觉得自己变美了，她愿意照镜子了，也愿意在每天出门前精心打扮一番。

当然，余佳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容貌焦虑。她仍旧是那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她追求的是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寻找一条身体需求和内心需求平衡的路。

减重的进阶：悦己者容

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标准，现代社会对美的定义正在转变。过去人们喜欢展示曲线的衣服，如今宽松的服装，舒适、自如，符合健康观念更受欢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也是最为健康的。美与健康，应该是一体两面。

古希腊人憧憬美的"身体"，对肌肉比例、头



身比例要求极为严格。但他们也认为，只有健康且完美的身体才能孕育出健康的精神。现代人更是认为，身体的健康首屈一指。

高翔去年减重成功，他每天会选择一顿代餐或一顿"白人饭"（指蔬菜沙拉、白煮鸡胸肉等高蛋白、低热量的西式饮食），同时坚持每天高强度的运动，体重下降了40斤。"好看"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运动让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回归正常。这也是他减重的初衷。今年6月份的公司体检，高翔有11项指标不合格，其中包括中度脂肪肝、尿酸超标，以及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双双冲破最高限。瘦了以后，身体负担减轻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锻炼，以期明年的体检各项指标能恢复正常。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超重与肥胖人群总数已经超过了6亿，成为世界第一胖国，在长期与美国"竞争"谁拥有最大数量的超重与肥胖公民中已经初步"获胜"。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人们疏于自我管理。按高翔的说法，"迈开腿"的过程相当痛苦，且极其考验意志力。但长期坚持获得成功的成就感成为他极为特别的人生体验，带给了他更多的"延迟满足"。

"科学代餐能够有效帮助体重管理。"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名誉教授大卫·赫伯博士的观点。大卫·赫伯同时担任以营养和体重管理闻名的康宝莱公司的营养学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肥胖预防与控制蓝皮书》和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发布的《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中，将代餐作为健康有效的体重管理方式之一，同时也指出，身体管理与个人长期的行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运动、合理膳食，科学使用代餐只是饮食调节手段，而非采取极端方式去减重。

加缪曾说"身体是我的故乡"。健康的美，不仅仅在于体形，过去人们认为无病就是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只是生物学角度的考虑，除此以外，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适度的情绪反应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知乎答主冉苒，曾经是一名胖胖的建筑工程师。她成功减肥40斤后转行做健身教练，获得了美国体能协会注册体能训练专家证书（NSCA-CSCS），这是一项国际顶级的体能教练资质。她在自己开设的名为《减重本质上是一场心理建设》的播客中提到："人们控制体重，总是过于看重饮食，很少有人关注到减肥期间人的心理变化……真正减肥成功且长久保持不反弹的人非常之少，通过减肥让自己更强大更自信的人更是罕见，大多数减肥者都是越减肥越焦急、越减肥越自卑、

越减肥越脆弱。而减肥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心理波动，暴食症、体相障碍等问题非常高发。”

总而言之一句话，心理健康于减重至关重要。

身体管理，多元生活的入口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减重尤其如此。

康宝莱深知，算法推荐给用户的“5天减20斤”“10天减重30斤”的案例，要么是虚幻故事，要么是“幸存者偏差”。减重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包括改变价值观、改善饮食习惯、调整生活方式、调适心理状态，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有鉴于此，康宝莱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让更多人有规划地减重，并且能坚持下去。

余佳参加的“体重管理挑战赛”，是康宝莱自2012年起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目的是让有相同愿望、共同目标的人组成社交圈。

人是社交动物，同道中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相互学习，效率大大提升，可持续性也大幅度增加。十余年来，康宝莱以“运动＋营养＝健康”为理念举办挑战赛，举办5K嘉年华活动，组建营养俱乐部，累计帮助超63万名小伙伴成功“蜕变”，让他们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实现悦己和社交的目的。

一群人的奔跑，总比一个人的坚守更能持久。

为了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健康知识和更好的生活体验，2023年康宝莱启动了“营养进社区”行动。通过社区科普宣教、健康促进活动等形式，面向社区和公众大力普及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的理念，支持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打通营养知识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健康中国的基层推动者，同时支持服务商参与培训学习，获得公共营养师资质认证，为社区和顾客提供更加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健康咨询服务。

康宝莱首席健康与营养官肯特·布拉德利（Kent L. Bradley）曾在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说道：“让健康生活的种子茁壮成长。每一粒种子，在适宜的生长环境下，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需要培育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社区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一家营养公司为何煞费苦心，花费如此多的精力传播其营养、运动与健康的理念？这缘于其倡导的高质量生活方式和如今主流社会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不谋而合。

余佳曾经给许多朋友推荐过康宝莱的俱乐部和科学减重理念。所谓的健康，并不是简单的管住嘴、迈开腿，而是拥有科学的减重观念，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相互鼓励、一起变美，边玩边瘦，收获健康的同时，让减重这项“健康大业”的参与者们不再孤军奋战。

在减重的路上，我们从不缺少伙伴，缺少的是科学的观念与引领者。

康宝莱依托自身经验和专业能力为人们持续不断地提供安全感，致力于成为现代人健康财富观、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多年以来，康宝莱坚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人们通过一份可靠的事业——不去追求物质层面上的奢靡和浮华，而是在工作中更好地展示自己，在成功中奉献爱心，让会员与消费者收获心灵上的共鸣，获得精神层面的愉悦体验。

尾声

消费只是表象，而生活理念的形成显然更为重要，因为它最终会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年5月，康宝莱品牌进行了全面升级。这不仅是品牌形象的焕新，更是对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方式深刻理解的回应。Logo保留了三叶草标识，代表身体、情感和财务健康状况。这不仅是对传统的致敬，更是品牌愿景的图形化表达，旨在引领人们迈向更健康、更有活力的生活。

康宝莱怀揣成为顶尖健康公司的愿景，致力于传播健康观念，让人们亲身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建立起与他人的紧密联系。

在现代人的“健康大业”中，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物。在和时间老人赛跑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收获精彩的人生，更是走上更健康、更充实的道路。（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米沃什：诗歌如何见证？

记者・艾江涛


（视觉中国 供图）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摄于 1980 年）

面对沉重的历史苦难，诗人何为？诗歌又将如何见证？随着《米沃什传》中文译本的出版，人们有了更多走进这位诗人所处的那段历史深处的机会。

“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

在 1980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更确切地说，在 1973 年他的诗歌被译成英文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系一位寂寂无闻的教授。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斯坦福大学，我出席一个文学界的聚餐晚会，与耶日・科辛斯基（波兰裔美国作家）一起，当然，他很有名。有一个女人，科辛斯基的一个热心读者，在餐桌上与我相邻而坐。可能觉得有必要表示礼貌，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写诗。她厉声回答说：‘每个人都写诗。’我不是特别介意，但仍然感觉受到了伤害。”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约瑟夫・布罗茨基对米沃什的评价，“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并非一句空话。此前，米沃什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都是以一系列讲述他所经历的 20 世纪最为黑暗与悲惨的大屠杀、集权统治当然还有诗歌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散文，诸如《米沃什词典》《欧洲故土》《被禁锢的头脑》《诗的见证》等散文集而闻名的。然而，米沃什素来不喜欢西方世界向他派发的那种廉价的幸存者的角色，上世纪 50 年代脱离波兰之后，在法国度过极为困顿的十年期间，他是唯一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

如果说以前人们对米沃什的了解，更多来自他的诗歌和散文，那么在今年 5 月，随着《米沃什传》中文译本的出版，人们有了更多走进那段历史深处的机会。似乎是为了相称于米沃什厚重的历史感，波兰“70 后”文学史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花费 6 年时间写作的这本传记厚达 1400 多页。追随米沃什的生活经历和诗歌线索，弗劳瑙塞克大量征引米沃什的自述、同代人对他的评价，还有那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用中文版译者乌

兰的话说，编织出一部独特的波兰现代史，尽管那种绵密带来细节发现的乐趣，同样构成一种阅读挑战。乌兰告诉我，这部书在波兰也卖得特别好，不过有人告诉她，由于信息高度密集，往往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米沃什的诗歌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比较延续，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注重内容和感受，为什么？跟他年轻时候，在维尔诺（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大堆说不清楚的感受有关。他的家族有13种血统，法国血统、匈牙利血统、波兰血统、立陶宛血统，一大堆，所以他既复杂又开放。”乌兰说。2001年，乌兰在克拉科夫见到90岁的诗人，发现米沃什的口音还带着老波兰人的那种语调，听他讲话要格外认真，因为他会用到很多18、19世纪古老的词汇，他认为那些词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次见面，乌兰问了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你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为何不用英文写作？”诗人回答：“我如果用英文写作，就丢失了波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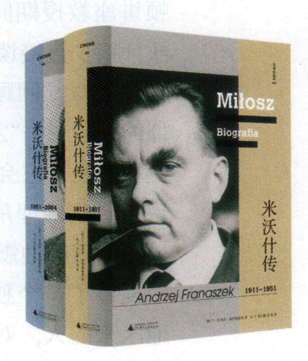
这种波兰性，自然指向对母语的忠诚，一些时候，也被米沃什表述为“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在《米沃什词典》中，诗人写道：“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住的区。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米沃什曾在那里长大和接受教育的维尔诺便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这座曾属于沙皇俄国、波兰立陶宛大公国、苏联，如今为立陶宛首都的城市，一直混居着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与白俄罗斯人。因而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这里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然而在米沃什成长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里仍是欧洲文学版图的空白点，来自这里的诗歌学徒，仍然要到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巴黎接受短期或较长时期的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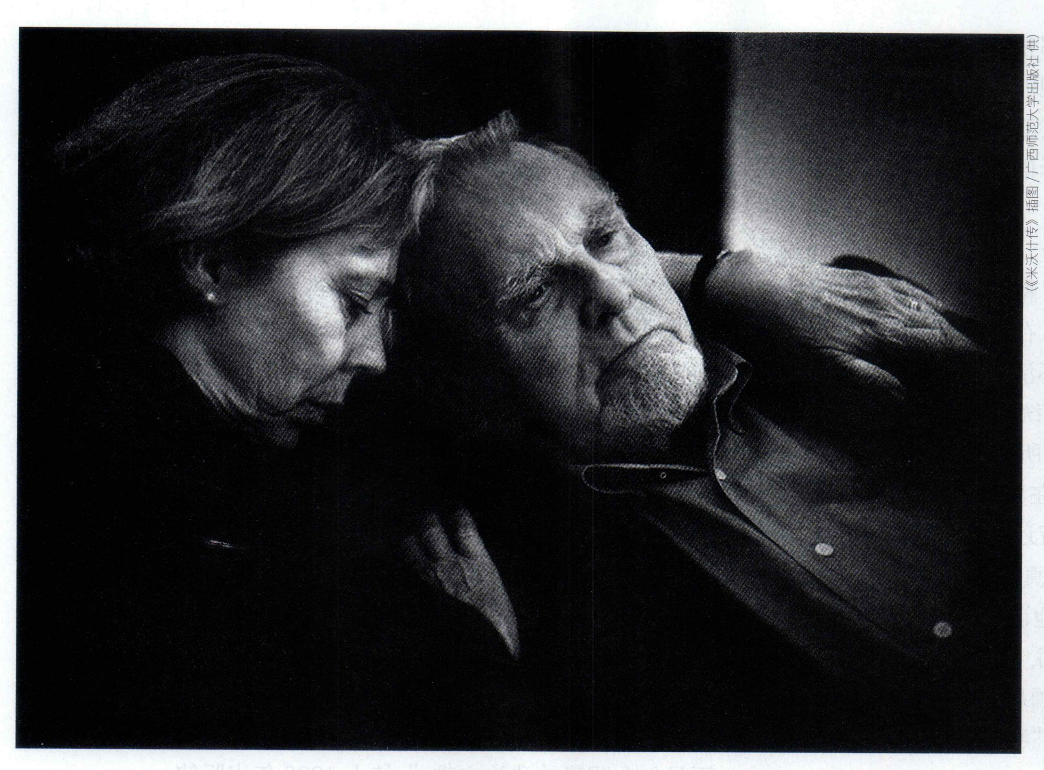
那时法国诗歌的风尚，是沿着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等象征主义者所开拓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先锋派诗歌。混乱、阴郁的诗歌图景中，延续的正是米沃什后来在《诗的见证》中总结的关于诗人与人类大家庭深刻分裂的普遍信念：“‘头脑正常’的市民仍固守着的价值标准已经死了，其基础也即宗教已从里面烂到外面，艺术要接管宗教的功能，成为神圣事物的唯一居所。象征主义者发现诗作为自治、自足的单位这个理念，诗不再是描写世界，而是代替世界而存在。”

此前的1932年，21岁的米沃什在维尔诺和朋友已经创立“灾变派”诗人团体。那时的欧洲笼罩在一种悲观与虚无之中，年轻的诗人们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空气，在晚年访谈中，米沃什谈起“灾变派”的诗学实践：“我们的诗歌表达了一个预感——关于恐怖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它就像卡珊德拉的声音。我们想到一种宇宙的灾难，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灾难。”诗人1933年出版的首部诗集《写给冰冻时代的诗》中，一首名为《歌》的短诗这样写道：“我害怕留在此处，我一无所有，除了这个身体，/——它在黑暗中闪耀，一颗交叉着手的星，/于是，我恐惧于看见自己。大地/别遗弃我。”

然而，接下来1934～1935年在巴黎学习期间，米沃什慢慢脱离先锋派诗歌的影响，走上另一条道路，影响他的正是一位远房堂兄——法语诗人奥斯卡·米沃什。奥斯卡拒绝当时的文学风尚，批评纯诗造成的诗人与普通读者的分裂，钟情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时代，坚信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这位神秘主义者甚至预言，在经历1944年一场末日式的大灾难之后，在随后到来的新纪元中，将出现伟大的诗人修复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这些观念，伴随



《米沃什传》中文译本





《米沃什传》插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供

左图：卡罗尔和米沃什在位于马舍采村的兹比格涅夫·普莱斯纳家中（摄于 2001 年）

右图：1957 年，米沃什一家在法国蒙日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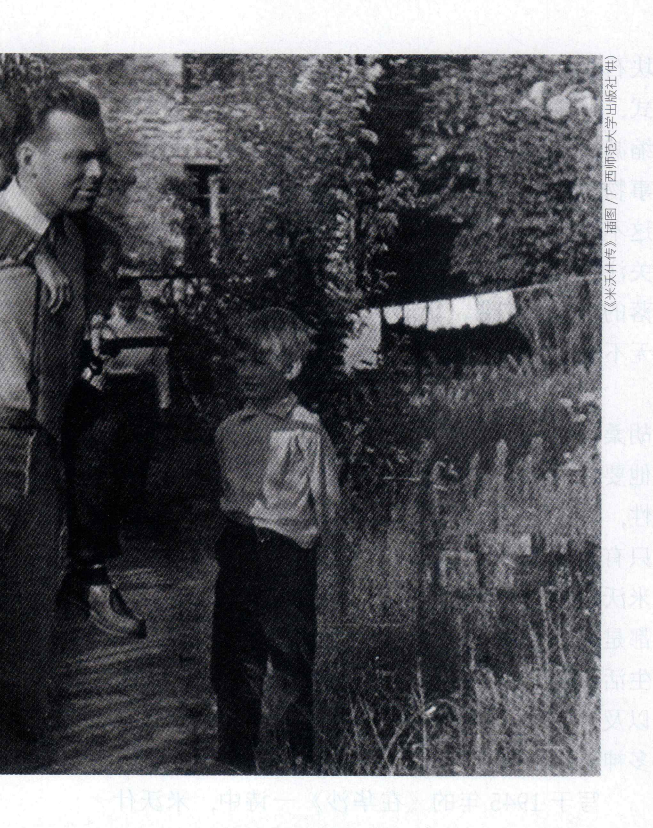
奥斯卡对法国文坛的引荐，深刻地影响了米沃什，他在《诗的见证》中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从不掩饰我青年时代对他的作品的熟悉，以及我们的个人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自己做诗人的方式，使我倾向于抵制文学时尚。"

"诗歌见证我们"

1981～1982 年，米沃什在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教授期间，撰写了《诗的见证》一书。米沃什很少直接谈论诗，在这部带有对 20 世纪诗歌与个人写作回顾意味的诗论中，他提出了一种见证的诗学——"20 世纪也许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变和多面，它会根据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它而变化，也包括从地理角度。我那个欧洲角落，因发生了只有剧烈的地震才能比拟的不寻常和毁灭性事件，而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结果，我们这类从那些地区来的人，对诗歌的评价与我的大多数听众稍微不同，因为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我把此书称为'诗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米沃什拒绝成为一个"例行的哀悼者"，如果要说哀悼，要说见证，那也是来自诗的见证。尽管米沃什后来写了许多回顾反思那段历史人与事的散文，可在他的眼里，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也即诗歌的层面上验证，那我们就要怀疑其真确性。

为何诗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这部分缘于米沃什从他那位远房堂兄那里借鉴来的诗歌观念："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米沃什晚年对记者解释："对真实的寻求就是对上帝的寻求。"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米沃什的天主教信仰，在青年诗人胡桑看来，这也是米沃什与 20 世纪先锋派诗人的最大差异，"米沃什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先锋派诗人的宗教感普遍很弱，他们并不试图通过宗教的方式来拯救或者开拓欧洲文明，如果从这点看，我们也可以说米沃什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一直坚信天主教的信念才是他写诗的真正动力，或



（《米沃什传》插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供）

者说拯救欧洲文明的力量。”

诗的见证所以可靠，还缘于米沃什发现，在战时，一切事情都被严重简化，语言恢复其最简单的功能，必须命名现实，这现实客观地存在着，庞杂，可触摸，有着可怕的具体性。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不可能的。可米沃什的亲身经历却是，当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突然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战后波兰出版了一部厚达1912页的诗选《战斗的波兰诗抄》，其中收录的诗和歌，大部分写于德国占领时期。

1940年，苏联侵入维尔诺后，米沃什穿越层层封锁线，到达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二战”期间米沃什在华沙生活，参加抵抗运动与地下写作。战争期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和朋友自印出版了《诗》《计算》《平原》三本诗集，还编选了一部反抗纳粹的地下诗歌选集《独立之歌》。

我们多少会感觉到困惑，米沃什不止一次提到，当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便很难有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要的距离，换句话说，一切还要需要忍耐和等待，才会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作的《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对自己的作家朋友阿尔法（波兰作家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所写关于纳粹占领期间华沙生活的新小说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可是，为什么在战时的波兰米沃什自己也写了那么多诗歌？

很可能，令米沃什难以忍受的是将那些发生在眼前的悲惨场景转化为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文学的一部分，诗歌因为指向一种对真实的追求，多少有些不同。可米沃什发现，那些在集中营和监狱中写作的诗歌，常常要么太啰唆，要么太露骨，极致的经验，难以用既有的概念和形式来表达，因而这些诗歌绝大多数只具有文献价值。那么他自己呢，他找到了那种能见证苦难的有效形式了吗？

“作为一个诗人，我深感不安，因为我明白，诗歌不能如其所是地描绘世界——形式的惯例都是错误的。所以，我寻找不一样的东西。但同时，我写了一个长篇作品，由一组短诗组成，也就是《世界：一首天真的诗》那部作品，一个组诗——虽然那时对于它，我不是太有自觉意识——就像布莱克之于《天真之歌》，我认为世界是非常可怕的，这些天真的诗歌就是我的回答——我想说，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像它当时那个样子。”在晚年的另一次访谈中，米沃什谈到这首诗时说：“1943年，在华沙的时候，我就写出了我最好的关于战争的诗，用的就是一种孩子们的初级语言，类似童话的语言。”

回到这首《世界》组诗，一切是以孩子的视角展开的，那是战前森林中的房屋，放学回家的小路，散发着腊味的楼梯，座钟中的小鸟“它的第三次叫声刚一结束，/ 妈妈就从热汤盆里舀出汤来”，在藏书室中摊开大书的爸爸。在那个曾经熟悉而温暖的世界里，战争像阴影一般飘散在其中，“爸爸告诉我们这是欧罗巴。/ 晴朗的日子你能完全清楚

地看到它。/ 现在它在多次水灾后浓烟滚滚，/ 一个人、狗、猫和马的世界”。“你在哪儿，爸爸？夜晚没有尽头。/ 从现在起黑暗将永远延续。/ 旅行者无家可归，将死于饥饿，/ 我们的面包是苦的，石头般坚硬。”

米沃什在战争期间最出名的一首诗，是《菲奥里广场》，来自一个真实而触目的场景。1943 年 4 月 19 日，在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爆发了一场起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六天后，在复活节星期天，米沃什夫妇去拜访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电车在克拉辛斯基广场停了下来，在那里他们看到一座旋转木马，它的椅子映射出犹太人隔离区的高墙，人群在围观，在漂浮着衣服、燃烧的烟尘、死亡的尖叫之中，有人还坐在旋转木马上玩。米沃什当天便写了这首诗，记录这一场景：“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 无云的天空中。”

多年后，米沃什称这首诗是不道德的诗，因为他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去写死亡。在很多场合下，诗人被要求朗读这首关于“苦难”的诗作。米沃什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他不久前刚拒绝了一个征求转载这首诗的请求，因为他不想被人称为一个专业的哀悼者。

一种希望与拯救的诗学

诗的见证，不仅意味着通过诗歌去回顾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而且让人们获得一种更为深沉的心理机制与历史意识，拯救既来自历史，也来自那些可以通往未来的坚固的日常。正如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所说：“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接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1940 年，在战火中从维尔诺到华沙的那次逃亡途中，米沃什躺在被飞机轰炸的公路附近的田野里，眼睛盯着前面的一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听着炸弹的呼啸声，他突然理解了物质的价值：“那块石头和两片青草形成一个完整的王国，一个形式、阴影、纹理、光线的无限体。”当战争将一切缩减，人们便将目光聚焦在最为微小的日常普通事物，开始真正理解那些以前习焉不察的事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本雅明对日常平凡事物价值的关注与发现。在本雅明那里，那些遗留在历史角落的海报、广告、小册子还有家具服饰的细节，无不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发现。

不过，二者虽然表面接近，却有很大区别，胡桑说：“本雅明的思想源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他要从日常事物中发现那种隐秘的信息甚至是神性，本雅明觉得日常生活中的神秘是不可解读的，只有通过不断解读才能接近那个神秘的世界；但米沃什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坚信每一个日常里面，都是可以直接解读和接近的，只要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细微的事物里面，最终便能抵达明澈的心灵，以及心灵与上帝超验世界的共契。本雅明给人很多神秘体验，米沃什则给人很多安慰。”

写于 1945 年的《在华沙》一诗中，米沃什写到生活在波兰，每个诗人似乎不得不成为例行的哀悼者的痛苦，同时写道：“我要去歌唱节日，/ 在绿色树林中莎士比亚 / 常常抓住我。留给 / 诗人们一个幸福的瞬间，/ 不然你的世界就会毁灭。”一年后，当波兰的批评家对此提出质疑时，米沃什在《一封关于诗歌的半公开信》中做出回答：“有时候世界失去其面貌。它变得太卑鄙。诗人的任务是恢复其面貌，因为否则的话人就会迷失在怀疑和绝望中。它表明世界不必总是老样子；它可以是不同的。”

在许多人看来，1960 年到美国后，米沃什的诗艺越来越成熟，他的句子越写越长，透过那些流动中的散文化的长句，诗人在不断寻找事物清澈的形态。胡桑翻译了自己喜爱的那首《我的外祖父齐格蒙特·库纳特》，回顾外祖父的一生，看着他留下的照片与藏书，诗人的目光再次回到他的精神故园：“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毫无兴趣；我的注意力指向未来。/ 如今我贪婪地阅读这几卷回忆录，因为我已经懂得这些地名、路的转弯、山丘、河上的渡口的价值。/ 这多么重要，一个人必须领会自己的省份、家、日期和已逝人们的踪迹。”

被叙事遗忘的另一种乡村

文 · 李孟苏

在世人包括英国人自己看来，英国的一个文化标签是“乡村”。但作家丽贝卡 · 史密斯在她的新书《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里，揭示了一个与《唐顿庄园》完全迥异的英国农村。

2021 年，因为新冠病毒流行而被封控在家的那段时间，作家丽贝卡 · 史密斯（Rebecca Smith）正好怀孕了，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狭小的房间里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同时还要写作，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曾曾祖母玛丽 · 安。

1891 年，玛丽 · 安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丈夫查尔斯在农村的大型工程项目上工作，修水库或铁路。他们的生活漂泊不定，家总是临时的，每当查尔斯换一个工地，玛丽 · 安就要跟到另一片田野里重新安家。1891 年，查尔斯正在修造曼彻斯特通海运河，他们住的流动工人宿舍位于沼地里，家里挤满了孩子，还有 11 个房客。为了养活孩子，玛丽 · 安把床铺租出去好赚点租金。房客和她丈夫一样都是“挖土的苦力”。

丽贝卡 · 史密斯写道：“男人们轮班去工作，所以床上日夜都挤满了人。你能想象洗衣服的情景吗？湿漉漉的衣服挂在椽子上，煤火永远烤不干衣服。当我怀上第三个孩子到 5 个月的时候，才意识到玛丽 · 安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个婴儿仅仅活了 5 个月，10 个月后她又生下一个孩子。”玛丽 · 安共生育了 13 个孩子，其中 5 个夭折。

“我想起了她生孩子的那一天，谁能帮助她？她能休息吗？有房客施以援手吗？”史密斯家族里，在玛丽 · 安和查尔斯之前的祖辈也都是劳工，他们辗转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建造运河、铁路和水库，有的当煤矿工、板岩开采工、护林员、纺织工。史密斯发现，她对他们知之甚少。她想了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煤火和石蜡灯，工人和孩子。我想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保持地板干净的？下一顿饭又要做点什么呢？你们晚上睡得好吗？外人整天进进出出，湿气从墙缝里渗进来，他们是怎么让‘每个人’都活下来的？”

疫情封控解除后，史密斯开始走访家族长辈，到英国各地乡村采访，于 2023 年 6 月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Rural: The Lives of the Working Class Countryside*）。她融合了家族回忆录和自然文学的写作手法，讲述了农村劳动阶层的生活、田园景观、土地所有权和归属感的变迁，展现了完全不同于《唐顿庄园》的另一个英国乡村。

“捆绑小屋”

史密斯是家族史上第一个“跳出农门”的成员。她本科毕业于斯特灵大学传媒与英语专业，又在格拉斯哥大学拿到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曾在 BBC 苏格兰地方电台做了多年记者，生育孩子后辞职成为自由作家。她的弟弟子承父业，仍然做护林员，在林地里耕种。

在追溯家族的乡村生活模式时，她敏锐地觉察到，她的祖辈世世代代都住的是“捆绑小屋”（tied cottage）。

所谓“捆绑小屋”，指的是附属于某一块土地的住宅，产权属于土地的主人，土地主把它们分配给雇佣的农民、劳工居住。不管是免费使用，还是按最低限度收取租金，捆绑小屋都被认为是薪酬的一部分，或工作的津贴、福利。对劳工而言，捆绑小屋靠近他们工作的地点，只要连续签工作合同就有地方住，这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其实，决定权牢牢掌握在雇主手中，意味着捆绑小屋带有不稳定的属性，一旦农民和劳工失去工作，房子就被收回，他们及其家人立即面临流离失所的困境。史密斯书中提到 1875 年《先驱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有个细节：苏格兰低地

福尔柯克的一个老煤矿工人住的捆绑小屋，房间内非常潮湿，生火时地板上会冒出缕缕蒸汽。她还引用了另一个新闻报道中的细节：1902年冬天，在约克郡的德纳比梅因村煤矿工作的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家人马上被赶出捆绑小屋，成群的妇女和儿童带着被雨水淋湿的家什挤在路边。

到1948年，有34%的农业工人住在“捆绑小屋”，到197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3%。英国政府多次出台法案，保障“捆绑小屋”租户的租住权，其中有一条是如果他们不在此岗位上工作了，可以按市场价向房东交房租，继续住在里面。这些年，随着房价大涨，很多人无力购买住房，“捆绑小屋”又逐渐受到关注。

“捆绑小屋”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兴起新一轮的圈地运动的时期。出身威尔士乡间劳动阶层家庭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指出，圈地运动让农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最好完全放弃‘农民’（peasant）这个说法。英国多数地方实际上不存在农民，尽管作家们仍然用‘农民’这个词指代在乡村生活的人。”“真正的乡下人”是地主、佃农、商人、手艺人和劳工。

史密斯家族若干代都是劳工。她的父亲是护林员，工作地点时常变动，她自出生就跟随父母辗转于英国各个庄园的一座座“捆绑小屋”。别人听到她家有庄园的地址，立刻肃然起敬，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奢华，其实他们的住屋年久失修，阴冷潮湿。和他家同住的还有农工、管道工、管家、物业经理、猎场看守人，他们一起替雇主打理大宅子，经营土地。

在史密斯的童年，她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劳动阶层。他们“生活追随着富人的脚步”，进入到富人的领地，虽然没有恒产，却能享受那里的天空和大自然，这几乎让她丧失了阶级感。她笔调喜悦地回忆童年时和庄园里其他雇工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情景，孩子们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捉迷藏，冲着送鱼的货车喊叫。她在鸟鸣和雄鹿怒吼的声音背景中长大，在树林和山丘的仙境中漫步，仿佛“现代勃朗特姐妹”。

史密斯也毫不避讳地讲述了她逐渐感受到的与“大房子”里的人之间的鲜明对比。“大房子”里的人拥有史密斯家住的房子，他们的孩子会去外地上私立寄宿学校，不会和雇工的孩子一起在本地学校的操场上玩耍。十几岁时，她学会了在接听电话时改变口音，以应对是地主或是朋友打来的电话。

当她开始写《农场》这本书，写出她成长经历中感受到的种种矛盾，才意识到，她父母这个农业劳工群体属于天天劳作、生活的土地，却并不拥有这片土地。

他们的乡村，他们的命运

在世人包括英国人自己看来，英国的一个文化标签是“乡村”。如果问真正的英国人怎么生活，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住在乡下，一杯接一杯喝茶。所以英国著名记者、作家杰里米·帕克斯曼会嘲讽：“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自己实际居住的城市，而是属于自己并不居住的乡村，他们仍然觉得真正的英国人是个乡下人。”

人们对乡村生活习惯于简化或者美化，要么集中在描述《唐顿庄园》式的贵族世界，或者野外观鸟、徒步，要么是明星厨师教授如何利用AGA炉灶慢炖牛羊肉和野味——AGA炉灶是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达伦在1922



英国作家丽贝卡·史密斯和她的新书《农村：乡村劳动阶层的生活》

年发明的，热效率很高，一台炉灶能解决一座住宅的烹饪、热水和供暖，在英国尤其受欢迎，成为乡间富裕人家的标配。即便是反映兽医生活的电视剧《万物生灵》，也不乏对农民的超现实表现：年轻的农民海伦，穿着时髦的牛仔背带裤，开着卡车干活，总是干干净净。剧组把她当成约克郡谷地的职业女郎来刻画了。

其实，据2019年的英国人口统计，82.9%的英格兰人口、83%的苏格兰人口和80%的威尔士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现在的英国人前所未有地远离乡村生活。大多数英国人对农村有误解，农村对他们来说仍是遥远的世界。历史学家、系谱学家和档案研究人员协会（AGRA）成员艾玛·乔利（Emma Jolly）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兰开夏郡的农村长大，她谈到自己上中学的第一天惊讶地发现，新同学中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她住的村庄，而她对城市道路也一无所知，放学回家的路犹如一趟漫长而曲折的旅程，她总会在找公交车站时迷路。

史密斯有相似的经历。她的阅读量很大："我厌倦了阅读游客对乡村的游记。没错，这里的山很壮观，蘑菇也很美味，但游客们常常忘记，这个美丽的地方也是工作的环境。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她还发现反映劳动阶层的书几乎都针对城市劳动阶层，极少有关于农村地区的。农村劳动阶层的声音始终是听不到的。如果讨论林业问题，发言的都是学术界专家，在这片土地上工作或生活的人，比如她父亲，却被忽略了。"他们往往是真正的专家，只是不被认为是专家。"她决定自己动笔写，"给那些通常没有发言权的人一个发言权。"

被忽略的还有农工身边的妻子。她们和丈夫共同塑造了英国的乡村。在史密斯和弟弟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劳动阶层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前途，母亲们尤其没有工作机会。我和弟弟在约克郡的一个乡村庄园里的'捆绑小屋'长大，这意味着住房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得到的。每天早上，爸爸带着午餐饭盒去森林里干活，妈妈就留在家里照顾我们。我们住的小屋离最近的村庄有4英里，这意味着到最近的商店，当然还有学校，要走4英里曲折的路。她带着我们在花园里玩耍，甚至在雨中散步，逗我们开心。那儿没有游戏场，附近也没有朋友。我很难想象我母亲有多么孤独。"

史密斯了解到，"孤独"历来不被视为问题。20世纪40年代，英国林业委员会在偏远地区为工人们建造了定居点，"却从未考虑过远离尘嚣对于农工社群的隐形支柱——女性，是个难题"。林区村庄的女性为了购买日用品，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她要先骑2英里自行车，然后换乘火车、轮渡和公共汽车，到达最近的城镇；她不能买太多，只能买她带得回去的东西。有的女人搭运木材车。

很难找到关于农村女性生活的记录，因为她们没有被记录的价值。史密斯写道："她们是工人的'妻子'：林业工人的妻子、农民的妻子、煤矿工人的妻子。男人的工作把她们带到了这些美丽但残酷的农村地区，而女人让一切正常运转起来。做饭、打扫、修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她们是社群里的主心骨。一些妻子不仅要扮演传统的角色，还要帮助丈夫干农活。有哪个农民的妻子不像农民呢？她们不喂奶、开拖拉机、收割吗？甚至下井挖煤也一度是全家一起上。妇女和儿童也要下井，直到1842年英国政府出台《矿山和煤矿法案》，禁止任何年龄的女性和女童下井劳动。然而，妇女们在地面上继续工作，她们分拣煤——她们需要尽可能地赚些钱。但她们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已从历史中抹去。"

乡村居民保护乡村土地

在序言中，史密斯说她并不打算详尽描述农村劳动阶层，她对"农村劳动阶层"的定义并不基于经济因素，而是基于劳动者与自然环境是否有联系，特别是情感的联系。

她在书中反复讲述、探讨"在土地上工作、生活而不拥有土地"对乡村人意味着什么。她的曾曾祖母经历怀孕、生产、孩子夭折的1891年，哈代发表了小说《苔丝》。小说中苔丝一家被农场主收回"捆绑小屋"、流离失所的情节，也是查尔斯和玛丽·安生活的部分写照。

在今天，哈代描写的农村劳动阶层生活的不稳定性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史密斯在采访中

遇到很多苔丝家的情况：土地主缩短租约，这让农民无法规划改善土地的长期项目；庄园主解雇地产上的农工，把土地出售给地产开发商，或者把“捆绑小屋”改成Airbnb。这些农工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塑造了乡村又被乡村塑造，如今被排挤出去，再也回不去了，未来陷入不确定。

史密斯认同Airbnb或城市居民的第二套房为乡村发展注入了资金，避免了农村社区萎缩。游客和第二套房子的业主“可能会给当地商店带来一些收入，但不会给学校带来更多的孩子”，史密斯写道，他们都是“过路人，不会成为哑剧或夏季舞会的筹款委员会成员，不会成为教堂会众的一员，也无法组织当地的同乐会。他们逐渐窒息了本地的生活”。在斯凯岛，20%的房子改成了Airbnb。有些旅游地产榜上的热门村庄变成了幽灵村子，酒馆和面包房倒闭，学校关停，平时冷冷清清，只有到了周五晚上，第二居所的业主开着豪华越野车来度假，才有了些许人气。

很多农村居民对蜂拥而至“排队登上斯诺登或本尼维斯山峰”、堵塞道路的游客嗤之以鼻，他们“不好意思但却真实地承认，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封控是多么美妙，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土地第一次属于自己”。这样的情绪，史密斯评论道，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人有权把土地称为“他们的”，尽管土地权实际上掌握在持有地契的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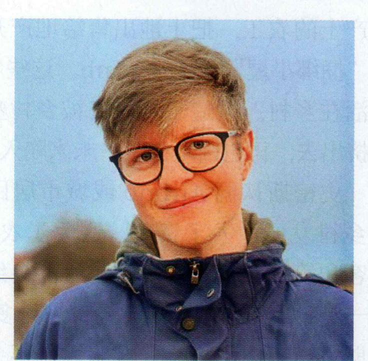
在书的最后一章，她访问了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格岛（Isle of Eigg）。私人岛主对岛屿不闻不问，以至于小岛几近荒废。岛上的63个居民和苏格兰野生动物基金会、高地议会共同成立“埃格岛遗产信托基金会”，筹款于1997年买下了小岛。埃格岛从私人拥有变成了社区拥有，由遗产信托基金会代表社区管理。岛民们制定了一项条款，房屋交易时，房主只能把房子卖给承诺常年居住的人。史密斯评价这种另类的“社区土地所有权”防止了资本对岛屿资源的过度商业利用。正是这一略带理想化的乡村保护方案，“让我感觉到我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真正建立起来的”。

（参考书目 Richard Jefferies, *Landscape with Figures：Selected Prose Writings*, Penguin Books；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Chatto and Windus& Spokesman Books；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

藏身于恒星之中的黑洞？

主笔 · 苗千

一些原初黑洞有可能被困在那些孕育恒星诞生的星际气体之中，最终会处于一颗刚刚诞生的恒星的中心位置。



马克思 · 普朗克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厄尔 · 贝林格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就在宇宙诞生之初，产生出极大数量的微小黑洞。这些所谓的"原初黑洞"（primordial black hole）在百亿年的时间里就在宇宙中穿行，甚至可能混迹于星际气体和尘埃之中，而当这些星际气体受到扰动，聚集起来便形成一颗恒星。这个极其微小的黑洞仍然藏身其间，从内部缓慢地蚕食恒星。这并不是科幻故事，而是天文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大胆，却有可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学最大的难题——"暗物质之谜"。而且这个想法的出现，居然还和流行音乐密切相关。

黑洞可以说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根据黑洞的质量可以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黑洞也有各自不同的形成方式。不过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黑洞主要是由死亡的恒星发生引力塌缩形成。那么，黑洞有没有可能就寄身于恒星的中心？这个想法初听起来难免让人感到荒谬。黑洞在恒星内部，难道不会立刻将恒星吞噬吗？如果这个黑洞的质量只相当于一颗小行星，大小只相当于一个氢原子，那么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

马克斯 · 普朗克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厄尔 · 贝林格（Earl Patrick Bellinger）与同事们产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宇宙中那些极其微小的黑洞有没有可能藏在恒星的中心？经过仔细研究，他们发现这个想法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且在理论上，天文学家甚至可能通过某些特征辨认出内部存在黑洞的恒星。

2023年12月13日，贝林格与合作者在《天文物理期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发表论文《带有中心黑洞的太阳演化模型》（Solar Evolution Models with a Central Black Hole），为人类理解恒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这篇论文迅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

这个想法源起于几十年前。1971年，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 · 霍金（Stephen Hawking）提出了宇宙发展的一种可能：就在宇宙大爆炸发生之后，整个宇宙像是一碗稠密的"粒子汤"。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密度极大的区域有可能直接塌缩成为黑洞。这些"原初黑洞"大小不一，从微型黑洞到超巨型黑洞都可能有。它们可能在百亿年来一直弥漫在宇宙中，通过自身引力成为整个宇宙网络形成的关键点，甚至可能正是在宇宙中占到物质总量85%的"暗物质"。

那么该如何寻找这些目前仅在理论上存在的原初黑洞呢？天文学家认为需要注意在天空中忽然出现的"闪光"。因为其自身极强的引力效应，黑洞能够造成其附近光线运行路线的弯曲。因此，当某个黑洞恰好挡在一颗恒星之前，它可能对恒星发出的光线产生"透镜效应"——对于在地球上的观测者来说，这颗恒星的亮度就像是忽然增强了，犹如发出闪光。目前天文学家们还没有观测到这样的闪光。不过根据计算，如果这些原初黑洞过于微小，质量只相当于一颗小行星，大小只相当于一个氢原子，那么它们所造成的闪光也


（站酷海洛 供图）

艺术家绘制的黑洞概念图

就过于微弱，无法被观测到。

贝林格与合作者们又向前迈出一步。他们开始研究，如果整个宇宙中的暗物质实际上都是由这种极其微小、无法被探测到的原初黑洞构成，会对宇宙造成怎样的影响？贝林格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微小的原初黑洞可能随时会穿越太阳系。而一些原初黑洞有可能被困在那些孕育恒星诞生的星际气体之中，最终会处于一颗刚刚诞生的恒星的中心位置。

这个想法一开始让人觉得荒谬。不过经过计算，这种情形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恒星内部有大量氢原子发生核聚变，产生出大量的光和热。在恒星的中心区域，大部分都是真空区域，对于一个微型原初黑洞来说，并没有太多物质可以供它吸收。理论上，这样的一个微型黑洞想要从内部吞噬一颗恒星，所需的时间要比整个宇宙存在的时间还长。

如果黑洞的质量更大一些，相当于一颗矮行星，那么在理论上它花费数亿年便可能从内部吞噬一颗恒星。在这种情况下，在黑洞附近的物质会沿着螺旋形的轨道被吸入黑洞。其周围的物质因为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量——当黑洞质量进一步增大到地球质量，被其内部黑洞所驱动的恒星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随后，这样的恒星会冷却，演变为一个红巨星——虽然一些恒星，比如太阳在数十亿年后也会演变为一颗红巨星，但是在内部有黑洞存在的红巨星的温度会略低于普通红巨星。研究者们将这种恒星命名为“霍金星”（Hawking Star）。

这种纯粹理论上的设想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欧洲空间局的“盖娅”（Gaia）卫星已经发现了大约500颗温度略低的红巨星。在它们的内部，是否真的可能存在着自从宇宙大爆炸初期便形成的原初黑洞？答案可能在这些红巨星的星光里。如果真的有内部黑洞存在，这些天体就有可能以某些特定的频率发生振动。天文学家则可能通过星光的特征辨认出这种特殊的振动频率。

在宇宙诞生初期所产生的黑洞，竟然能够与恒星相结合，甚至可能隐藏着关于暗物质的秘密。这个想法虽然还没有得到证实，却很容易让人过目不忘，感受到宇宙和科学的奇妙。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贝林格介绍，自己喜欢弹奏吉他、贝斯和打鼓。他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收听“声音花园”（Soundgarden）乐队的名曲《黑洞太阳》（*Black Hole Sun*）时产生了最初的灵感。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Science*）杂志和《天文物理期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的相关报道〕

恐龙的阴影

主笔 · 袁越

死亡是生命逃不脱的宿命，这句听起来似乎很正确的话对低等生物来说却并不是真理。比如细菌就没有死亡这回事，只要营养跟得上，细菌可以一直活下去。

当然，对于绝大部分高等真核生物来说，衰老与死亡确实是无法避免的。但具体到各类不同的生物，衰老的速率与寿命的长短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我们可以在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里找到很多几乎不怎么衰老的物种，比如很多鱼类和乌龟就是如此。但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不会衰老的哺乳动物，即使是大家公认的最长寿的鲸和大象也有明显的衰老迹象。

还有一种哺乳动物据说永不衰老，这就是最近成为网红的裸鼹鼠（naked mole rats）。但其实这种动物只是活得比较久而已，它们上了年纪之后也会出现各种衰老迹象，包括肌肉萎缩、驼背和皮肤老化等。

为什么单单只有哺乳动物逃不出衰老的命运呢？为了解释这个疑问，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乔奥·佩德罗·德马格哈斯（Joao Pedro de Magalhaes）教授提出了“长寿瓶颈”（longevity bottleneck）假说，认为是恐龙缩短了哺乳动物的寿命，相关论文发表在2023年11月28日出版的《生物学论文集》（*BioEssays*）期刊上。

按照这篇论文的说法，哺乳动物和恐龙都是在两亿多年前进化出来的。此后恐龙迅速崛起，成为地球的霸主，生活在恐龙阴影下的哺乳动物们不得不选择了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依靠昆虫为食，个头永远长不大。不但如此，哺乳动物们还被迫采取了一种快速迭代的生存策略，即出生后迅速长大成熟，希望能在自己被恐龙吃掉之前产下后代，之后的事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个生存逻辑被生活在城市里的老鼠们全盘继承了下来。它们的生活环境相当逼仄，经常缺乏食物，还必须时刻警惕来自捕食动物的攻击，于是老鼠们同样选择了快速迭代的生存策略，完成繁殖任务后便迅速地衰老死去，把有限的生存空间留给下一代。

德马格哈斯教授认为，恐龙不但把哺乳动物逼成了早衰动物，还让哺乳动物丢失了其他一些能力，包括卵母细胞的更新能力、牙齿的再生能力和断肢的再生能力等。相比之下，大部分爬行动物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这些生存技能。他甚至认为，哺乳动物之所以那么容易得癌症，其背后的原因也是来自恐龙的压迫，这种压迫让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丢失了很多抗癌基因，因为这些基因对于快速迭代的生存策略是没什么用处的。

这个假说尚存争议，比如有些人相信哺乳动物之所以早衰，原因在于它们是恒温动物。德马格哈斯教授争辩说，鸟类也是恒温动物，但它们的寿命往往要比同等大小的哺乳动物长得多。众所周知，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所以鸟类没有经历过来自恐龙的压迫。

古生物学研究显示，恐龙和哺乳动物至少共存了一亿年之久。在恐龙的压迫下，体形小、寿命短的哺乳动物苦苦挣扎，直到6600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小行星撞地球事件彻底改变了它们的命运。那次撞击杀死了几乎所有的恐龙，哺乳动物这才扬眉吐气，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但是，因为这一亿年的压迫让哺乳动物丢失了绝大部分长寿基因，所以它们没能重新获得长寿和断肢再生等技能。不过，这倒也不都是坏事，因为快速迭代的能力让哺乳动物得以加快进化的速度，灵长类这才得以脱颖而出，最终演化成了人类。



（站酷海洛 供图）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一 大扩展（3）

丢了六册《大典》

文 · 卜键

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天，弘历照常奉崇庆皇太后居住在避暑山庄，于敏中照常是随扈在侧，随时撰拟谕旨，也随时处置四库馆事务，舒赫德等一干老臣照常受命留守京师，四库馆臣则照常在翰林院和武英殿按部就班赶办书稿，而突发一桩奇案：有六册《永乐大典》被窃贼偷走了！

此事发生在六月十三日夜晚，据当事人、四库纂修黄寿龄诉说：他分得《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书，因“头绪较繁，均须查对原本”，白天未能校勘完毕，又生恐耽误，便于当晚将六册大典用包袱裹起来带回，打算连夜加班。孰料行至米市胡同，忽觉肚子剧痛，连忙下车找个旮旯拉屎，再回来包袱已然被偷走，“追觅无踪，实属一时失于照料，不胜惶惧，理合报明查缉”（《四库全书纂修档案》一五九，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六册交部议处折）。叙述较简，诸如车夫是他自家的还是临时雇的？是仅此一次还是经常带大典卷册回家？米市胡同离翰林院很近，为何要跑到街上拉野屎？第二天就报告还是拖了几天？皆没交代。

据现有史料，纪昀等总纂，也包括舒赫德等总裁，似乎也没有当作什么大事，过了十几天，才由永瑢领衔奏报皇上。该奏折大事化小，说此六册大典皆已经过摘录，形成抄本，也说黄寿龄“携带官书，理应小心慎重”，却没说纂修不可以将大典带回家。顺便说明，所有在京的四库总裁、副总裁都在这份奏折上列名，实际上并未一一告知，如副总裁、内务府总管金简就特地奏报皇上，声明自己是事后才得知的，并强调此风不可开，应予严肃追究。

黄寿龄，江西新城县人，三十七年二甲进士，庶吉士，为四库开馆之初较早被选中的纂修之一，参与大典辑佚。他将大典卷册带回家真的是要连夜赶办吗？实也未必。那时的四库辑佚为世人所瞩目，在馆之纂修分校有的雇人在家私辑私抄，未能入馆的一些部院职官辗转借抄，不少外地藏书家、书商也为此来京，各有路道，各显神通。窃书者不算偷，拿回家私抄当然更不算偷。可如果有机会顺手牵羊，大约很多人都不会犹豫，或者是犹豫再三仍然下手。所有的大型纂修应都避不开被偷书，康熙朝修《佩文韵府》、雍正初修《明史》，包括乾隆帝的兴修四库，应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永乐大典》的流失。我们也有理由对黄寿龄提出质疑，但其在回家途中丢书大概率属实，应是突然闹肚子下车出恭，车夫迷迷糊糊假寐之际，碰巧被街上游逛的贼娃子看见，顺走了车上的包袱。

乾隆极为重视，即发谕旨，严令缉拿案犯与追究责任，曰：

《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可不误课程，原无藉复事焚膏继晷。至馆中设有提调人员，稽查乃其专责。携书外出，若曾经告知提调，即当与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携归，该提调亦难辞失察之咎。着舒赫德察询明确，据实复奏。其所失之书，仍着英廉等上紧严缉，毋致阙少。至在馆之总裁，朝夕共事，亦不应漫无觉察若此，并着明白回奏。再各省所解遗书，办毕后仍须给还各家，屡经明降谕旨，恐纂修等亦有随便取携，以致遗失者，亦着及早查明，按单点收馆内，毋许携往私家。倘仍不行严查，致有舛失，惟该总裁是问。（《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一）

乾隆帝极善于举一反三，由丢失大典卷册，联想到各省进呈之书也有可能流失。就在同一天，在此旨之先，他已发出一道上谕：

……闻外省采访遗书，各设公局办理，交到后，有因重复及琐小拣下不解者，尚留局中，未行给还，并有本人赴领未得者。该督抚等或尚未办及此事，以致存积日多，而藏书家不知其书曾否呈进，将来发还后缺少数种，不知何处遗失，致经手之人

及吏胥等从中乾没，皆所不免，不可不及早清厘给还。着各督抚盐政，将各家呈出遗书，除已解京之书俟发回本省，另行给还外，先将各家拣存之书，令承办书局人员，逐一检查，按照所呈原单造册，先行发还；并饬该管官严行稽查，毋任胥役等从中取利，如或视为具文及办理不善，致官吏人等将书本窃取抵换，并借端勒掯需索情弊，或经科道参奏，或朕别有所闻，惟督抚等是问！督抚等奉到此旨，先行出示晓谕，俾咸知朕意，仍将如何还给及何日给完之处，具折复奏。

思虑细密，处置亦尽量严谨。常见有人称那次朝廷征书是一场浩劫，大量民间藏书就此流失，包括天一阁的部分珍贵藏书，但可肯定并非皇上本意。既关心征书，又挂念还书，生怕地方官不重视，怕官吏人等借机“窃取抵换”，反复晓谕，才是那个真实的讲究诚信的乾隆帝。

在奏折中，金简说自己于案发第三天闻知此事，即派人向纪昀、黄寿龄询问细节，并密令番役人等追查。而在接奉乾隆严旨后，京师立即刮起一阵追查旋风，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巡城御史、番役捕快、五城司访官役纷纷出动，手执一份《大典》书样，往书坊纸铺、旅店会馆等“遍加踩缉”。而诡异的是，各种搜查一无所获，七月十五日夜晚，六册《大典》竟然完整无缺地放在御河桥河沿，被人捡到上交。乾隆得知后自然很高兴，再次谕称“《永乐大典》为人间绝无仅有之书”，并要于敏中签发军机处字寄，命英廉密派精干番子手，“于书肆纸铺小市荒摊等处，留心体访”（《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六九，寄谕署步军统领英廉密缉偷窃《永乐大典》正贼并复奏访缉情形），以期抓住贼犯。哈，弘历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高明的，包括捉贼，可此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再无下文。

对相关人员的处罚，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官保提出：肇事者黄寿龄尚属在读庶吉士，无官职，罚俸一年，并责令留级三年（后未执行，


（喻湘泉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2023年6月20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广西巡展在南宁开幕，现场展出的2册与广西相关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仍于四十年四月散馆，授编修）；提调梦吉、王仲愚，值班收掌德克进，皆以失察罚俸一年；正总裁永瑢、舒赫德、王际华、蔡新，副总裁英廉、张若溎、李友棠、金简，“均照疏忽例，罚俸三个月”。而在此之前，因发报前不将奏折送金简阅看，翰林院编修宋铣等三人被罚俸半年。

此案发生后，皇上连发严旨，使在京四库总裁大为惶恐，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为防止再有遗失，有人提议从其他衙门调集人员，“至翰林院翻检书籍，逐日点查收发”。乾隆闻知后以为“种种情形不同，既不能清晨预定其应领何书，又不能随时为之陆续检发，若必欲纤悉无遗，随日以十数人司之，亦不暇给”，徒然添乱，且使纂修和提调得以推诿，谕令将翰林院藏书登录建档，“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如查该纂修仍有违禁私带之事，即回明总裁参劾”（《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七〇），措辞十分严厉。上谕就是王法，此后大约没谁敢将《永乐大典》带回家了，曾经活跃的私自辑佚也画了一个句号。但将纂成的书稿带回转录，谕旨未加限制，大家仍照行不误。

重压之下

文 · 张斌


影片《重压之下》剧照

男女足世界杯之于奈飞已是常态内容了，沉浸式记录一支球队征程，男足选德国，女足选美国，虽然距离终极夺冠万水千山，但故事还都是好故事，不是只有冠军才是最佳主角。德国男足被装入“孤注一掷”系列之中，支持者看后应该心生悲愤，如今的球队居然已难以做到球场之上孤注一掷了。美国女足三连冠的期许成为奢望，眼睁睁早早出局，创作者想象这样一支女子运动的杰出代表队一定是在重压之下疾行，因此有了“重压之下”的片名，四集作品，赶在圣诞前上线，对此有兴趣的球迷有望从中找寻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奈飞为了一个绝好的故事，请来了两度获得艾美奖的瑞贝卡·基特利茨把控全局。这位曾经执导过《最后一舞》《OJ：美国制造》和 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等一系列名片的大导演兴奋地接受了这一邀约，愿意为美国女足系列纪录片的创作开好头，并将这支高光之下的球队称作自己的“白鲸”，深层含义是“用心追求的目标”。今夏出征澳新女足世界杯赛前，美国女足刚刚在 ESPY 年度体育颁奖盛典上领得“亚瑟·阿什勇气奖”，在捍卫男女平权、包容世间多样性价值取向方面，其标志性以及行动力一时无双。队内多重角色云集，既有盖世巨星，也有温情母亲，自然也有初登世界舞台的锐意新人，球员与团队、个人与家庭紧密交织，戏剧张力饱满。

真实记录大赛间的球队故事，挑战显而易见，记录者竭尽全力在争取权利并扩大权限。美国足协与球队给出了最大的配合度，除球队酒店为禁拍区，给球员留出最后可以放松喘息的个人空间之外，其他场景全部开放，能拍到什么，就看创造者的本事了。比赛场景之中做纪录片式的高精度拍摄必须得到国际足联的充分配合，几经努力搞定了。美国队本届女足世界杯登场四次，每场比赛单是纪录片团队就能完成 70 多个小时的素材记录，12 组编辑团队随即开始深度加工一条条故事线上的人物与细节。如此阵仗算得上大制作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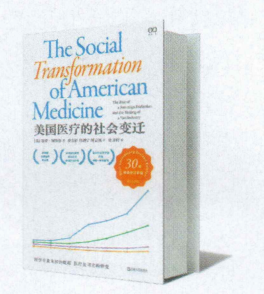
瑞贝卡·基特利茨迷恋着这个挑战性巨大的故事选题，她做梦都想展现出具有力量感的女性群体在组成一个强劲团队后背后的种种细节，但绝不会沉迷于女性角色的自我陶醉中，要让观众看到的是运动家的群像，而非刻意突出其女性光泽。现实比赛当然是没有剧本的，即便是以压力作为观察角度，创作团队在世界杯期间都要不断地体悟和调整记录的方式。首战越南队战果不理想，外界嘈杂的声音自然会侵入团队之中，考验着一支新帅统领的年迈球队如何应对，此中细节多多，摄像机未曾停歇。一支光芒耀眼的球队，一支似乎只有凭借不断胜利才能自证价值的球队在走向挫败的过程中，压力会蔓延开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重压之下》场景多元，充分记录了在现场参与 FOX 转播评论的美国女足名宿的言行，以这一线索同步营造大赛氛围，也拆解着美国女足征程上的每一次跨越。片中有一处情绪高潮分外引人注目，全队在主教练安多诺夫斯基率领下齐声高呼“冲击世界杯！”，强队风范与底蕴俨然犹在。瑞贝卡·基特利茨与剪辑师曾在屏幕前对这一场景精细地铺陈开故事细节，她自豪团队都是讲故事的绝对高手，这一情绪高潮的叙事蓝本居然源自《逃离德黑兰》的关键桥段，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故事高潮达至顶点，观众随之情绪高涨。

四集影片，容量有限，时间线从备战到赛后反思，出场人物众多，创作者期待人们感知到的不仅是一部足球影片在叙事，而且与一部真实影片中的人物达成共情。这些顶级球员都是感情丰富、深情拥抱自己家庭的人，在压力之下也有真实的恐惧感。《重压之下》希望可以更深入一步，展现出生活的本质和复杂性。

医疗太重要，并不只是医生的事

文 · 维舟

医疗是怎样从私人的、专业的决定，一步步变得公开和政治化？



《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



保罗 · 斯塔尔

中国社会历来盛行这样一种信念："久病成医。"言下之意，任何人在得病之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了解它，就能无师自通地学会如何诊治它。这种社会心态本身就是当下医患关系中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因为可想而知，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会把医疗看作专业门槛很高的领域，医生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赢得应有的权威。

美国的医疗行业也是这么过来的。别看如今医生是个强大、有声望且富有的职业，在两百年前的美国，那不过是个被人轻视的专业，地位和收入都没有保障，因为当时那个乡村社会的普遍看法是：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自己的医师。只有在经历了专业领域和复杂的社会变迁之后，人们才逐渐接受了新观念：所有人都应当获得专业的医疗服务。

这一漫长剧目的第一幕，首先是医学权威的诞生。简言之，医生要赢得社会（尤其是病患）的尊重，所凭借的并不仅仅是医疗技术本身。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进程，的确将人类从蒙昧和痛苦中解救出来，但医生的专业成就本身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让他们赢得优越地位。如果全社会还对这个行业抱有一种不信任态度，那就更是如此了。

与西欧相比，美国社会更为平等，也更推崇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们顽固地相信自己的常识，认定乡土智慧同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多数健康和疾病问题，而把专业知识看作对外行人的一种阴谋。哪怕是相信医疗进步和理性主义的美国人也常常拒绝接受医生的权威，因而看似吊诡的是，早期美国社会里许多最倾向于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对医生的怀疑态度反倒越甚。

公平地说，这至少有一部分也得归咎于医疗行业自身的薄弱、分裂和不健全。现在看来难以置信的是，直到1869年，还有一份专业杂志尖刻地指出："在所有的美国大学里，医学从来都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期望进入的行业中最受鄙视的一种。"不仅如此，医学行业一盘散沙，无法对内部观点分歧的宗派和成员行使任何集体权威。虽然随着美国的现代化发展，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但科技进步也可能使医生更依赖组织，导致专业自主权的降低。

只有当病患逐渐接受医生的专业权威之后，他们才被塑造成一个"合格的病人"，认可理性的

现代技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权威意味着“放弃个人判断”，但医生通常不具备强制性权力，如果他竟然试图用自己的技能来胁迫客户顺从，这本身就严重违反职业伦理，因而只能给寻求专业建议的患者一个治疗方案，何况还面临着诸多同行的竞争。那他究竟如何才能确立权威？

《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书中强调的观点是，“人们对专业人士依赖的主要基础是他们卓越的能力”——当然，这需要医学院培养出更合格的高素质人才、需要医学技术的进步，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也有赖于公众态度的转变。关键之处在于，并不是医生有了卓越的能力，就能取得病患的信任，因为外行的普通人实际上根本无从判断一个医生究竟是江湖郎中还是专业人士。专业主权建立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行业规范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社会心理逐渐理性化的过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需要建立一套“委托—信任制”，包含一种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当病患交付信任时，专业人士有责任遵守这一约定。这不仅意味着法制的健全和专业的发展，还需要社会普遍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认知：原先医患之间那种面对面的人格化关系，逐渐转向了间接，人们与其说相信的是哪个“神医”，倒不如说是那套制度本身，因而可以对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专业服务有一种稳定的预期。

当医生终于逐渐建立起专业主权之后，随之而来的才是延续至今的第二幕：“医疗个人主义”逐渐行不通了，分散的江湖医生很难再得到市场认可，医疗开始向产业转变。这既是由于新技术和新设备都越来越昂贵，只有那些资金雄厚的企业才有资本投入，也是因为公众对医疗服务水平有了更高的期许。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少不了国家日益增强的作用，至少医疗保健离不开政府力量的介入。

简言之，医疗原本是私人的、专业的决定，现在却一步步变得公开和政治化。因为医疗太重要了，以至于并不只是医生的事了。医学专业当然一直在为保持其自主权而斗争，但正如本书所言，“要想持续逃离公司和国家的控制，就意味着要维系一个始终与自身为敌的体系”。这也意味着，医疗领域所发生的变动，并不仅仅取决于医疗行业组织内部的因素，而是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结果。在此，医疗被看作一个“场域”（虽然书中没有出现这个词），所有各方力量都在复杂博弈中参与了对它的塑造，至今都没有停息。

在这方面，美国当然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信奉自由市场的大国，新大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国家力量的干预相对来说既弱又少，因而各方力量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充分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竞争性市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变动并回应各方需求。

按理来说，市场的理想假定消费者的选择应当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医疗却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最终胜出的并不是患者的选择，反倒是他们屈从于医护人员的权威判断。专业精神要求专业人士从取悦客户转向独立自主的同行导向，这本身就背离了市场原则。本来自由市场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自由选择，但病患一旦进入治疗，就很难再不受限制地选择服务提供者，从这一意义上说，医疗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服务。

到了现代社会，医疗已经太过重要，差不多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免不了要和它打交道——在医院里出生，最后又在医院里死去。医疗早已不再是医患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成了一门巨大的产业，也是牵涉到所有人的公共政治议题。

这个复杂的场域尽管吸引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每一方都想要重塑一个更好的未来，但却力所不逮，博弈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僵局：“尽管对现有系统的缺陷存在共识，但是对替代方案却没有任何共识。”但这是坏事吗？换一面看，这恐怕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正是这样，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各方是如何对自身关切的议题施加影响的。尽管乍看起来乱糟糟的，但却是其生机与活力所在：谁都无法确定各方博弈的合力结果将是什么样，也因此，那个未来始终都保持着开放性。

（参考书目：[美]保罗·斯塔尔著，史文轩、许朗宁、闵云佩译：《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丑八怪老婆还是一样丑。

烦人孩子还是一样烦。

贪钱情妇也还是一样贪。

跨年全是骗人的，根本每年都一样！！

跨年开始倒数计时

他们怎么了？怎么打成一团？

2024在怪2023丢了烂摊子给他接。

据说2023接手时也和2022打了一架。

下面怎么那么多人？

他们都在等跨年倒数计时，祈求新年好运。

这样跨年祈福真的有用吗？

我看是没啥用，瞧2024一副穷酸样。

结论：我们人类还是自己多努力吧。

5.4.3.2.1

笨蛋才跨年

真扫兴

这啥嘛烟火

跨年本来就很蠢呀！

HAPPY New Year

我又活了一年！

我又活了一年！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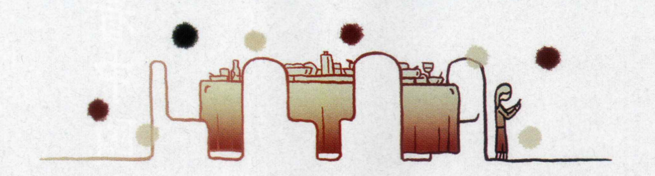
我又活了一年！

HAPPY New Year

建议死神以后别跨年了。

聚餐这件烦人的小事

文 · 晓萧 图 · 陈曦



下午 5 点半的办公室，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敲键盘声。大家都在忙着做一天的工作复盘，以便准点下班。这时突然从主任工位飘来一句话："单位附近有家火锅很不错，要不要这周去聚下餐呀？我请客。"顷刻间，办公室鸦雀无声了。

大约过了 20 秒，也许是 30 秒，终于有个能言善辩的同事接话了："最近是流感高峰期，大家都有小孩。主任先欠着我们这一顿哈，流感过去了可一定要补上。"

真好，又逃过了一次聚餐。

进入这家单位工作大约有 3 年时间了，却还没有习惯这里的聚餐文化。新人来了要聚，旧人辞职要聚，逢年过节要聚，没有什么理由也要为了聚而聚。聚在一起吃饭也就罢了，可领导的强势加入和主导，让聚餐又变成了上班的延续，甚至比上班还累心。

在饭桌上谈工作再正常不过了。我权当是开定期例会了，领导问到我就回答，问不到我便神隐起来。可怕的是领导远不满足于复盘工作，总会想各种办法调动大家的情绪，烘托自己的地位。

社恐人想安安静静地缩在角落里吃口饭是不行的。敬酒总得有敬酒词吧，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要对着不同的领导和同事说出不同的敬酒词，还要讲出新意，讲得漂亮，既恰到好处地拍上领导的马屁，又不露声色地展示自我，可真是极限烧脑。

在了解了单位的这种敬酒文化后，我总是在得知要参加聚餐前，便开始在网络上搜索"万能敬酒词"，看到确实很万能的，还会顺手发到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上，时不时温习几次，以便端起酒杯时，不显得那么生涩拘谨。

原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熬的时刻了，可奈何领导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大家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每个人表演一分钟吧。"

第一个同事来了段即兴 Rap，第二个同事来了段配音秀，第三个、第四个……很快就要轮到我了。桌上的美味佳肴瞬间变得索然无味了，我急切地思考着我有什么特长能给大家展示——读书、写字，或者是带孩子？

恍恍惚惚间就轮到我了。"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要不我给大家读一首我最喜欢的诗吧。"不待在座的人有反应，我便赶紧解锁已经准备到诗歌页面的手机，开始读了起来："席慕容，《如果》，四季可以安排得极为黯淡……"

一首诗的时间迅速滑过，前一秒钟还觉得时间飞逝的我，此刻又开始痛恨一分钟的时间过于漫长。"晓萧呀，朗诵得倒是不错，但明显不够一分钟呀。下次可要准备充分点。"领导微笑着望向我。我匆忙地点着头，也许还向此刻不那么严谨的领导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即便不社恐的同事，也有些难以忍受这种行加班之实的聚餐对私人时间的占用。于是，大家私下里一致商量决定：下次领导再提出邀约时，一定要众口一词，找到明确且合理的拒绝理由，能拒掉一次算一次。

一个周五的早上，部门领导兴冲冲地跨进了我们的办公室。

"大家晚上有空吗？晚上一起聚餐呀，这个天气适合吃点热乎的。"

话音未落，同事们便纷纷开始表达想去的意愿和不能去的遗憾。还没轮到我，领导就打断了大家的发言表态。"看来晚上都有安排呀。那就今天中午吧，今天不喝酒了，也不去太远的地方了。"他又对着办公室主任补充了一句："你定地方，我买单。"他自顾自地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转身离去了。

看大势已去，我只能默默打开手机开始搜索"饭局上表演什么才艺不尴尬"。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